

趙紫陽傳

趙蔚 著



趙紫陽傳

趙蔚 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

赵紫阳传

赵蔚著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印张9，插页4，字数218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0000册

ISBN 7-80041-139-7/D·6

定价：4.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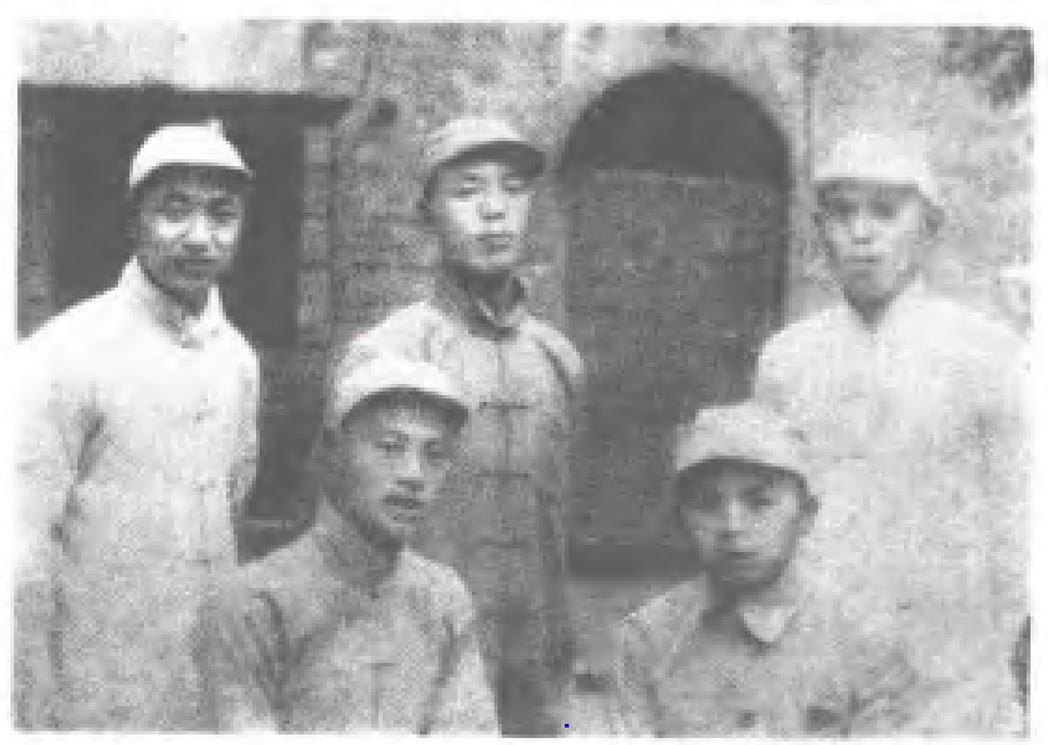
中共十三大期間，與鄧小平在休息室(1987年10月)



中共十三大期間，與楊尚昆、萬里在休息室(1987年10月)



前排左起 王任重 陶鑄 毛澤東 陳郁
後排左起第三人趙紫陽（一九六六年一月）



中共冀魯豫四地委領導成員合影
前左一為地委書記趙紫陽（一九四五年秋 滑縣）

（1985年6月）





出訪前在飛機舷梯上
（1984年）

接見廣州軍區陸海空三軍在職、離職休養的老幹部(1988年3月)

在海濱游泳





打高爾夫球（1987年，北京）

在東北扎龍自然保護區（1983年7月）▼





◀在貴州黃果樹瀑布（1984年3月）



與家人在山海關留影（後排左一長子趙大軍，左三夫人梁伯琪，左四兒媳王小瑩，1987年7月）



與夫人梁伯琪帶外孫在哈爾濱觀賞冰雕（1985年2月）

目　　录

作 者 序 言

赵紫阳是当今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身兼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这两个非同一般的职务，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被世人公认为是继邓小平之后中国的掌舵人物。

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以史实为基础的赵紫阳传记面世。因此，本人不避资浅学疏，致力于研究赵紫阳的经历和政绩，撰写赵紫阳传记。

在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作传这件事情上，似乎存在着这样一条“规律”，即第一部或最有影响的一部传记均出自外国作家之手，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邓小平，概莫能外。为什么中国人、中国的作家、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本国领袖人物传记却无所作为呢？在这类题材上是否还存在什么“禁区”呢？如果让中国人自己来写，一定会有更丰富、更正确的材料，也可以更具有权威性。作为中国的传记作者们，对此有什么可以反思的地方呢？看来，这既有政治环境问题，又有个人勇气问题。如果说斯诺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向全世界披露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长征的话，那么这种局面在全国胜利后就应当改观。然而由于我们思想上的封闭性、凝固性，为领袖修史作传的工作也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无人问津。领袖传记的出版是国家政治透明、开放度的体现。从根本上讲，领袖既然领导国家，人民就有权了解领袖的经历、思想和政绩，不应只局限于选举时的那几百字的介绍。否则，“人民当家做主”的含义就不那么充实。

时至今日，外国人还没有写出一部比较全面的《赵紫阳传》，原因很简单，赵紫阳是一位新领袖，外国人一时还来不及下笔，但是，可以预料，再过上一年半载，想必那条“规律”又会起作用了。外国

人为中国的领袖作传，在中国人看来，其内容往往失之肤浅，不得要领。不过，话又说回来，人家终究写出来了，聊胜于无嘛。

我以为，中国的领袖，应当首先由中国人写出传记来。这是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史学界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一个现代史的研究者，本人终于写出《赵紫阳传》，将它呈现到读者面前，使读者通过这本传记来认识和了解中国的这一位新的领袖人物，同时也破一下前面谈到的那条令人不快的“规律”。

本书承蒙河南滑县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刘守森同志在修订过程中给予帮助，谨致谢意。

1988年12月

第一章　故乡、家世和童年

公元一九一九年十月十七日(民国八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在华夏的中原——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农户赵廷宾的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婴。婴孩的母亲刘氏,是赵廷宾的结发妻子。他们在这一天之前尚无男孩,只有一个取名赵秀的女儿。按照中国的民间习惯,凡是在这一个农历年出生的婴儿,都是属"羊"的。

赵廷宾字为良乡又名秋喜,是个粗通文墨的乡间"布衣"。他喜得长子(也是独生子),于是按照本家族的取名序列,给儿子取名赵修业,意思是让儿子修身立业,长大之后有所作为。赵家在赵庄是个殷实的富裕人家,有田产数十亩,按照"阶级分析的方法",该算是地主了。

这个当年被父亲取名为赵修业的男婴,果然不负父老的最高期望,于六十八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不过,他的名字早就不叫父亲给起的那个多少带有一点封建色彩的"赵修业",而叫他在中学时代自己取的颇具气派的名字,"赵紫阳"。

河南滑县并不在黄河之南,而在黄河以北,属于现在的安阳市管辖。这片土地,处于冀鲁豫边区,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安阳及其周围的地区,在古代乃是华夏的"天下之中",交通方便,气候宜人,土质优良,全是一马平川的大平原。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成为汉民族的先民耕作繁衍、休养生息之所在。安阳县的小南海,发现出土了两万五千年前原始人类的洞穴遗址。小南海出土的数千件石器,是中原地区出土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人称"小南海文化"。安阳的后岗,发掘出晚于小南海文化的三层文化,即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和小屯白陶文化。

位于安阳市西北约两公里的殷墟,是商代后期都城的所在地,

是当时整个华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盘庚迁殷，至纣王自焚，共传位八代十三王，历时二百七十三年。这里是有文字可考的中华第一古都遗址，出土了十数万件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这样，殷墟就成为中国文字的故乡和中国古文明的发轫地。在这里，上演过盘庚迁都、武丁中兴、妇好挂帅、文王拘而演《周易》以及武王伐纣等有声有色的历史故事。

大约在四千多年以前，华夏上古"五帝"之中的颛顼、帝喾二帝，在帝丘（今内黄县东南、距滑县县城三十余公里）建都。至今，在内黄县杨庄西尚留着隆起于地面的古二帝陵，代代有人前往奉祭。

滑县位于安阳东南七十余公里。这里古处河朔一隅，为华北古海湾的一部分。千百年来，浩荡奔流的大河从西南向东北奔涌，淌过滑县县境，形成冲积平原。在那洪荒的岁月里，当这块新生的平原初露于地平线时，它是一片无际无涯的沼泽，林木杂生，蒲荻遍野，水中鱼龙群游，地上百兽竞走，空中鹰雀飞翔。由于大水冲击时冲力不匀以及海流、潮汐的作用力，再加上咆哮的黄河千百年来无数次的泛滥改道，于是，形成了今日滑县大地上诸多的堤、坡、洼等地貌形态。

滑县的历史源远流长，古文化遗址灿若群星。现存有仰韶文化遗址五处，龙山文化遗址十二处，韦城、楚丘城、滑台城、白马城等古城遗址十座，卫灵公、滑伯、汲黯、颜良、魏征、蔡京等著名古墓八座，还有规模巨大的唐初瓦岗军大寨遗址。(1)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风流人物涌现于滑县大地。《吕氏春秋》亦称："卫多君子。"历史上中国最早的女诗人许穆夫人，写下了著名的《载驰》诗章。卫文公发愤图强，中兴卫国；西周时，术士计然智高谋深，献计于越王勾践，使之卧薪尝胆，终破强吴，成就霸业。西汉名臣汲黯直言忠谏，为民请命。隋将韩擒虎南征北伐，破陈俘主；翟让于瓦岗寨首举义旗，号令四方。醉八仙之一的崔宗之，文采风流，被李太白赞美为"皎如玉树临风前"。文渊阁

大学士宋讷、吏部胡权，均系有明一代的杰出名臣；清朝嘉庆年间李文成举事滑县，北京震动。(2)

此外，一代先师孔子于游学中屡至滑地。宋泽、欧阳修、司马光等名臣雅士，均出宦过滑地，政绩昭昭、文章不朽。尤其是欧阳修，曾任滑州节度判官，在滑县秋声楼写下千古传吟的《秋声赋》。后人遂在欧阳通判所居之地设立欧阳书院，历代均为学堂书院。

滑县背山面水，系河朔屏障。它控白马要津，背卫南粮仓，古往今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莫不于此据险而制敌"。(3)秦汉之际，刘邦守白马威逼诸侯，率汉军渡河北上，战项羽于濮阳。东汉末年，关羽为曹操所用，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五胡十六国时，南燕王镇守滑台，阻河击魏。南北朝时，檀道济与朱修之大战滑台数月，血流漂杵；五代十国时，梁将王彦章与晋王李存勖鏖战滑台，大战不休。唐初瓦岗寨义军的大营，也扎在滑地。唐末黄巢义军，据滑台、略宋汴，直下淮南；北宋宗泽、岳飞所部劲旅，大破金兵于卫南；清同治年间，捻军大帅张宗禹于滑地击破清兵，北进直隶；民国年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滑地亦是一处喋血厮杀的战场。

桑村乡位于滑县最东边，距县城大约五十公里。这个距离，对于中原地区大平原上的县份说来，就算是相当远了。桑村乡与河南的濮阳县、长垣县接壤，东而黄河浩荡，过了大河便是山东省的东明县地界。从交通上讲，是个"半死角"，东面黄河阻隔，白马等古渡口早已废弃。全乡现有耕地五万余亩，人口三万，户数六千多。乡境之内，有金堤河、回木沟两条小河，没有山岭，全是平川。这里民风质朴，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村民们至今仍然主要依靠从黄土中刨食。可以想像，在数十年前的民国初年，这里曾是怎样的一副混沌不开的自然景观。直到一九七八年，桑村乡(当时还叫桑村人民公社)农村人口的人均产值只有人民币六十五元，人均收人更少得可怜，只有三十四元。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包

产到户的推行，桑村的状况才逐年好转。

桑村乡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的粮食亩产及人均年产值、人均年收入列表如下，读者可一目了然。

年份	亩产(斤)	人均产值(斤)	人均收入(元)
1978	179	65	34
1979	235	84	46
1980	196	78	46
1981	205	67	50
1982	300	139	98
1983	461	313	243
1984	455	425	321
1985	468	450	330
1986	482	497	360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桑村确实是个穷地方。直到一九七八年，村民的年人均收入才达到人民币三十四元，粮食亩产仅一百七十九斤。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在新的农村政策指引下，桑村乡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均年产值增长了将近八倍，人均年收入增长了十倍多。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桑村农业发展的高速度，同时也表明原先的发展水平确实是太低了。

无疑地，从清末以来，滑县丧失了历史上的显赫地位，沦为华北大平原上的一处较为落后的地区。一个地方的兴衰，与自然、人文、水流及交通等大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首先，几千年的文明史和开发史，使得滑地森林荡然、人口猛增，地力下降；另外，黄河暴虐，十年九溃；更为要害的，是近代京汉、津浦两条南北铁路大动脉和陇海一条东西铁路大动脉的开通，使滑地一下子失去了它在历

史上曾承担的交通大孔道的作用，加之黄河的流量减少，各古渡口的废弃，滑地便骤然降为中原地区的一个角落了。这种地区之间的兴衰荣辱，确是严酷无情的。中原平川尚且如此，大漠边塞就更是兴地人流熙攘、衰地黄土荒冢了。直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随着濮阳中原油田的开发，随着安阳、新乡等中等城市的兴旺，位于这三处之间的滑县县城（道口镇），才又恢复了一些旧日的繁华。但是，距县城一百华里之遥的桑村却仍然难以摆脱半闭塞的状况。

赵紫阳的家乡赵庄，距桑村仅两华里。当年这里有一百余户，今天增加到三百余户，一千多口人，也算是一个平原上比较大的村庄了。赵庄是一个典型的北中国农业村落。村子周围和村内栽种着槐、柳、梧桐等树木，农户们原先居住的几乎全是草顶土坯房，近年来随着生活的改善，砖房和半砖半坯房才多起来。在村庄的边沿上，人们能多少看出一点旧社会为了防备兵匪侵袭而修筑的土围子的遗迹。

赵家的祖居，位于赵庄的西头。由于这里是当年的赵庄"首富"之家，所以房子建得比较高大，也比较气派。所谓气派，说来也很可怜，无非是一座砖瓦结构的屋宇而已，有堂屋和左右两间厢房。这所房子，现在由赵紫阳的堂叔父赵英宾居住。赵英宾只比赵紫阳年长几岁，现有七十出头，仍事耕作。由于赵家是村中数一数二的地主，所以这所房子土地改革时被没收，好长一段时间作村公所之用，大约在六十年代末期才分给阶级成份较"好"的赵英宾居住。

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早在四十年代末土改运动的急风暴雨中就已去世，母亲刘氏跟随嫁到老庙乡冢头营村的女儿（即赵的姐姐赵秀）居住，家中再无近亲，只有一个名叫赵国宾的叔父，也早在解放前就失踪了。现在村中最近的亲人，只是叔父的两个儿子，即赵本人的两个堂兄弟，一个叫赵广业，一个叫赵百业。赵紫阳的母亲，已于七十年代中去世。他的老姐姐还健在，现在搬到滑县县城

居住。

在桑村及附近的邻乡，赵姓的族人不少，也算是当地的一个大姓。据赵姓早年的族谱记载，他们的先人是元末明初年间从山西洪洞老槐树迁至滑地的。族谱中未记载其先人中出过什么显贵著名之人物。

这株山西洪洞县的老槐树，颇不平凡。在它古老的年轮上，记载着北中国人文学上的一大奇事。当今，在冀、鲁、豫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及皖北、苏北等地，到处都分布有山西洪洞老槐树的传人。这些传人，又随着日后的各种各样的机遇，遍布于全中国以至海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翻开历史，就可以找到答案。

当元末明初之际，北中国战乱频繁，征伐不休。从元朝末年的红巾起义、元军镇压、群雄混战，到朱元璋北伐，尤其是历时数载破坏更烈的明成祖靖难之役，把个北中国搞得残破不堪，人烟稀少，户籍锐减，真是到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地步。面对这个局面，大乱甫定的明朝朝廷，只得乞灵于移民一途。当时，整个北方只有山西省由于相对闭塞，不当要冲，未经大的战乱，因而比较繁荣，其中晋南各州县，更是人口繁茂，适宜移出人口。

尽管这种移民是出于正当的考虑，尽管这种移民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但在封建王朝的统治下，也成为被移出者们的一场大灾难。为了完成朝廷下达的差遣数额，各级官吏便强迫百姓出移。不用说，绝大部分移民名额都落到了平民百姓头上，乡绅富户们出移的极少。当然，也会有一些在当地穷得活不下去的人愿意出移。

于是，一家一户的乡民，被强制或半强制地动员起来，送往州县集中。这对于安土重迁的百姓们意味着什么，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儿啼女叫，父母挥泪，亲人别离，比比皆是。

晋南一带移民的大部分，又被集中到当时处于交通要冲的洪洞县城，然后再分批地起程远行。在如狼似虎的官吏兵丁催逼之下，背井离乡、拖儿带女的移民们在匆忙中对家乡记忆最深的就是

洪洞县城外大道边的那株硕大无朋的老槐树。于是，移民们便一代一代地传下话来：咱们的老家在山西洪洞老槐树。这样，老槐树的枝叶便随着移民后裔的星散遍布于北中国以至海内外了。

赵氏的先人，就是从老槐树下走出来的移民中的一群。他们被朝廷分配到黄河边的这块土地上，与当地的人们交往通婚，一代一代地传下来。几百年过去了，他们也早就成为不折不扣的滑县人了。

遍及北中国的“老槐树的传人”，有些什么特点呢？特点总是有的。老槐树的传人大多穷困，但生命力强。他们来到一片新的、陌生的土地上，几乎一无所有，只有官府分给的荒地，顶多贷给一条耕牛、一张犁及若干斤种子，并免去几年徭役而已。他们必须勤劳、刻苦、同时与势力相对强大的当地人打交道。这种交道通常既有斗争，更多的却是融合。可以这么讲，他们是北方的“客家人”。他们辛勤开发了战乱残破的北中国，创造出使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并继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使自己溶入北中国广大的地域之内了。

说到赵氏先人这一支“老槐树的传人”，来到滑县黄河边上的这片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着。人们在发水季节的夜里可以听到黄河如雷的滔滔吼声。在这里，人们面临过黄河大决口时的灭顶之灾，也虔诚地参加过祭河神的民俗活动。正因为有这条滚滚的大河，才有了滑地的一切。黄河已成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生命中的一个部分。他们是真正的黄河的子孙。

这样，我们的这位传记人物，就身兼有“老槐树的传人”和“黄河的子孙”这么两个名副其实的身分了。他的童年，倒也没有太多的奇特之处。由于他生于殷实之家，又是父母钟爱的独生子，因而童年时代饱受亲情的抚爱，没有经受过物质生活上的困苦。这种童年的经历，对他尔后形成的性格中所具有的那些稳重、沉静、不走极端、不图报复、宽容大度等品格，无疑是起了作用的。我们知道，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童年及少年时代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一些被压迫阶级出身的大革命家或出身寒微、长于忧患的伟人，往往具有性格上的重大缺陷，诸如好猜疑、性残忍、图报复等等。这类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是严酷斗争有余而和平共事不足。当然，这类人在性格上也有其优势，诸如，吃得苦、咬得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一般地讲，这些品格在打天下时能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而在和平建设时期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了。

当然，赵家这个小村庄里的地主，虽说衣食不愁，与周围人家比强，但实际上生活根本谈不上富裕，更谈不上奢侈。赵修业的童年，也不可避免的与黄土地打交道。他在少年时代就熟悉农村中的一切，从春天的种子萌芽，夏天的青纱帐，到秋天收获季节的稼穑和冬日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田野。他也曾与少年同伴追捕过野兔和狸子、爬树掏过鸟蛋，摘食过乡间的瓜果梨桃。记事之后，他便在乡场、田头或窝棚、屋宇内，听老辈人有声有色地讲述过《三国》、《水浒》及《西游》等故事；也听到发生在家乡的瓦岗军、李文成和捻子造反等故事；还听到虎牢关三英战吕布、朱仙镇岳飞破金兵、燕王扫北、洪天王定都南京等故事。自然，他也会听到过当时已不算新鲜的反满革命的宣传鼓动。长到七、八岁以后，他便能跟随父兄辈步行十多华里，登上高高的黄河大堤，眺望、观看着奔腾万里、流人东海不复回的黄河。眼望着滔滔大河，回味着发生在岸边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童年的赵修业心灵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激情，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象俗话讲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河岸畔的水土，养育出黄河的子孙。

本来，如果桑村赵庄这个距县城一百华里的偏僻小天地仍是死水一潭的话，童年的赵修业纵有百种灵性、千般理想，他终生也只能是个桑村赵庄的赵修业而已。然而，历史没有这样安排他的命运。在赵修业出生的那一年，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两年后，由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五十余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成立。孙中山先生汇集党人，在广东成立了与北京的北洋政府相对抗的革命政府。在赵修业八、九岁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公开分裂，大江南北--片血雨腥风。毛泽东率领几百名农军登上雄伟的井冈山，次年与朱德的部队会师。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迁国民政府于南京，次年继续北伐，进入北京，并改名为北平，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奉军退至关外，张大帅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中国社会在激烈地动荡，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血和火中展现。

然而，所有这些政治舞台上的大剧目，对身处北方偏僻农村的八、九岁的赵修业来说，还没有多大直接的影响，倒是五十公里外的滑县县城里一位由北洋政府委任的颇有些学识的县长办的一件好事，对赵修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十年代中期，滑县县立第十七小学在桑村建立。滑县不愧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县份，那么偏远的乡间却有幸在二十年代创建了县立的小学。

这所县立第十七小学，是一所新式学堂，聘有外县及外省来的教员，并有新思潮的传播。1927年秋，家境殷实、望子成才的赵廷宾大喜过望，连忙将已到学龄的爱子送到十七小学上学。好在赵庄距桑村仅仅两华里，孩子每日来去甚为捷便。这样，八岁的赵修业就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天天上学堂去了。如果没有历史的这一巧安排，赵修业充其量也只能在本村私塾求学了。

赵廷宾作梦也想不到，正是在这所桑村县立第十七小学里，儿子竟接受了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共产主义，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道路。滑县这个北方偏僻的农业县份，在三十年代初居然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这确实出于某种“偶然”。在那个时期，居然有共产党人在一所乡间小学校中活动，更是出奇地“偶然”了。(4)但是，历史老人就是这么巧妙地安排了我们这位传主的命运，让他在“偶然”中的“偶然”里，在小小年纪就遇到了别的许多人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共产党组织。

(1) 《滑台春秋》第2—3页；滑县地方史志总编辑室编，1985年版。

(2) 《滑台春秋》第3—4页。

(3) 清朝同治年间修《滑县志》。

(4)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上编)》第13页；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1986年12月出版。

第二章　共青团员

要探讨十三岁的赵修业是如何加入共青团组织的，首先就得弄明白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如何在三十年代初进入河南滑县这么一个北方偏僻农业县份的。这样，我们的传记就必须涉及到一位姓聂名真的人。(1)

1926年，出身地主家庭的滑县南尖庄人聂真，从河南汲县省立第十二中学考入北京中法大学。随后不久，聂真结识了河北大学学生本县华家庄人胡敬一。(2)这二人又认识了北京大学学生河南浚县人郭小仓。而这个郭小仓，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样，思想激进的聂、胡等人便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宣传。这大约是1928年间的事情。(3)

1929年初，聂真和胡敬一二人返乡度寒假，发现本县拥有国民党籍的教育局长克扣教育经费，迫害教师，民愤很大，便发动并串联教师，上告局长。经过一番斗争，居然取得成功，教育局长被免职。这使聂、胡等年轻人兴奋不已，斗争性也更高昂了。(4)

1929年暑假，聂真和胡敬一又返回滑县，双双加入当时刚刚发展到北方偏僻农村的国民党，并且利用国民党滑县组织机构不健全、当地人不热心的机会，居然成为国民党滑县县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大体上控制了县党部。他们使用国民党以往也曾使用过的口号，大张旗鼓地搞起了“打倒列强”、“打倒土豪劣绅”的活动。在他们的组织下，滑县居然成立了清算委员会，清算起劣绅来了。他们还发动县里的民众，抗税抗捐，首先抗花生税和轧花车税，一时搞得热火朝天。不过，好景不长。他们到底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会隐蔽自己、保护自己，很快被国民党的上级党部发觉，被扣上“言论荒谬”、“行动越轨”的罪名，撤去县党部的一切职务。(5)

这样，聂、胡二人只好快快逃离家乡，返回北平(从1928年起

北京被南京政府更名北平)。到1930年11月,聂、胡二人由郭小仓和冷楚(时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介绍,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并参加北平东城区沙滩支部的工作。

1931年春天,聂、胡二人大学毕业,在北平谋公开职业不果,生活发生困难,又渴望投入轰轰烈烈的斗争,于是,向党组织提出返乡工作的要求,并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6)

1931年春夏之交,聂真和胡敬一先后回到家乡滑县。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和直南特委军委书记高克林先后来到滑县县城内鱼化街聂真的家中,为他们接转了党组织关系,宣布成立中共滑县县城党支部,聂真任书记,成员除胡敬一外还有刚发展入党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魏拔才,支部受濮阳中心县委领导。(7)

同年11月,中共滑县县委成立,聂真任书记,胡敬一任组织部长,魏拔才任宣传部长。县委下辖三个支部,除县城支部外,还有桑村支部和瓦岗支部。而桑村支部,就设在赵修业正在上学的县立第十七小学里。(8)

早在1927年,桑村完小(即县立第十七小学)思想激进的校长杨庆然就聘请了濮阳人徐仲三来校任教,而这个徐仲三乃是一名丧失了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杨、徐二人思想一致,又向本校教员贾怀堂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贾遂信奉之。1931年9月,聂真、胡敬一二人到桑村完小开展工作,恢复了徐仲三的党籍,并介绍杨、贾二人加入了共产党。徐、杨、贾三人成立桑村党支部,徐任书记。(9)这样,在三十年代初期,中共党组织便几乎是"偶然"地在滑县这个北方偏僻农业县份象滚雪球似地发展起来了。而桑村完小也有了中共组织。这时的赵修业,刚刚满十二周岁,正在桑村完小高年级读书。徐、杨、贾三人,或前或后都是他的老师。

这样,1932年6月的一天,还不满十三周岁的赵修业,与鲍鸿光等同学一道,在桑村完小一间简陋的教室内,面对着一面用黑墨水写上了CCY三个英文字母的红旗,宣誓加入了中国共青团。共

产党员徐仲三是他的入团介绍人。(10)当时，滑县根本没有独立的共青团的组织，而赵修业等人年纪又太小，不可能被发展入党，所以便由党组织来发展团员了。这在当时倒也不奇怪，许多地方都如此。

十三岁的少年，对着那面写有外国字母的神密的红旗宣誓，心灵深处无疑会感到加入一个秘密的政治组织的自豪、兴奋和惊喜。他当时所受到的革命教育，就是天下大同、受苦人翻身、抗日救国，争取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新世界等等。想必，少年当时是不可能想到这就是自己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的起点的。

赵修业加入共青团前后，正值滑县、濮阳一带革命形势高涨。赵修业在完小加入了"学生自治会"，同思想保守的教师辩论，并常在学校和附近的农村搞些散传单、集会讲演、宣传抗日救亡、抵制日货等活动。(11)所有这些，就是赵修业参加的最初的一些政治活动。

当时，濮阳地区的盐民斗争高涨。1932年5月15日(农历4月10日)，高克林、王从吾等共产党人率领数千盐民冲入汉阳县城，砸了盐务局，迫使县政府答应了盐民的大部分要求。(12)在滑县，盐民暴动也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县政府难以招架。一万多盐民砸了全县十二个盐务分局，分三路直奔道口镇，县长谢随安被迫答应了盐民代表提出的四项条件。(13)

但是，好景不长。濮阳地区的严峻局面，自然引起当局的重视。国民政府河南省主席刘峙、河北省保安司令庞炳勋各率一个团的正规军开赴滑县和濮阳弹压。(14)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北方党组织又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发动冀南磁县秋收暴动的同时，指示滑县配合起义。为此，直南(直南即河北省南部)特委书记高克林亲赴滑县桑村坐镇指挥，他就驻在桑村完小。8月初，当地党组织发动数百贫苦农民抢收地主的庄稼得手，遂筹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直南第六游击纵队"。他们画好

了以镰刀斧头为标记的红旗和番号符号，并准备于 9 月 15 日在濮滑边界一带同时发动，大举响应磁县暴动。然而，事情并不象共产党人预想的那么顺利，磁县暴动刚一发动即告失败，惨遭镇压。面对这种情况，桑村党的负责人杨庆然、贾怀堂等人为保存有生力量，没有贸然发动。不料，这一适宜的应急措施，却受到直南特委的严厉批评。特委决定开除杨、贾二人的党籍。(15)在当时党内"左倾"情绪泛滥的情况下，这是司空见惯的做法。

尽管滑县桑村的暴动未能发动，但此事仍被告发，刘峙于 10 月 8 日率兵抵滑县镇压。聂真和胡敬一各以五百大洋悬赏遭到通缉，在本地无处存身，只得逃亡外地。聂真返回北平，胡敬一调到濮阳中心县委，魏拔才逃到开封，并从此脱党。王从吾病了一场，隐蔽乡下，滑县县委从此停止工作，各支部人员星散。(16)看来，赵修业加入共青团才仅仅几个月，就又失去了组织关系。他那年不过十三周岁，父亲又是乡绅，所以不用逃亡他乡。

我们并不十分具体地了解赵修业在 1932 年夏这场斗争中起的作用，但可以推断，他不过扮演了一个呐喊助威的角色。作为赵庄首富的赵家，在阶级斗争中曾受到某种冲击，尽管赵家曾经是一些革命者暂时藏身的所在。(17)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赵廷宾对革命的态度。他对儿子从事的事业，至少是默认的或同情的。据说，在这场未遂的起义中，赵修业"擅自"把家中的骡马等大牲畜卖掉，将款子交给党组织。为此，自然也引起父亲的几分不快。

这几个月的共青团员的经历，对我们的传主意义深远，并使他跻身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革命"的行列，使他能够与老红军平起平坐了。同时，他也受到了一次难得的锻炼，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革命高潮"和"白色恐怖"。这对一个少年说来是太难能可贵了，使他早早地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浪。后来，当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又以共青团员的身分返回家乡接上组织关系，并由团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8)这自然成为他日后在政

治上迅速成熟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对于儿子"闹"了一阵又回到自己的身边，赵廷宾倒是颇感满意。他仍不遗余力地供儿子上学。儿子不安于在桑村这个狭小闭塞的天地里呆下去，父亲便于1932年秋天资助他赴县城县立第一小学读书。当时，赵修业已在桑村小学上满小学五年级，距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毕业还有一年。说来也可怜，当时，滑县尚没有一所新式中学，县立第一小学便是全县的"最高学府"了。

不过，这所县立一小的校址可不寻常，它设在县城的欧阳书院里。这所欧阳书院历史悠久，声名赫赫。北宋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朝廷贬欧阳修为武成军(今滑县)节度判官，居县城东南隅一书院内，历时数年。欧阳修曾在这里写下千古传吟的"秋声赋"。后人遂将此书院称为"欧阳书院"或"秋声书院"。书院内外树木葱郁，有一名叫文湖的小湖泊，波清如镜，湖畔苇缨如雪。自北宋以来，路经滑地的文人墨客，大多在此题诗作赋，发思古之幽情。而历代的滑县知事州官，为标榜自己的文治政绩，也都推崇书院，并多次修整扩建。明朝万历年间重建后命名"秋声书院"。清朝顺治年间重修后遂称"欧阳书院"。嘉庆年间又一次毁于兵燹，光绪年间重建后改为"欧阳学堂"。民国以来一直是县立第一小学的校址。抗战期间，又一次被日军毁坏，至今只剩下遗址可寻了。(19)

在这么一所历史悠久、文治斐然的书院内就学，少年的赵修业内心之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我们无从猜测。不过，可以断定，古代伟大哲人的道德风范，恐怕不会不对这里的学生们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在这个期间，赵修业失去了共青团组织关系，只能与个别"组织上"的人有点联系。他埋头学习，学校的藏书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县城的学习条件，比之桑村不知强了多少倍。但是，滑县毕竟仍是一个小天地，一个少年如果老在这儿，是见不到大世面的。

1933年夏天，赵修业六年制小学毕业。这时他年近十四周岁，

虚岁十五岁，如果不到更大的地方去上初中，就只能返回赵庄老家去。实际上，完小毕业的学生们大多数也只有这个归宿。经过一番“斗争”或“较量”，他说服了父亲，在父亲的资助下，以良好的成绩考取了设在开封的省立初级中学。与他同时考取河南省立初中的共有滑县完小的六名毕业生。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城，乃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当时人口十多万，比起不过是个“大村子”的滑县县城不知热闹了多少倍。开封座落在豫东平原上，陇海铁路经过，北临在高高河堤内奔流的黄河，市内的相国寺、铁塔等名胜均为北宋时代留下的古建筑。在历史上，开封是赫赫有名的东京城。

据当时的同学们后来回忆，赵修业在初中数学成绩较好，除了完成规定的作业外，他经常从《万有文库》丛书中查出习题解答，深得数学老师的赞许。他还喜欢英文课，学得认真。他对中文课也喜欢，尤其勇于报名上黑板默写词句。在初中的三年学习期间，他的学业一直处于上乘，多次获得校方颁发的奖学金。赵修业还在校内参与组织救亡团体。他与许延寿、胡佛、宋建生等十五名同学发起成立了名为“启茅社”的小团体，意在互相鼓励、启发茅塞。小团体的活动内容多为办墙报、郊游调查民情风土、课余节假日阅读进步救亡书刊等。

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赵修业与“启茅社”的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声援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斗争的活动，并以初中生的身份参加了开封高中大龄同学组织的卧轨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的斗争。他还在斗争中为省立初中办的取名《火炬》的油印刊物撰稿。(20)

据说，赵修业在开封上学时的先后同学中有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焦若愚和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赵浩生等人。(21)

一九三六年夏天，赵修业学满三年初中，在父亲的资助下，又

继续求学，考入武昌高级中学，背着行李只身来到武昌。这时的赵修业，已是一个将近十七周岁的青年了。

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正处于大动荡的风暴之中。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驱两万五千里，抵达陕北，旋即又挥兵渡黄河，东征山西。徐向前、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苦斗于川西康藏区域。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转战于西南的重山峻岭之中。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军事上处于鼎盛，政治上亦走向统一。日本帝国主义亡华之心日炽，华北危急，东南有险。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益为全国大多数阶层所不满，执行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又有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失去了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赵修业，作为一个少年时期曾准备参加红军游击队的青年，自然十分关注在万水千山、雪山草地中长征的红军的命运。他已经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激进的青年，而是在政治上有明确归属的青年了。

武汉是华中第一大都会，位于九省通衢，市面繁华，思想活跃。赵修业在大武汉度过的一年多的高中时光，对他的一生关系重大。在武汉，他见到了更大的世面，大开了眼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在闭塞的乡间形成的气息，投身到当时已是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不过，从他对本人历史的自述中，此时他似乎还没有重新接上共青团的组织关系。在当时的武汉，共产党和共青团员少得可怜，而且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若没有特殊的关系，想接上组织关系是难上加难的。

十七岁的赵修业，在大武汉如饥似渴地观察着城市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学习着各种文化知识，其中有些新现象和新知识，他在家乡县城及省城都是没有接触过的。同时，他也为祖国的命运担忧。日本军阀对中国的蚕食侵略，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开

始，变本加厉，到一九三六年，达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连一贯对日妥协退让的南京国民政府也感到退无可退了。东北已失守，华北及华东的一部分也危在旦夕，祖国处于危难关头。现今作为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就创作于一九三六年，其中的警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的确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的心声。

赵修业从十三岁在桑村完小加入共青团之日起，就以抗日救国为己任。此时，他面对着祖国山河破碎，日寇节节进逼，心急如焚。于是，他又投身于当时在武汉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抗日救亡活动之中。

逢到节假日，远离家乡、住宿学校的赵修业，便独自或与同窗好友一起登上龟山、蛇山，眺望着涛涛东去的长江，心情难以诉说。此时此刻，质朴少文的赵修业，也情不自禁地吟诵出苏东坡的千古绝唱：“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赵修业朝北方远望，黄河北岸自己的家乡仍然是那么贫困多灾。赵修业向西北长眺，在茫茫的西方，各路红军正苦斗于陕北高原和川西的雪山草地之间。赵修业环顾四周，龟蛇二山，夹大江而立，如同一把巨锁，钳住浩莽的江龙。千古名景黄鹤楼已经荡然无存，连遗迹都难以找到了。此时此刻，他也不免领略到了唐人名句中“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的苍凉意境。

在一九三六年这一年里，不论是中央红军渡黄河东进，日本在华北增兵，还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陇东、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和平解决，这一切，都使十七岁的赵修业怀着兴奋、不安、忧虑的心情，予以极大的关注。

从十四岁到十八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龄阶段，在这段时期，赵修业的智力迅猛发展，思路愈加开阔，体格逐渐长成，信仰更加坚定。对于赵修业这样一个在北方偏僻农村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青年来说，能够在这个关键性的年龄阶段、在开封、武汉这样

的省会城市和现代大都会里求学，其意义之深远，的确是难以估量的。黄河的子孙在长江边求学时期，赵修业自行改掉了父亲给他取的名字，用了“紫阳”这个新名字。

赵紫阳这个名字，的确具有气派。十八岁的他为什么给自己取这个名字？我们不妨在这里试着猜测分析一下。首先，他不满意原先的那个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这是可以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传主，已经是一个加入共青团的“赤化”青年了。当时，在名字中是决不能出现“赤”或“红”等字样的，因为这会招来横祸的。于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愿，传主就使用最接近“红”字的“紫”字了。红与紫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从“万紫千红”和“姹紫嫣红”这两个成语就可想而知。“紫”字同时也是个很有意义的字。“紫气东来”这个句子常常成为春节对联中的横批。至于“阳”字，其含义就更明显了。阳者，太阳也，它表明了年轻的传主在黑暗中向往光明的强烈愿望。

从传主自行改取的这个名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代就有了不平凡的志向和投身于革命运动的决心。一个人的名字，尽管只是一个名词符号，但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叫这个名字或那个名字，在社会上及历史上所产生或留下的影响往往大不一样。比如，赵修业如果不在中学时代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紫阳”，那么，数十年后就决不会有那个传遍“天府之国”及华夏大地的“要吃粮，找紫阳”的民谚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的炮声和“八·一三”的火光，震动了古老的中华，惊醒了辽阔的神州。日寇大举入侵，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战军兴，大风暴来临。刚交十八周岁的赵紫阳再也不能在武昌的学堂中呆下去了。他毅然辍学，迎着日本皇军南下的兵锋，北上回乡，回到战火即将弥漫的家园，决定投入一场新的、比自己前几年经历的事件大无数倍的巨大斗争之中。(22)

根据作者对历史的研究，在近代的中国，一位政治领袖的造

就，往往必须在其早年就要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第一，他出生一个苦难、贫穷，乃至闭塞的乡间，并在那里度过童年。这样，他对人民的疾苦，对世事的艰难，就会有深刻的感受和认识，从而产生奋斗和上进的强大动力，并能够不屈不挠地顽强拼搏和斗争；第二他具有出众的天赋，较高的智商，否则他就不可能在众多的竞争者和复杂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冲闯出来，战胜对手，保护并发展自己；第三，他的家境不太穷困，或者按当地的标准比较富有，这样，他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就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不然的话，即使天赋好，智力也得不到及时的开发，学识也得不到长足的进展，从而不能承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当然，任何领袖伟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机遇的获得、时代的呼唤和事业的性质等因素。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三个条件，只是就童年、少年时期就必须具备的条件而言的。当然，只有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才能论及尔后必须具有的那些重要因素。

翻开一部中国近代史，人们可以看到，不仅湖南湘潭出生的毛泽东，苏北淮安出生的周恩来，四川仪陇出生的朱德和四川广安出生的邓小平，都具备这三个条件，而且广东花县出生的洪秀全，湖南善化出生的黄兴和广东香山出生的孙文，也大抵如此。就连湖南湘乡出生的曾国藩，河南项城出生的袁世凯和浙江奉化出生的蒋介石，都概莫能外。

而我们的这位传记人物的家世、故乡和童年的情况，则又一次证明了上述判断。

至于那些一领风骚十数年或数十年的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及大文学家，倒是大量地产生于大都会或沿海的发达地区。在那些领域，沿海及大都会出生的人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看来，政治领袖的产生和成长，既不是什么天赐神助的结果，也不是偶然地、自发地出现的，而是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寻的。

（1） 聂真，又名聂元真。1908年生于滑县留固乡南安庄村。

1937年10月，聂真南下任中共晋冀鲁豫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1938年至1943年，任晋豫区委书记、代理太岳区党委书记等职。

1946年，任晋冀鲁豫中央局民运部长，1948年之后任北方局党委组织部长、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副校长等职。文革中被冲击，1975年"审查"结束，1977年恢复全国政协委员职务，1984年退居"二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

载中共滑县县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办公室印：《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1期"中共滑县党史人物简介"第62－63页。

（2） 胡敬一，原名侯介槐。1902年生，滑县上官村化家人。1932年调直南特委工作，1933年在山东被捕，旋送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1937年春，被营救出狱，抗战时期在平北、平西抗日根据地工作。1951年南下广州。1965年调南京任中共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被定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之一，含恨死去。同（1），第63—64页。

（3） 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刘守森："滑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前期活动"。载《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1期第15页。

（4） 同（3）第15页。又见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1925—1949年）上编（1986年12月）第3页。

（5） 同（3）第15页。

（6） 胡敬一："我在滑县搞建党工作的情况回忆"。载《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1期第23页

又见聂真："关于滑县革命运动和建党过程的一段回忆"，载《革命回忆录选》第一集，中共安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第149—150页。（1982年10月）

（7）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1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版。

（8） 同（6）第23页。

（9） 同（6）第23—24页

（10）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上编第13页。

关于赵紫阳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为徐仲三的情况，系赵本人于1967年5月26日与广州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代表谈自己历史时称，见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情况反映"1967年19期（5月31日印）。

（11） 同（10）上编第13－14页。

（12） 同（7）第8页。

（13） 常祸森："精神永存的滑县盐民斗争"。见滑县《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1期

第54页。

(14) 同(7)第9页。

(15)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上编第15页。

(16) 同上。

(17) "高克林同志回忆在濮滑工作片断"。载滑县《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1期第22页。高克林,陕西华县人,1907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1931年春任中共直南特委军委书记,曾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8) 赵本人1967年5月26日与广州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代表的谈话。

(19) 卢印哲:"滑州通判欧阳修",载《滑台春秋》第163－165页。

(20) "赵紫阳同志在开封省立初中",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刘守森根据宋健生、尚希三等人回忆整理。

(21) 祁林:"赵搭生抛物线",载《环球》杂志1988年第6期,第19页。新华通讯社主办。

(22)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上编第22页。

第三章　从党校学员到县委书记

1937 年秋天，当十八岁的赵紫阳刚刚返回家乡时，整个黄河以北已经是一片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悲惨景象。7 月 29 日和 30 日，古都北平和名城天津沦入日军之手，骄横万状的日军，对整个华北大举入侵。10 月 3 日，日军侵占德州，10 日陷石家庄。11 月 4 日，豫北重镇安阳失守，国民党在华北的军政人员和广大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纷纷抢渡黄河南下。当时的局面，颇似一千多年前李太白唱出的诗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11 月 27 日，日军羽翼下的伪河南自治政府在安阳成立。

刚刚返乡的赵紫阳，一时尚未接上组织关系。面对急剧变化、风紧云急的形势，他不甘消极等待，遂与牛万里、刘子明、张志明等同乡青年一块，在濮阳、滑县边界一带建立起进步的青年组织"通俗学社"，并开展一些初步的抗日救亡宣传鼓动工作。后来，这些青年大都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濮(阳)滑(县)东(明)长(垣)抗日救国会的骨干力量。(1)

在民族危亡之秋，中国共产党承担起在华北抗战的重任。1937 年 8 月至 9 月，八路军的三个师相继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 月 25 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取得歼灭日军一千余人的重大胜利(当时宣称歼敌三千)，一时间，在全国树立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形象。

1937 年 10 月，原中共直南特委书记王从吾、濮阳中心县委书记蒋中岳先后出狱，王从吾派蒋中岳返濮滑边界恢复党组织。同月，时任中共直南特委组织部长的聂真赴豫北巡视工作，着手成立滑县抗日保安总队，同时整理星散的中共组织。到同年年底，中共滑县组织有所恢复和发展，支部达到七十个，党员将近二百

人。(2)

1938年1月,日军一部沿平汉铁路南下,由新乡沿道清支线朝东北进攻,侵占了滑县道口镇(今滑县县城),大肆烧杀掳掠、侵略军的铁蹄踏上滑县的土地。国民党杂牌军石友三部抵挡不住,大部南渡黄河。中共直南特委刚刚组织起来的抗日四支队于濮阳以南袭击日军,毙伤日军三十余人,掩护了国民党濮阳专员兼保安司令丁树本的部队。这本是一场小仗,但在当地很有影响。丁树本开始与中共合作抗日。共产党可以在濮阳、内黄和滑县公开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活动了。(3)2月17日,新乡沦陷。国民党新八师炸断了黄河大铁桥,退守郑州。日军被阻于黄河以北。黄河在若干年内成为划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天险。

在这个背景下,1938年2月,赵紫阳终于与共产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为他接上党组织关系并同时成为他入党介绍人的是蒋中岳和中共濮滑边工委书记李光录。(4)他五年多以前加入共青团的身分被认可,并马上成为拥有数年光荣历史的骨干。4月10日,中共直南特委派遣赵紫阳等数人赴设在山西境内太行山区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这所北方局党校,同时也是一所八路军一二九师办的抗日军政训练学校。

八路军一二九师驰名中外的师长刘伯承,本是中央红军的参谋长,1935年8月当毛泽东与张国焘长征中分兵于川西毛尔盖时,被滞留于红四方面军一年多。一二九师的首任政治委员是张浩(林育英)。张浩是1935年11月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归来入陕北的,在党内威望很高。到1938年1月,张浩调回延安另有重任,一二九师政委由原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接任。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为一二九师副师长。这样,赵紫阳从这时起就成为刘、邓、徐的部下了。

1938年5月,党校的党组织确认:赵紫阳当年2月接上组织关系的时间即为转党的时间。(5)这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

做法，在红军时期是不少的。这么看来，赵紫阳于十三岁加入共青团的优势就越发显示出其潜力了。

当时，活动于冀南一带的八路军部队是以陈再道为司令员、李菁玉为政委的一二九师东进纵队。至当年3月，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抵达南宫，接任东进纵队政委。3月20日，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在河北南宫成立。5月初，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三个主力团进驻冀南，以加强西至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南至陇海路，北至沧石路的大平原地区的抗日斗争。(6)

1938年9月，赵紫阳学成返回滑县，旋即担任了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当时，这个县工委并没有政权支持，所属党员倒不少，已达千人了。(7)看来，在决定由赵紫阳任县工委书记时，当然考虑到他已是个有几年革命斗争经历的骨干这一点了。至于党员人数的发展，是由于中共中央于1938年3月发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内称：“大量地千百倍地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而严重的任务”。冀鲁豫边区的直南和豫北两个地区，到1940年4月，党员已发展到两万四千余人，比之“七·七”事变前的几百人，增加了数十倍。(8)不过，那个时期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在不少地方均带有“完成任务”的特点。比如，有的地方敲锣打鼓鼓动入党，发小红旗给入党者等，部分农民群众并不怎么清楚入党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这种“突击入党”的工作，也是当时实际斗争的迫切需要。北方广大地区的共产党组织，本来就很薄弱，在三十年代又迭遭破坏，党员所剩无几，极不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如今，党组织有了猛烈发展的大好时机，自然不可错过。后来，中共中央鉴于党员人数大发展后的实际情况，又发新指示调整了发展党员的有关政策。

1938年9月25日，也就是赵紫阳刚返乡担任县工委书记之时，由杨得志率领的老八路打到滑县，一举攻占了滑县县城。虽然

县城于11月9日又被日寇夺去，但此举仍大大促进了共产党在滑县的发展。要知道，这是县城第一次被共产党的军队占领。

到1938年年底，以赵紫阳为书记的滑县中共党组织，已有一百四十七个支部和两千多名党员了。(9)而这时的赵紫阳，才是个刚满十九周岁的青年。

大风暴的年代，会产生奇迹。试想一下，赵紫阳如果不在“七·七”之后毅然辍学返乡，到抗日的烽火中去搏击，而是贪恋学业、贪恋大城市，那他将只不过是一个辗转流亡于大后方的青年学子。在故乡的土地上，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他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家乡有威望的青年“群众领袖”了。

另外，在考察赵紫阳在党内迅速成长的原因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从1927年秋到1937年秋，赵紫阳在乡、县城、省城和区域性大都会受过十年完整、正规的新式教育，这对他的一生关系重大。经过这个教育过程，他就有了本乡本土的干部难以具备的广阔思路、丰富知识和开放眼光，从而在斗争中迅速进步。1939年2月，杨得志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原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编成的部队)到达濮、内、滑三县所处的黄河故道沙区，执行整编、扩大部队的任务。随即这支八路军主力改称八路军冀鲁豫支队，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五个大队，全支队共四千余人。杨得志为司令员，崔田民为政委。从此，濮、内、滑一带有了八路军主力，滑县共产党的工作自然更好开展了。

同年春，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紫阳改任县委书记。而此时的县委，比之去年的工委又强大了许多，已经有了一块不小的地盘和一些地方武装，又有主力部队作依靠，俨然是一个小政权了。(10)

赵紫阳本人从党校学习归来不过半年多，就在县内办起了青年抗日训练班，亲自讲课，并介绍成批的青年入党。(11)

1939年3月，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赴洛阳参加第一战区长官部召开的会议，会上传达了蒋介石发出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丁树本本来就对中共在他的地盘上迅速发展存戒心，这回得到上峰的旨意，遂开始防范、打击中共的力量。同月，在赵紫阳的劝导下，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业绩的感召下，赵紫阳的老同学、国民政府委任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人枪二百余宣布脱离国民党系统，接受共产党改编。(12)此举，极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在滑县的力量对比，同时也可以视为赵紫阳的一项成功的杰作，他的魄力和才干更加为上级所器重。

1939 年 4 月，中共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13) 8 月，滑县抗日救国会成立。

这里要提一下，后来成为赵紫阳夫人的梁伯琪，此时担任了滑县抗日救国会的妇女部长。这位梁伯琪，也算得上是个巾帼英豪。她比赵紫阳小一岁，内黄县人，中农家庭出身，也在开封、汉口等城市上过中学。1938 年 4 月参加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运动，8 月加入共产党，10 月还担任了中共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鲁豫总队的总队长，(14)同时在中共直南特委当宣传干事，并任滑县妇女救国会主任。看来，她与赵紫阳如果不是在上中学时就认识的话，至少在 1938 年就结识了。

1939 年 6 月，随着中共组织的发展，赵紫阳上调到豫北地委担任了宣传部长。梁伯琪也调地委任妇女委员。(15)

1939 年 11 月中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视察了冀鲁豫边区。12 月 5 日，邓小平在山东大名县小营镇召开直南、豫北两地委干部会议。当时任豫北地委宣传部长的赵紫阳参加了会议。这是赵紫阳第一次见到邓小平。(16)当时，邓小平三十五岁，赵紫阳二十岁。不过，在那种场合，身为师政委的邓小平恐怕难以记住众多干部中的赵紫阳。他们二人在战争年代的更直接的交往是在尔后的几年中发生的。

进入 1940 年以后，由于日军在正面战场停止了战略进攻，敌后的抗日战争变得特别严酷起来。丁树本所部经受不了日军沉重

的军事压力，被迫南渡黄河。国民党又一任滑县县长贾心斋在或者南渡或者跟随共产党的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于当年3月间率部接受八路军改编。(17)

仅仅两年的时间，赵紫阳便在共产党组织内走完了从党校学员到县委书记的历程。这个时期，也正是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河南省和黄河以北地区一般也包括在这个广义的华北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就滑县来说，在赵紫阳担任工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时期，党的组织也从原来的廖廖无几发展起来。由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来往征战，中共滑县县委也从最初的半地下式的流动工作成长为一个执政机构了。随着连续两任国民党委任的县长转向共产党方面，远处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和避往洛阳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已无力再委任滑县县长及往滑县派驻机构人员。设在安阳的日军羽翼之下的伪河南省自治政府，由于其官员大多系东北及冀东一带人，完全是日军的傀儡，也染指不得滑县。共产党和八路军算是在滑县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在这一份成绩中，自然有县委书记赵紫阳的一份功劳。

然而，抗日战争是漫长艰苦的，日军的铁蹄仍然在无情地践踏着多灾多难的国土。随着赵紫阳于1940年春升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下属的第三地委书记，抗日战争中最严酷的年代来临了。赵紫阳必须手执武器在血雨腥风的敌后战场上与日寇苦斗。

(1)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上编)第22页，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年12月)。

(2) 同上，第23页。

(3) 同上，第24页。

(4) 原北京市铁路局总工会主席李光录回忆。

(5) 赵紫阳1967年5月26日与广州中山大学"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代表的谈话，见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情况反映"1967年19期(5月31日印)。

(6)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56 57页，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7) 同(1)第27页。

(8) 《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第98页，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 同(1)第28页。

(10) 同(1)第27页。

(11) 同(1)第28页。

(12) 同(1)第29页。又见同(6)第72页。

(13) 同(1)第29页。

(14) 《中共河南濮阳市组织史资料(1926--1986)》第52页，中共濮阳市委组织部、中共濮阳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濮阳市档案局合编，1986年12月。

(15) 同(1)第31页。

(16) 同(6)第104页。

(17) 同(1)第33页。

第四章　地委书记

1940年4月18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王从吾和张玺任正副书记（张玺后任书记），军区司令员为杨得志，军区政委为崔田民。区党委下辖四个地委，赵紫阳担任第三地委书记。(1)第三地委管辖濮阳、滑县、长垣、东明四个县委，它只存在了三个月，即从1940年4月到6月。第三地委未设副书记，组织部长为张建廷（后牺牲），宣传部长为魏晓云，秘书长为黄鹤鸣、肖国贤。(2)至此，不满二十一周岁的赵紫阳担任了地委书记。此刻，距他辍学返乡才两年半的时间。应当讲，赵紫阳在党内的进展，不可谓不快矣！然而，一个人地位的升迁与降贬，往往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制约。赵紫阳在地委书记这个权力档次上，进进退退地度过了十三、四个年头，直到全国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他才在广东担任了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这样一个更高的职位。

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的冀鲁豫边区的开辟，严重地威胁着日军控制的平汉、津浦、陇海三大铁路交通线。不仅如此，它地处大平原，处于四战之地，故成为日军必欲除之的心腹大患。赵紫阳刚上任地委书记，边区的形势就发生重大变化，局面一下子极端严重起来。1940年6月，日军发动空前残酷的"五·五"大扫荡（农历五月）。日军集中驻开封、新乡的第三十五师团、驻商丘的第四旅团，步骑近万人，汽车、坦克一百七十余辆，分兵三路进击边区。日军所到之处，屠杀焚掳，大肆破坏，战斗十分激烈残酷。到7月份，日军侵占了清丰、南乐、濮阳、内黄、长垣、东明等县城，增设据点三十余处，形成对边区的分割包围。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主力难以硬拼，跳越到外线去了。(3)

赵紫阳所在的第三地委的管辖地区斗争最为残酷。主力部队

撤走了，地方部队打散了，加上根据地工作中一些左倾政策的影响，一时间，反动会道门猖狂起来，配合日伪行动。赵紫阳在根据地苦斗半个月，数度面临被敌合围、消灭的危险，部队几乎打光，只得率仅有的一支小队伍突围出来，进入尚有根据地的第二地委地区。(4)当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各个区委、县委、地委的管辖地盘面积是常常变化的。如果地盘被敌入侵占，地委、县委也就成为"流亡党委"。这是可以想像的。

赵紫阳进入第二地委后，第二、第三地委合并，称第二地委。赵紫阳担任了这个新地委的书记，党委机关设在滑县万古和高陵县一带，下属卫南、昆吾、濮阳、高陵五个县委和长垣、濮东、濮北、濮南、卫西五个工委。(5)当时敌我态势犬牙交错，互相分割，往往一个县委或工委的辖区只是一个县的一部分，或者是两、三个县交界处的一小片地块。我们不能以现今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组织结构。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处境最艰难的阶段。一九四一年初，日本军阀为了将华北占领区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集中侵华的大部兵力，加紧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日军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平原地区，然后才是山区。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强化治安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攻抗日根据地。冀鲁豫边区地处平原，与平汉、津浦、陇海等铁路大动脉紧密相连，首当日军进攻之冲。日军驻扎的边区的部队达五千余人，据点113处，伪军二万多人，据点130余处，修筑公路20条。(6)此外，边区范围内还有国民党系统及各色杂牌武装五万多人，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与共产党作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从事抗日斗争。总之，边区的斗争呈现复杂激烈的三角斗争状态。

1941年1月，边区成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冀鲁豫行署，主任晁哲甫，副主任崔田民、贾心斋。7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决定，撤

销中共鲁西区党委，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在观城县红庙村合并，仍称冀鲁豫区党委（人称大冀鲁豫区），辖七个地委，原鲁西区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委名称不变，原冀鲁豫区的第一、第二、第三地委改为第五、第六、第七地委。赵紫阳任第六地委书记，党委机关设在滑县，下辖濮阳、昆吾、卫南、高陵、滑县、长垣六个县委和卫西一个工委。(7)

一九四二年九月中旬，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由苏北、山东返延安途中，经过冀鲁豫边区，对边区的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刘少奇肯定边区保持了华北与华中、华东的战略联系，未被敌人打垮挤走的成绩，同时也批评边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工作有严重缺点。他说：如果不发动群众，就是机会主义，而没有群众，就没有根据地。(8)

10月，鉴于局面更为严重，根据地日见缩小，浅水养不了大鱼，于是，中共中央发出精兵减政、正规军地方化的指示。据此，冀鲁豫边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缩编调整，原第一、第四地委合并，称第一地委；第五、第六地委（赵即为第六地委书记）合并，称第四地委。这个缩编的第四地委较大，包括整个豫北地区，所以又称豫北地委，张玺任书记，赵紫阳改任副书记，下辖六个县委和两个工委。(9)张玺乃是党内老资格的高级干部，曾任边区书记，此时改任地委书记。

1943年1月，边区第四军分区（第四地委所辖部队）第二十一团的部队换上便衣，对外称游击队，由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和团长常仲连率领，开赴滑县以南、延津以北开辟新区。同月，二十一团在部耳寨歼灭伪军一个营，缴获电台一部。(10)值此紧急关头，赵紫阳显示出了指挥部队独立作战的才能。

7月，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和第四地委，决定将滑县作为开展雇佃贫运动的试点县，派遣三百余名干部下去开展工作，由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就地进行具体指导，边区青年救国会组织部长纪登奎兼

滑县抗联主任。从此，赵紫阳直接参加了解决土地问题这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并获得了“土地问题专家”的声誉。同月，赵紫阳、纪登奎及滑县县委书记马瑞华，在滑县陈家营召开县、区两级干部会议，布署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雇佃贫运动。首先发动雇佃群众减租减息，增资增佃，展开民生斗争，即要求地主、富农实行“五·一”减租和“分半减息”，“二·五”增佃，使群众从斗争中获得直接而明显的经济利益，改善生活，以提高斗争的积极性。后来这个运动又实行了累进制赋税合理负担，结合清查地主、富农“黑地”的斗争，减轻贫农、中农的田税负担，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加强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11)雇佃运动在滑县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虽然也不时出一些问题，但总的讲是很成功的。这项活动既使赵紫阳声名大振，也使他获得了许多农村工作的经验。

就在滑县雇佃贫运动大开展之后，大约在当年的春天间，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偕夫人卓琳经冀鲁豫边区至太行山区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返回延安，由边区的武装工作队护送。为安全计，卓琳还女扮男装。邓小平对边区的工作作了指示。(12)由于赵紫阳正在滑县主持运动，邓小平又是行程匆匆，所以二人未能见面。

到 1943 年底至 1944 年初，赵紫阳赴太行山老区参观学习了几个月，对北方局的情况有所了解。(13)但当时刘、邓首长都赴延安去了。

1944 年 5、6 月间，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平原分局，书记为黄敬、代理书记为宋任穷。(14)平原分局包括直南、豫北和鲁西三大块根据地，下辖十二个地委，赵紫阳任第九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第九地委书记为老红军干部张国华，地委机关设在滑县，下辖六个县委和两个工委。

春夏之际，滑县的双减运动形成高潮，经验也趋于成熟。同年 10 月，赵紫阳在中共平原分局的机关刊物《平原》第二期增刊上发表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撰写的最重要的文章《滑县群众是如何发

动起来的》。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引起了上级党委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鉴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平原》编委会专门为它加了“按语”，“按语”全文如下：

“群众运动不能深入的基本原因，是我们群众观念淡薄，以致在领导方法上包办代替，束缚了群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滑县工作是在纠正包办代替，实行大胆放手，从群众切身利益与现有的政治经验出发，发动起来的。这是滑县工作成功的地方，个别区（二区）的工作未搞好的教训，就是包办代替，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转变。紫阳同志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贯彻了从群众中来的领导方法，望同志们读后详细研究。”(15)

从编委的这个“按语”中，人们还可以看出对作者的推崇。

在这篇长文中，赵紫阳全面介绍了滑县的运动情况，并总结了领导者如何克服“左”、“右”两种倾向的经验教训。文章的中心内容是：一方面，决不能用“框子”去限制农民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决不能“乱”和“蛮干”。人们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所得到的启示。本来嘛，发动农民的办法也是大同小异的。不过，在毛泽东的那篇著名文章中没有谈到的防止“蛮干”这个重要的问题，赵紫阳的文章却加以重视了。

就在赵紫阳家乡从事农民的民主民生工作期间，梁伯琪从边区妇女工作委员会下到滑县帮助工作。二人又在一起工作了。这样，在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现的1944年夏秋之际，赵紫阳与梁伯琪结婚了。当年，二人都只有二十四五岁，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他们不仅有四男一女，还有了若干孙子女和一个外孙。再过几年，他们就将度过人生旅途中极可宝贵的结婚五十周年金婚纪念日了。

1945年4、5月间，赵紫阳又在滨河县（根据地内新建的一个县）新店主持召开土改工作干部会议，并在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这个报告对于人们认识赵紫阳的工作作风和政策思想，是很有价

值的。

在这个报告中，赵紫阳首先讲到：

"根据地目前是执行的新民主主义政策，要削弱封建经济，发展小农经济，就要走减租、增佃、减息、生产的路子。……我们走了民主斗争的道路，它带着极大的经济意义。它要部分解决土地问题，还由于它把地主对农民的经济作了清算，就直接把封建经济基础给予了致命的摧毁，但这并不等于均产，因为只是经过了民主斗争。对地主，由于其罪恶轻重也给了文斗、武斗、反省三种形式的轻重不同的处罚。"(16)

接着，赵紫阳又谈到：

"特别是年前年后这一段，在农村里起了一个非常的变化。地主们没有不害怕农会的。他们说'了不得，谁敢惹农会的人，农会说啥是啥'，和过去地主说啥是啥成了反局，随便一个毫无地位的农民，现在一跃而成为新的统治者，变而敢与地主当面对话、争执、甚至脚踢拳打、当面嘲笑、诉苦、报冤。他们完全翻了身，生活得到了改善，没有顾忌地要了地主的地，作为自己的财产。……农会成了农村唯一最有权力的组织，高于一切组织。农民和地主截然分开。这在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看来是很满意的。从生活上说，他们由穷无立锥之地，食不饱，衣不暖，得到了今天的生活，这在一个最低的人道主义立场看来，也是可赞美的。"

在这里，赵紫阳表明自己对彻底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肯定。

赵紫阳在这个报告中还讲到反对农村中的平均主义问题。他讲到：

"农民本来就有推平思想，有土地要求（过去苏维埃革命影响在华北农民中留下神秘的印象）。现在农民这种思想比过去明显了。这是因为农民行动逐步提高，同时根据地局面稳定。斗争中农民往往就是这种'推平'思想的支持者。其次按人留地也是一种影

响。我们当时强调不够。这个思想本身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但在目前必须受到约束。群众否认了富贵由天，认为削弱地主、发展自己是合理的。这正是阶级性提高的表现，但如果不加约束，便会斗到中农，影响生产情绪，农会会员不敢多要地，不愿要孬地，会阻碍今后贫、中农的上升，所以必须约束。"

赵紫阳还讲到农村中另一部分带有某种特殊性的问题，即农民中落后阶层的问题。他指出：

"也有些农民中的落后分子，他们好接近地主，说落后话，群众也往往要斗他。这种落后分子基本上不应用阶级斗争解决，而应当争取他们。这种现象在青年、妇女斗争中特别容易发生。因为他们没有学会认识自己的具体作用，而把家庭内部的民主斗争，用阶级斗争的一套来代替。这样不仅造成新的不和睦，而且造成了青年、妇女发动的障碍。因此，儿童乱斗，特别需要给予适应的制止。一方而他们本身成分复杂，无策略可言；一方面他们往往以斗争为游戏。"

看来，赵紫阳不愧为"土地问题专家"。他对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分析判断，是很内行、很深刻的。人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淋漓尽致地目睹了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儿戏的那套"发动"青少年的做法。

赵紫阳在报告中还专门讲到培养基层干部民主作风和反对新贵族倾向的问题。他讲道：

"在滨河干部中朴素的农民作风是不大好的（特别是男女关系和生活习惯上）。这种作风基本上是脱离群众的。这种作风很容易影响到村子的作风，特别是村干部的作风。男女关系如此，吃喝、浪费（甚至贪污）、不民主也如此，甚至有些村干部的坏作风是由于区干部本身的不严肃，也就是村干部的坏作风在我们跟前的合法地位，存在并发展。因此要反对村干部的坏作风，必须先反对我们干部中的这种坏作风"(17)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当时的赵紫阳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思想比较全面的领导者了。他有了一定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口才也不错，看问题、分析问题都头头是道，又不偏离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应当记住，这时的赵紫阳才二十六岁。

1945年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和副书记宋任穷，专门召集赵紫阳和滑县县委书记张华、县长程建明等人到山东冠县座谈土改问题。在座谈中，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赵紫阳总结出来的滑县经验，并决定将这一成功的经验向全大区推广。这次会见，是迄今为止我们知道的给邓小平与赵紫阳双方、特别是给邓小平造成深刻印象的头一次重要交往。无疑地，年仅二十六岁的地委书记赵紫阳的精明干练，给四十一岁的中央局书记邓小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经邓小平批准，刊载赵紫阳关于滑县运动的长文的《平原》二期增刊的铅印件，作为学习参考资料在大区的范围内发放。(18)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历时八载，使中华民族付出以两千万生命和无数资财为代价的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人民为之欢喜若狂，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兴奋不已。赵紫阳更有最大的理由为之欢呼。抗日战争爆发时，赵紫阳才是一个青年学生，赤手空拳，从武汉北上返乡；经过整整八年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他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年轻群众领袖和共产党内颇有名气的中层领导人了。

就在日本投降的当月，八路军展开大反攻，收复了不少地方。滑县城也被八路军攻占了。边区第四地委进驻县城，赵紫阳当然是进驻队伍中的一员。想当年，他不过是县立第一小学(即欧阳书院)的一名学生，此时却以主人和胜利者的身分堂堂正正地入城了。革命的确带来巨大的变动，它能够迅速地、极大地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抗战胜利后，边区的局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共两党的矛盾上

升到了主要矛盾，内战的阴云笼罩着中华大地。1945年9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由延安返回太行山区。邓小平就任新成立的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19)这个中央局面积很大，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区党委所辖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45年10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平原分局取消，仍划分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各区党委内部进行机构调整。赵紫阳担任了冀鲁豫第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党委机关设在滑县，下辖九个县委。(20)

至此，赵紫阳又担任了地委书记。从1942年10月到1945年10月，赵紫阳由原来的地委书记改任为地委副书记。这是他一生中的头一次"降职"。当然，这次"降职"完全是由于精兵减政、机构缩编造成的。这类"降职"，在赵紫阳的政治生涯中还会发生。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的指示，是谓"五.四指示"。中共中央认为，只有开展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土改，才能发动起广大农民群众支持即将全面爆发的国共大战。这么一来，已享有"土地问题专家"声誉、并在滑县农民运动中创造了成功经验的赵紫阳，又倍受上级重视了。

1946年6月底，以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军包围进攻、解放军突围为标志的全面内战爆发了。战争初期，国民党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攻占了许多地方。

9月，国民党正规军第四十一师和四十七师，攻占滑县、卫南等县，地主还乡团也跟着回来反攻倒算，共产党人和亲共的群众惨遭屠杀。(21)

11月初，地委书记赵紫阳在内黄县聂古乡召开区、连级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上，赵紫阳介绍了沦陷区人民的惨状，传达了上级党委的战略意图，分析了当前形势，指示各县、各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采取母鸡带小鸡的办法，坚持本县的干部不离本县，本区的干部不离本区，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会后，滑县、卫南两县的地

方干部，除少数老弱病残者外，全部返回本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主力战斗。(22)

11月19日至23日，刘伯承、邓小平亲率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用远距离奔袭的猛虎掏心战术，对滑县、卫南两县的国民党军队发起猛攻，历时四夜五昼，攻克国民党军在纵横八十多华里之内据守的据点一百余处，消灭国民党军一万二千多人，缴获甚丰，是为“滑县大捷”。这次战役，使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邯郸、打通平汉线的战略设想破产了。(23)

到11月底，国民党统帅部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从陇海线调动大军三十万，再次大举进攻，滑县、卫南和濮阳等十余县又一次被国民党军占领。赵紫阳等地方干部没有随主力撤退，而是在本地区打游击，度过了一个十分艰苦的冬天。农民原先的土改成果，大部分又被地主还乡团夺走。(24)

直到1947年3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率领解放军十万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战至4月下旬，先后歼敌三万七千余人，滑县及浚县、淇县等县重新被解放军收复。自此以后，滑县等地未再易手，一直是解放区。赵紫阳这个共产党的地委书记，也又一次从“地下”回到“地上”。(25)

由于战局趋于稳定，滑县、卫南等地成了解放军的后方。土地改革运动遂又一次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头一次土改，刚进行了两三个月，就被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打断。而这次土改，由于经历了国民党军队两次占领的反复，同时经历了地主还乡团血腥的反攻倒算，因而具有非常严酷的性质。不少地主在土改中被抄家，扫地出门，甚至被打死。阶级斗争是残酷的，尤其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时期，许多过火行为伴随而生。

1947年6月上旬，中共冀鲁豫边区四地委在濮阳县湾子村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本地区土改工作。赵紫阳作为地委书记出席会议讲话，并作了总结报告。

赵紫阳强调共产党应当在土改斗争中支持农民，站在农民一边。他讲道：

“坚决为农民撑腰搬石头。经过游击战争和敌人占领，农村阶级关系起了很大变化，农民被地主打落在地，农村阵地垮了。敌军直接支持地主，两个阶级对立更尖锐，农民抬不起头来。要发动农民对地主的斗争，就必须给地主这种气焰以打击与报复。……

“让农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政策和群众意见相矛盾时怎么办？政策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农民要求提高，政策应逐步修正。毛主席的思想方法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于中小地主、干属地主要让群众讨论。群众看问题多种多样性是科学的。农民要办就办。农民不要办就不要办。”

不过，即使在这种斗争高涨的时候，赵紫阳仍然十分重视保护中农的政策。他讲道：

“必须真正解除中农的顾忌，才能使中农和贫农站在一起。只有中农和贫农联合起来，百分之九十才能争取，才能更放手，更无顾忌，否则就会产生左。因此我们今天检查左就是检查中农问题。所以中央要我们时时刻刻注意中农的思想变化和情绪波动，看看中农是否怀疑、恐惧及犹豫，经常作解释，发动贫农和联合中农两件事一齐做（当然贫农是骨干）。仅仅对中农不斗是十分不够的，还必须联合，还必须取得中农同意。……中农和贫农的关系不能由领导上包办代替来解决，而应该让中农和贫农一齐互相检查、批评，面对面地解决，然后再联合起来挤封建势力。”(26)

赵紫阳还谈到在土改运动中发动妇女群众的问题。他说：

“妇女就是女农民。她们第一步就是向地主要解放，反封建，必须和男农民在一起向地主斗争。不解决这第一步，妇女解放是不可能的。另外，妇女还有其特殊要求，如婚姻自由、反虐待、经济独立、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等。对这方面有两种意见：一是在反地主斗争中不需要强调（妇女的特殊要求），否则会影响内部团结和斗争力

量，而是以后逐渐解决；二是必须提，而且现在就应该提，否则不能发挥妇女积极性，如婚姻自由等。因打倒地主后，阶级关系变化，已无很大的问题。农民虽不满意但可以说服。我们认为这种斗争不能用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斗内部，而是斗脑筋，思想斗争。"

在这个报告中，赵紫阳还专门讲到土改中如何对待属于抗日军政人员家属的地主的政策。他讲道：

"关于抗属地主，同样要消灭。抗战是光荣，抗属要照顾，但应由群众来决定。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在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联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27)

人们不禁要问，赵紫阳为什么对抗属地主及抗属地主出身的干部如此严厉呢？原来，他自己的父亲就属于抗属地主之列，而他本人，也属于地主出身的抗战干部之列。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即使为了"避嫌"，他也得这么讲。在这个斗争的"关键时刻"，任何犹豫、动摇、感情脆弱，都会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

阶级斗争是残酷无情的，尤其是赵紫阳在本乡本土担任地委书记，他就更有必要这么讲，这么做。在土改运动中，的确也有个别地主出身的干部不满于农民的过火行为，带枪、带兵回乡保护家属、对抗农民，甚至发生打死农民的事。自然，农民的行为也确有过火的地方，农民的许多举动，在今天看来更是不可容忍的。但是，这样一场改变千年秩序的大运动，又怎么能平平安安的度过呢？这一考验对赵紫阳说来是极其严酷的，但他以难以想像的毅力坚持下来了。尤为可叹的是，他的父亲赵廷宾，这位曾在困难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协助过共产党，并支援过抗日事业的老先生，竟在土改的

急风暴雨中丧生。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悲剧。它不仅是赵家的悲剧，也是时代悲剧的一个缩影。那个时代的许多共产党人，尤其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共产党人，正是背负着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走过那段漫长而艰险的路途的。对于赵紫阳来说，其悲剧色彩之所以更浓厚，还在于他本人身为家乡的地委书记，却未能阻止这一过火行为的发生。据说，在1947年年中左右，身为地委书记的赵紫阳本人也由于“出身不好”而受到当时在党内和根据地内一度盛行的“左”倾冲击，处于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在当时，党内不少“出身不好”的干部都有类似的经历。幸运的是，中共中央比较及时地纠正了这类倾向，赵紫阳才又开始正常工作。

然而，毕竟是土地改革给予共产党以获得国内战争胜利的最大动力。正是由于土地改革，使农民翻身得解放，使封建地主的剥削制度土崩瓦解。成十万、成百万、几千万的农民群众被发动起来，涌入解放军、涌向前线。由主要是农民组成的共产党军队，为了保卫自己的土改果实，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无数的农民，为了捍卫自己刚刚分得的那一块梦寐以求的土地，推着独轮小车，抬着担架，跟随着解放军打仗。多少穷苦出身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知道家乡的亲人分得土地的消息后倒戈起义了。土地改革对地主阶级说来是灾难，但对农民说来则是盛大的节日。当然，如果能采取“赎买”等比较和平的方法实行土改，可能会避免许多过火行为。但是，在两刃相割的国内战争时期，和平方式是行不通的。

据说，当蒋介石在屡战屡败之后对自己的一位高级参谋发问：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连续行军、连续作战，不用上级发饷，打到哪里就扎根在哪里。而他自己的军队进攻冲不上去，防守顶不住，还老是要给养、要军火？那位高级参谋答道：共产党靠的是土改，给农民分田地，才得到了农民死心塌地的拥护。蒋介石听后，深有触动。

本来，实现耕者有其田乃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重要内容

之一。但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二十多年里，却囿于形格势禁、内外交困，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结果，还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共产党也在国内战争中获得了胜利。陈毅元帅曾讲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很形象地道出了这个既深刻又简单的真理。蒋介石在从大陆失败退守台湾岛之后也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而于五十年代初匆匆忙忙地在台湾实行了方式缓和的土地改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自己在台湾的统治。

果然，国内战争的局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7 年 6 月 30 日，在毛泽东的命令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强渡黄河，揭开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展开战略进攻的序幕。7 月，刘邓大军按预定计划，千里跃进大别山。这座大别山，地处南京、武汉之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刘邓大军的前身红四方面军，就是诞生于大别山区的。

毛泽东曾经这么形容过这场战略进攻。他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有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28)

同年秋天，赵紫阳也奉命投入到这场大进军中。他卸去了地委书记的职务，作为工作团团长率领由冀鲁豫边区各地委集中起来的千余名地方工作干部，与作为刘邓大军后继部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一道，准备渡黄河南下。(29)

在赵紫阳的前面，仍有一场艰苦的武装斗争在等待着他和他的战友们。敌人仍是强大的。新区的人民还有待发动。同面临的伟大斗争相比，他个人家庭的不幸也显得淡漠了。赵紫阳所投身的，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内战。在内战的烈火中，一个新

的中国将在分娩的阵痛中诞生。二十八岁的赵紫阳，告别了留在后方的妻儿，随军南下了。

在故乡土地上的十年苦斗，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支前、筹粮、筹款、土改、发展生产、发动群众，到扩军、建地方党、建地方政权，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行家里手。新的根据地就缺乏这样的领导者。作为刘邓大军的一员，赵紫阳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滔滔黄河水，被他们跨过；巍巍大别山，映入他们的眼帘。也许，在南下的路途上，赵紫阳还不清楚，自己此行的最后目的地，并不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的主要基地大别山，而是刘邓大军在中原实行第二次战略展开的另一块重要阵地——桐柏山区。

(1)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第116页。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委会编。山东大学出版社济南1987年版。

(2) 《中共濮阳市组织史资料(1926—1986)》第26页。中共濮阳市委组织部、中共濮阳市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濮阳市档案局合编，1986年12月。

(3)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第8页，中共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 刘玉峰："豫北沙区革命斗争的一段回忆"，载《安阳地区革命回忆录选》第一集第78页。中共安阳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编，1982年10月。

(5) 同(2)第28页。

(6) 同(3)第10页。

(7) 同(2)第30—31页。

(8) 同(1)第171页。

(9) 同(2)第32—33页。

(10) 《中共滑县党史大事记》(上编)第43页。中共滑县党史办公室编印，1986年12月。

(11) 同(10)第44页。

(12) 姚兰："护送邓小平同志去延安"。载《安阳地区革命回忆录》第一辑第298——299页。

(13) 见《赵紫阳同志1945年春在滨河县新店会议上的报告》的按语。

(14)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491页。红旗出版社1982年北京版。

(15) 载中共平原分局机关刊物《平原》第二期增刊，1944年10月出版。

(16) 见《赵紫阳同志1945年春在滨河县新店会议上的报告》。

(17) 同上。

(18) 同(10)第55页，经中共滑县党史办公室最新考证，邓小平与赵紫阳的这次重要会见的时间为1945年春。

(19) 同(14)。

(20) 同(2)第61—62页，第64页。

(21) 同(10)第55页。

(22) 同(10)第58页。

(23) 同(10)第59页。

(24) 同(10)第60页。

(25) 同(10)第61页。

(26) 见《赵紫阳同志1947年6月在濮阳县湾子会议上的报告》。

(27) 同上。

(28)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0页。1968年北京版。

(29) 同(1)第284页。

第五章　在桐柏山上

1947 年秋，赵紫阳卸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的职务，赴区党委报到，待命南下。八月初，渡过黄河的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的率领下，在结束鲁西南地区的战役之后，分兵三路大举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次月，赵紫阳被委任为地方工作团团长，率领从边区集中的一千余名干部，汇合刚刚组建的野战军第十纵队（相当于军），进一步整训学习。这支纵队，是 9 月初于安阳地区成立的，其基础是原冀南地区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下辖二十八旅、二十九旅和三十旅，近两万人，纵队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1)这两位纵队的主要军政首长，都是资深的老红军干部。王宏坤是湖北麻城人，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斗争，长征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旅长，后因身体不好，可能也受到张国焘问题的牵连，才屈就纵队司令的。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长征中由红一方面军转入红四方面军，抗战开始后任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和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2)赵紫阳同他们一道南下。这支部队同新组建的第十二纵队一道，作为刘邓大军的第二梯队。

10 月 14 日，第十纵队与地方工作团一同南下，10 月 29 日渡过涛涛黄河，接着跋涉黄泛区、颍河，汝河和淮河，沿途不时与敌接战，于 11 月 29 日在河南光山县境内的大别山区与主力会师。(3)

这时的刘邓大军，在进入大别山区之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划分为豫东南、鄂东、鄂皖和皖西四个地区开展工作，到 9 月底攻占县城二十三座，歼灭国民党军六千余人，建立了十七个县的政权，

大体上完成了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北瞰中原的战略任务。(4)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统帅部由于心腹受到严重威胁,急忙从陇海铁路线和胶东地区调遣五个整编师(相当于军),加上原有的九个整编师,共三十三个旅的兵力,由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亲自率领,围攻大别山区的刘邓部队。为了对付国民党军的围攻,摆脱不利局面,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实行第二次战略展开,以后继部队十纵队、十二纵队和第一批南下的一纵队分别向桐柏地区、江汉地区和淮西地区挺进。刘邓亲率三个纵队在大别山坚持斗争。(5)

十二月三日,即第十纵队与主力会师后的第四天,刘伯承和邓小平出席了十纵队和地方工作团连以上干部西进动员大会。在这次会上,刘伯承和邓小平号召部队以及开辟新区的地方干部要不惜牺牲,以义无反顾的决心,在桐柏山上扎下根,无论如何不能让国民党再把共产党赶过黄河以北。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的邓小平再一次见到了将作为地方工作团团长随军西进的赵紫阳。在这次会议上,刘邓首长还安排了即将成立的中共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的主要领导干部。会议尚未结束,又有紧急的军情送达,同时枪炮大作。刘邓首长当即决定,十纵队立即连夜西进。由于紧张匆忙,连十纵队从老区带来准备交给主力的新兵、弹药、服装、经费等都来不及移交了。(6)

从12月4日开始,第十纵队一万九千人,加上随军的地方工作干部一千六百多人,分两路西进。国民党军以四个整编师的兵力对他们实行追击和堵截。12月5日那天,战况激烈,十纵队通过九里关时,刘邓首长电示:"你们今夜立即通过平汉路,否则有被歼灭的危险。"来自平原地区的部队走不惯山路,又时逢大雨,一夜才行进十几华里,北路各部队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大部分冲出,但损失相当严重。在最危险的时刻,纵队和工作团首长下令所属人员:"打散了也只能朝西边突。"(7)至6日,十纵队主力及地方工作团

大部分由信阳至柳林车站之间闯过平汉铁路，然后又在西双河等地与国民党张轸所部激战三昼夜，9日突破敌人阻击西进，11日进抵湖北应山县浆溪店才算进入桐柏山区，摆脱了追兵。12月1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正式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和桐柏军区。区党委代理书记刘志坚，副书记赵紫阳。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副政委赵紫阳，下辖三个地委和三个军分区。第十纵队及地方干部团的大部分散到各地委，各县开展工作，建立政权，留一部分主力集中对敌。(8)这个桐柏解放区东与鄂豫区接壤，南与江汉区呼应，西北与豫陕区毗连，面积最大时达到五万七千余平方公里，人口约四百万。(9)

这样，赵紫阳就成为中共的一个分局和一个军区(相当于省)的副书记和副政委了。他的同事，都是资深的老红军干部。看来，在十分重视干部参加革命年限的中共组织中，他于1932年加入共青团这一事实，使他被视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了。在当时，“三八式”的干部(即1938年参加革命干部)是鲜少担任地委级以上的领导职务的。

12月19日，第十纵队主力的一部攻占了河南唐河县城。1948年1月5日，桐柏区党委和军区在唐河城关召开“解放桐柏庆功大会”。刘志坚，王宏坤和赵紫阳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号召全军指战员和全体地方干部扎下去建设根据地，誓死打开新区局面。1月9日，桐柏区的解放军发起邓县战役，16日攻克邓县，消灭国民党军队近一万人，初步打开了建立新区的局面。(10)

在1948年这一年中，赵紫阳和他的战友注定还得在桐柏山上经受一番严峻的战争考验。1947年12月下旬，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针对共产党部队进入桐柏山的情况，采取对策，决定分别于信阳、襄阳和南阳成立三个绥靖区(相当于军分区)，分别由张轸，康泽和王凌云率部统领。此时，共产党的陈赓兵团打到了豫西，也在创建新区。而国民党新建的这三个绥靖

区，就是针对桐柏解放区和陈赓兵团的。

1948年5月上旬，桐柏军区的部队配合中原、华东部队一部，在内乡、镇平、邓县一带进行了宛西（宛为南阳的古称）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两万多人，还争取了国民党地方武装五千人起义。5月底，6月初，中共部队又发起宛东战役，消灭国民党军一万多人。这样，桐柏解放区进入了巩固和发展的阶段。(11)

同年5月9日，中共中央扩大了华北局，加强了中原局和中原大军区。除邓小平仍任中原局第一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外，又调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同时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刘伯承仍任中原军区司令员。这样，整个南线的中共政治、军事领导中心就在中原局形成了。中原局和中原大军区下属鄂豫，豫皖苏，豫西，桐柏，皖西，江汉和陕南等七个区党委和军区。(12)每一个区党委等于是一个省委，而赵紫阳就是其中一个区党委和军区的副书记和副政委。

7月19日，随着战局的发展，中共力量的强大，桐柏区又新建了一个地委和军分区，即汉南地区，其位置在湖北省汉水以南地区，故名汉南区。这样，桐柏区党委和军区就下辖四个地委和军分区了。(13)至于区党委所辖的县委，则多达二十余个。

由于桐柏区党委书记刘志坚是军事干部，又兼军区政委，所以唯一的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赵紫阳承担起区党委的许多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土改工作和组织人事工作。当时，除了打仗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土改和减租减息工作。而开展这类工作，正是赵紫阳所擅长的。可惜，由于中共在这项工作中曾一度出现"左"倾，因而各地的土改工作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大都走了一段弯路。

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4)随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工作便全面铺开，一时搞得热火朝天。但由于政策上出现"左倾"，如对新区地主、富农的力量估计

过低，对国民党军事力量估计过低，把大军进驻后群众的一时热情当做永久性的觉悟，急于建成后方根据地等，所以在土改中普遍越过了减租减息阶段，宣扬贫雇农领导一切，党、政、军中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受到冲击，结果，各地的土改普遍深入不下去。在各地的中等城市多数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情况下，许多农民不敢要地，怕国民党打回来。有的被迫要了地，又暗中送还给地主。此外，土改中出现了一些过火行动。凡此种种，使生产和支前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这些现象的产生，被毛泽东归咎于"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在1948年2月下旬写道："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15)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陕北的中共中央以及设在河北平山县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都有一定的责任。

针对土改中出现的问题，开辟新区较多的中原局书记邓小平于3月8日向毛泽东写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总结了进入大别山后工作中的"左"倾教训，并向毛泽东汇报了鄂豫区党委作出的四项规定：第一，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或可以暂时中立的人；第二，在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策略步骤；第三，禁止乱杀人；第四，注意掌握工商政策，保护工商业。邓小平的报告说，这四项规定在实行后，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局面趋于稳定。毛泽东阅后批示："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16)看来，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是善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并勇于采纳部

下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建议的。很显然，不如此，毛泽东就不可能领导中共夺取到全国政权。

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发出“关于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指示要求各地坚决克服土改中“左”倾急性病，要求在巩固区和新区划分不同的政策界线，新老区土改均划分两个以上的策略阶段，有步骤地实行减租减息或土改。(17)

3月底，桐柏区党委在湖阳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贯彻中原局的指示。赵紫阳参加会议并讲了话。(18)

7月，桐柏区党委在赵紫阳主持下于平氏又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湖阳会议之后的地方工作。鉴于急性病仍未得到有力的制止，会议明确规定：“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财产，停止乱没收”，“有步骤、有分别、有准备、有计划地在已分田地的控制区进行复查调查工作；在未分田地的控制区进行反蒋清算，双减运动；在游击区进行对敌斗争。”这样，以平氏会议为标志，桐柏区全面停止了“左”倾的急性土改，使地方工作走上了正轨。(19)

当时的桐柏区党委办公室主任杨立三曾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我是1948年8月到区党委的，那时党委和军区在一起，人很少，书记刘志坚，副书记赵紫阳，军区司令王宏坤，后来是孔庆德，行署主任许子威。……那时我们的工作任务，一是征粮、支前；二是搞群众运动。在急性土改中，村村点火，搞得地富武装也拉起来了，对贫下中农拉一部分，打一部分。泌阳，唐南等县搞得厉害。紫阳同志曾对我们讲，急性土改是个教训……，我去时正在转弯子，纠正这个问题，方针是反霸，反对地主当权派和掌握武装的敌人。这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了群众。”(20)

从1948年9月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大决战的战局，开始发生决定性的剧变。

9月12日，辽沈战役在锦州城郊打响。9月16日，解放军华

东野战军进攻山东省会济南，经八昼夜激战，于 24 日攻克济南，消灭国民党十万守军。10 月 15 日，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歼敌十万。10 月 18 日和 19 日，国民党长春守军在绝望中一部起义，一部投降。十月二十日，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河南省会开封。10 月 22 日，陇海和平汉两铁路的枢纽郑州被解放军攻占。11 月 2 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被攻克，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丧失了四十七万军队，整个东北被解放军占领。这一惨败震动了南京政府。英国路透社记者在当时就写道："国民党在满洲的军事挫折，现在已使蒋介石政府比过去二十年存在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崩溃的边缘。"

正是在全国形势的作用下，桐柏解放区的局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1 月 4 日，即沈阳易手的两天之后，驻守南阳的国民党军队南逃襄阳，南阳随即被共产党部队占领。南阳城的占领，就标志着桐柏区的战事基本结束。

解放军占领南阳，毛泽东非常高兴。虽然南阳只是一个中等偏小的城市，又是国民党军放弃的，但由于战略地位重要又在历史上出过诸葛亮，汉光武帝的"二十八宿"等文武名人，毛泽东亲笔为此撰写了新闻稿《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文中，毛泽东自豪地写道："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21)

紧接着，从 11 月 6 日开始，规模更加宏大的、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战役又展开了。以邓小平为书记，陈毅，刘伯承，谭震林，粟裕

为成员的中共总前方委员会成立，统一指挥解放军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到 1949 年 1 月 10 日，经六十五天血战，全歼国民党部队五十五万余人，共产党军队获得大胜。南京已完全暴露在强大的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兵锋面前。

在淮海战役中，驻扎在信阳一带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东调被消灭，使桐柏解放区的地位更加巩固。近一年来国共双方在桐柏地区的拉锯战终于结束了。

1949 年 2 月 18 日至 24 日，桐柏区党委在唐河县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赵紫阳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月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所作的结论。王宏坤在会上作了武装斗争和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了贯彻党中央指示，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支援前方战争，扩大地方武装和剿匪等问题。最后，赵紫阳作总结报告。1949 年春，桐柏区地方武装升级，扩大新兵十七万人。为支援大军南下，筹粮七千余万斤，铁道枕木一百多万根。3 月 10 日，桐柏区党委由唐河县迁入南阳城，这标志着桐柏区党委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入城市。(22)

与此同时，为适应渡江作战，桐柏军区撤销，军区所辖主力部队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旅合编为第五十八军，隶属第四野战军。桐柏军区在自己存在的一年又三个月时间里，共作战一千二百余次，歼敌四万余，占领县城十一座，建立县级政权二十五个，实现了刘邓首长提出的："变汉水为我之内河，开辟前进基地"的任务。(23)

3 月 1 日，中共河南省委在开封成立，书记李雪峰，副书记张玺。于是，统一按省区划分地区，原有的各个区党委一律取消，河南省委下辖十个地委和开封、郑州两个市委。(24)3 月 7 日，河南省军区成立，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雪峰，下辖十个军分区。赵紫阳任南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25)因此他的职务相对来说又下降了。

与此同时，河南被划归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中南军政委员会主要由林彪，罗荣桓率领的第四野战军领导成员组成。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各部队，在结束平津战役之后，陆续南下，指挥部设于郑州。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则集中于淮海前线，准备与第三野战军一起合兵渡河突击南京。

这样，赵紫阳又当起了地委书记。当然，现在的这个地委书记不同于战争年代，它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地区的领导者。当时南阳地区人口五百万，辖十二个县。南阳城坐落在桐柏山下，当时人口两万余，是一个偏远、闭塞、落后的地区，距省会较远，离平汉线铁路也有几百华里。

1949 年 4 月 20 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相继被解放军占领。第四野战军于五月渡长江，占领武汉、长沙。第一野战军占领西安，进军兰州。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全国胜利。同月，广州解放。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设在武汉。这个时期，赵紫阳的主要精力用于支前和土改。这时，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远赴大西南，河南的事也就不能顾及了。

在 1950 年一整年中，赵紫阳在南阳任地委书记。就在这一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志愿军入朝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作战。赵紫阳密切注视着全国局势的变化。前此，赵紫阳曾于 1949 年在南阳地委领导过一场“反骄傲，反蜕化”的小运动，教育干部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闹待遇等等。(26)不过，南阳地区的干部恐怕不大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因为这儿地处偏远，条件不好，难得有几个“资产阶级”出来捧场，“糖衣炮弹”也为数不多。可以设想，如果赵紫阳贪恋乡土，长期在南阳地委书记的位置上呆下去，他个历史恐怕又将是另一个样子了。

然而，赵紫阳毕竟是幸运的。1950 年秋，与河南同属中南军政

委员会管辖下的广东，广西两省，由于缺乏各级干部，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补充干部的要求。1950年9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辖两广）提出，他们需要县级以上干部一千余人，一般干部六千余人。（27）

为此，中共中央通知各地，选派以下类别的干部到两广工作：

	主要干部	一般干部
华中局	五百名	七千名
东北局	一百五十名	一百名
华北局	一百名	二百名(28)

这样，赵紫阳就成了中南局派遣到广东的主要干部之一，并准备携妻儿南下了。这时，他的妻子梁伯琪，已在南阳工作，任中共南阳地委妇女委员会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第一书记是叶剑英，第二书记张云逸常驻南宁，主持广西工作；第三书记方方，曾是粤赣边游击纵队的领导人。这个华南分局，又受设在武汉的、以林彪为主席的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

1951年4月，赵紫阳卸去南阳地委书记的职务，与妻子梁伯琪一道，踏上南下的旅途。在富饶美丽的南海之滨，一片崭新的天地正等待着他去开拓。

（1） 中共桐柏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桐柏解放区大事记——战斗的十六个月》第2页，1982年8月。

（2） 王宏坤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任海军副司令等职。刘志坚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等职。

（3） 同（1）。

（4） 《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第158页，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征编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 同（4）第162页。

(6) "刘志坚谈桐柏区的几件大事"载《中共党史资料》第24集，第95页。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

(7) 胡代耕(当时任中共桐柏县委书记)："挺进桐柏闯三关"，第1页。

(8) 同(4)第162－163页。

(9) 《中共河南省组织史资料》第四章："桐柏解放区"。中共河南省组织史资料编辑组编，1987年7月。

(10) 同(4)第163页。

(11) "陈赓部队在南阳地区活动片断"。载《南阳党史通讯》1985年2期，第29页，中共南阳地委党史征编委办公室编。

(12) 同(4)第167页。

(13) 同(1)第12页。

(14) 同(4)第160页。

(15)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75—1176页，1968年北京版。

(16) 同(4)第165页。

(17) 同上。

(18) 《中共桐柏县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时期》第69页。中共桐柏县委党史办编，1984年5月。

(19) 同上、第59—60页。

(20) 南阳地委党史办公室曹一凡、汪涛1983年4月8日访杨立三记录(杨立三当时为核工业部部长)。

(21) 新华社郑州1948年11月5日电。

(22) 同(1)第21－22页。

(23) 《八支部队战桐柏》第3－4页，中共桐柏县党史办公室编，1983年4月。

(24) 同(4)第177页。

(25) 同(4)第178页。

(26) 赵紫阳于1952年7月16日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信。

(27)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东、广西干部需要情况及县、市人口情况"，1950年9月。

(28) "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准备的赴广东、广西干部数字"1950年9月。

第六章　南下五羊城

广州，华南的第一大都会，别名穗城，又名五羊城。相传，在远古年代，有五位鹤发童颜的神仙，骑着五只洁白的羊儿，从波涛汹涌的南海来到广州这块地方，给当地的人们带来了稻穗的种子，所以广州又名穗城，羊城或五羊城。

当属羊的赵紫阳启程南下之时，主管广东、广西两省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已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其成员如下：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第二书记张云逸（常驻南宁，主管广西省的工作），第三书记方方。华南分局常委先后有陈赓、邓华、赖传珠等人，分局委员先后有郭天民、刘志坚、洪学智、肖向荣、古大存、曾生、雷经天、冯白驹、林平、陈漫远、莫文骅、林锵云、区梦觉和梁广等人(1)

赵紫阳到达广州后，马上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俱乐部秘书长。这个分局的俱乐部设有正副主席，由分局书记叶剑英和方方兼任。其后不久，分局俱乐部改为分局办公厅，叶、方二人不再兼职，由赵紫阳任办公厅秘书长。赵的妻子梁伯琪也在华南分局俱乐部和办公厅任科级干部，后任广东省农林厅畜产处副处长，分党委副书记等职。

在1951年5月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十三次常务会议上，赵紫阳被增选为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土改委员会原有十八人，这次会议又增加二十七人，共四十五人，方方为主任，李坚真、赵紫阳和陈冷为副主任。(2)

当时，朝鲜战争正在进行，虽然双方大规模的进攻已大体结束，但三八线上的阵地战仍十分残酷，停战谈判亦无实质性进展，战争的胜负仍决定于战场。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

下，很可能在华南开辟一个"第二战场"。而广东，又是国民党军队可能登陆的一个区域。所以，广东当时也可算是前线。在广东，驻扎有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三十万大军。海南岛和万山群岛刚刚于1950年4月和7月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从南粤大地上消散。

广东所处的这种严重的战略地位，可以从叶剑英的讲话中看出来。叶剑英讲道："华南处在国防前线。我们的祖国，正受到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美帝国主义占据了我们的台湾，又积极地侵略朝鲜，妄想经过朝鲜来侵略我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人民必须动员一切力量，积极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支持人民志愿军，打败美国侵略军。"(3)

叶剑英进而号召："祖国的卫士们！要注视我们南面的海洋！这里有我们的三千七百公里长的海岸，海上有七百二十九个岛屿，和七十万的渔工渔民和盐工盐民，时常受到帝国主义走狗、台湾海盗侵袭的威胁。(4)

在1951年春至1952年春的这一年里，赵紫阳先后任华南分局俱乐部主任和分局办公厅秘书长。由于当时在华南分局掌握实权的一些当地打游击出身的地方干部对南下干部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赵紫阳未受到应有的重用。

在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于1951年7月，即他到达广州的三个月之后，带领几名干部前往乐昌县检查农民运动的情况。赵紫阳这次赴乐昌县，历时八天，亦是他到达中共华南分局之后的头一次外出进行较重要的调查研究。从赵紫阳调查归来之后写给华南分局的报告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赵紫阳对农村工作的许多看法和政策思想。

赵紫阳认为，广东的农民运动解放一年多之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总的方面看起来，运动还很不充分和很不平衡。

赵紫阳在报告中写道："发动不充分的另一表现是发动和团结面不广。土改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依靠和发动贫雇农，过分地忽略了

发动和组织大多数，群众中仅发动和组织了百分之六十。应当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很多尚未发动和组织起来。特别是由于在执行政策上对某些中农和乡村贫民采取打击和歧视态度，未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对某些有污点或落后农民采取了错误的乱管制、乱扣帽子的打击态度，以及因错划阶级等原因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把许多应当保护的人错误的伤害了，增加了不满情绪，有些地区已因此显出贫雇农孤立的征象。此问题如不加以解决，要肃清残余敌人的活动，巩固土改胜利是不可能的。”(5)

赵紫阳接着写道：“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一般是比较彻底的，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对敌斗争不策略，对中小地主打得彻底。有的打得过重，对大地主和当权派打得却不够彻底。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打击不彻底的百分之二十的户当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大地主当权派。地主阶级中百分之七的被处死、判刑、自杀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当中，百分之六十属于中小地主。占地主人口百分之五的因逃亡未受打击的人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大地主当权派。”(6)

赵紫阳分析道：“由于运动时间的短促，大多是前细后粗，前宽后紧，加以执行政策的偏差，因此运动的另一特点是遗留问题特多。组织建设做得不好。遗留问题一是错划阶级的现象比较严重，把一些富农及小土地出租者错划为地主，把不少的贫雇农错划为中农和贫农。一是积压果实，分配粗糙。机动田留得尚多，不少山林、鱼塘、房屋、农具未分或未分配完毕，分配不公的现象仍较普遍，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贫雇农土地未满足，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贫雇农在生产资料上未满足，部分地区对回乡工人、佃中农、及乡村贫民分得太少，照顾不够。有些地主没有分配土地或分得太少太坏，增加劳动改造的困难。”(7)

看来，赵紫阳1951年7月写这个报告，是需要有很大勇气的。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到华南分局工作三个月的地委级干部。对于土改问题，他的确是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内行，深知这类运动可能

产生的种种问题。本来，一旦一个大运动涌来，难免会有种种弊病产生。喊几句“好得很”自然容易，而要指出不足，指出问题，是要冒被视为“右倾”或“机会主义”危险的。很幸运，赵紫阳并没有由于这个报告而在华南分局受到非议。叶剑英对他是爱护的。本来，华南分局的领导对于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也是心存顾虑的。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对赵紫阳的前途关系重大。

1952 年春，陶铸由广西调至中共华南分局工作，任分局第四书记。陶铸 1926 年参加革命，是个文化素养高的老党员。1949 年陶铸任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副政治委员。陶铸非常欣赏赵紫阳的作风和才干，赵紫阳亦对陶铸印象颇佳。与陶铸的结识，对赵紫阳的前途至关重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

这一年，赵紫阳埋头于实际工作，努力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努力处理好与各类干部的关系，从而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先打下基础，准备好下一步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样，当机会来临时，才不致于措手不及，才能抓住机会，才能得到命运女神的惠顾，才能获得大发展。果然，机会在 1952 年春天出现在赵紫阳面前了。

事情是这样的。1949 年夏季，当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大举南下、广东尚未解放之时，在江西赣州成立了中共华南分局，叶剑英和方方是领导人。叶剑英本人是中共元老，又是广东人。方方虽然是红军干部，但他从抗日战争时起就一直在南方从事打游击等活动，并形成了一个以广东地方干部为主的游击队系统，即形成了以广东地方干部为主的华南分局的干部结构。在成立华南分局的赣州会议上，方方对南下干部讲道：“华南游击队已有八万人左右，解放了一千三百五十万人口的地区，有组织的群众有一百五十万人，党员发展了三万多，全省已有三分之一的县份建立了民主政权，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有一千五百人，地委级以上的干部有六七十人；……若没有今天大军南下，我们自己在不犯大错误

的情况下，也还得要三年时间才能解放广东，而像广州那样的大城市能否解放还成问题。"(8)这样，华南分局就在叶、方的领导下，以广东地方干部为主组成。方方在赣州只要南下的县级干部，不欢迎地级干部，各地委的名单都以原班子为基础，加进一些外来骨干。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甚至将会议上决定的一批当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县级(9)但是，一些南下干部却认为，天下主要是南下大军打下来的。因而对地方干部的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全国解放后马上开展的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由于本身与农村有着密切联系，大多主张和缓，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10)南下干部大都经历过北方农村的土改，有一套经验，正打算到广东新区来实行，却受到限制，不能放手干。

从高层次看，中共中央中南局对华南分局的工作似乎也不甚满意，只是由于叶剑英德高望重而无可奈何。当时中南局书记林彪，地位在叶之上，资历却比叶浅。这本身就构成了矛盾。

中南局与华南分局之间的矛盾，终于在1952年春天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加以裁决了。毛泽东召叶剑英到北京，批评华南分局工作左倾，土地改革不彻底，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在干部路线上有错误，等等。毛泽东明确指出，华南今后的工作主要依靠南下干部和大军干部(11)

从今天的眼光看，当年广东地方干部不愿意把家乡搞乱，担心土改影响生产，主张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事情还有另一面。应当承认，广东的解放，主要是由于解放大军歼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华南的小游击队只起了较小的作用。"打天下者坐天下"，此乃中国的历史传统，任何违背这一传统的做法，在当时肯定是行不通的。另外，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广东作为前线，只有发动农民，斗地主，分田地，才能使农民真正与共产党心连心，才能在国民党军队登陆时支持共产党。这种很现实的政治考虑，压

倒了其他考虑。

结果，当然是毛泽东和中南局的主张占了上风，叶剑英作了检查。叶剑英由于功劳大而被留任，方方则被撤去分局书记职务，陶铸升为分局第二书记，并主持全面工作。赵紫阳作为南下干部，既受到陶铸的器重，叶剑英、方方对他的印象也不错，因而成为双方都乐于接受的人选。这样，赵紫阳于 1953 年中晋升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主持土改工作。

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

"究竟华南存在什么问题呢？……在这个问题上，分局领导是不明确的，主要方向迷失了。没有抓紧大量问题，没有依靠主要的力量；因之，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但主要问题没有抓住，全局就输了。所谓大量的的问题，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和中南局一再指出的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问题。广东人口有三千一百万，而农民就占了二千八百万，其他人口仅三百万，如果不紧紧的依靠农民，当然不能胜利完成各种任务。"(12)

叶剑英接着讲道："三十年来的经验证明，前方作战，出兵出粮是依靠广大农民，巩固后方，发展生产，也是依靠广大农民。而要依靠广大农民，不提高觉悟，不发动斗争，不解决他们的切身问题是不可能的。可是，分局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了，把最主要的东西冲淡了，没有动员全党的力量，把农村的社会改革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来完成，这是对农民问题不正确的认识，也是使广东工作落后于其他地区的基本原因。"(13)

叶剑英着重讲了分局在干部问题和"地方主义"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在干部的使用上，两年多来，分局也是犯了错误的。老区干部经过了土地改革、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经过无数次的考验和锻炼，是可以依靠和必须依靠的。而地方干部，大部分缺乏长期锻炼，又无建设解放区的经验，……特别严重的是出现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尽管分局提出了向大军学习，依靠大军，都遭受到顽强

抵抗。而分局领导上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击破地方主义，反而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纵容了地方主义的发展。"(14)

叶剑英在讲到农民问题时，还专门指名表扬了赵紫阳。他说："应该指出，分局两年多来在农民问题上犯了错误，迷失了方向。但今天，特别在今年四月会议以后，从春耕到夏收的两个月来，分局有陶铸、赵紫阳同志正确领导起了作用，以及区党委、地委和南下干部大军干部的实地指挥，方针对头，思想统一，干部信心提高，业已收到很大成绩和创造了很好经验，完成了五百万人口地区的土地改革。因此，这种偏向已从基本上获得了纠正。"(15)

在这里，叶剑英已经将赵紫阳与陶铸并列为分局的正确领导者了。

方方也在 1952 年 7 月召开的华南分局的这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我的错误的初步检讨"的发言。

方方在"检讨"中说："我的错误表现在我所参加的各种工作中，而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农民运动和干部政策这两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上。因此，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而是原则性的，……我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统的、一贯性的。这个错误以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为根源，以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南敌后独立活动的环境为基础，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夸大地方成绩，骄傲自大，在个别问题的措施上，还严重丧失立场；在组织原则上由于不尊重上级，抵抗中南局对广东农民运动的正确批评和指示，因而发生了无组织闹独立性的错误。"(16)

看来，方方在自己的"检讨"中，充满了那个年代一些共产党人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教条主义式的自责。

在"检讨"中，方方也专门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他说："五〇年冬十三县土改进一步暴露了队伍的严重不纯。十三县土改的严重缺点，说明我是不能胜任广东全省土改指导责任的。因此，五一年春以后中南局为了加强广东工作，陆续派了赵紫阳等同志前来。假

如我是真正以党的利益为重的，自然会热烈欢迎，虚心向他们学习，并即以他们为依靠，重组土改班子，坚决开展农民运动。但是我却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感到中南不信任自己，又怕他们找到岔子，自已丢脸，因而苦闷消极、自暴自弃，对他们没有积极表示欢迎，对成立区党委和行署袖手旁观。甚至对赵紫阳同志也没有积极依靠他，发挥他应有的作用。”(17)

从方方的上述“检讨”中可以看出，赵紫阳当时在华南分局的地位已显著上升，并注定要取方方而代之了。

华南分局的这次会议，在叶剑英作了报告、方方作了“检讨”之后，一些与会干部也作了发言。在与会干部的发言中，叶、方二人实际上成了多数与会者抨击的目标。叶剑英由于在历史上与毛泽东有密切关系、又是元老，因而人们的批评显得含蓄，而方方则成了众矢之的。赵紫阳也发了言，但他对方方的批评，调子较低，对叶剑英在言词中仍充满尊敬。这里，显示出赵紫阳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克制态度以及富于远见的做法。

当时有一位干部在发言中这样批评叶剑英：“叶主席对下面真实的情况了解不够。今后我们希望叶主席能有计划有重点的了解下情；必要时可给我们出题目，我们必定会依题认真报告。叶主席对一些重大问题，如在农民运动问题上，干部政策上，统一战线政策上，以及方方同志的地方主义对抗领导上等若干原则性的问题上，阶级嗅觉不够灵敏，不够深刻，以致有关全区性的中心关键的问题抓得不够紧，使广东的工作未能依照正常规律发展前进。”(18)

另一位干部对叶剑英和方方批评道：“我认为解放两年多来，叶、方两同志的领导思想和采取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方同志则加上一条，犯了极其恶劣的地方主义的错误。”(19)

与这类声色俱厉的贴政治标签式的批评不同，赵紫阳在题为“对分局过去领导上所犯错误的认识”的发言的开头是这么讲的：

"同志们，中央对广东问题的批评的指示，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参座"(指叶剑英)的报告和方方同志的检讨对我都有很大的教育。"参座"的报告态度比较深刻诚恳。方方同志的报告虽不够深刻，但态度亦是诚恳的。"(20)

在这里，赵紫阳尊敬地称叶剑英为"参座"。这是因为，叶剑英在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担任过多年的总参谋长。他避免使用简单化的刺激性的字眼，而说叶剑英的报告和方方的检讨对自己有很大的教育。这种委婉而谦虚的提法，在当时党内"无情斗争"的风气下，真是难能可贵。此外，这也表现了他的宽容性格。发言一开头赵紫阳表示拥护中央对广东的批评，这既是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当然不能与党中央有任何异议)，同时也是让处于挨批地位的叶、方二人谅解。赵紫阳不仅认为叶剑英的态度诚恳，也认为方方的态度诚恳，而没有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当然，他也不能不讲方方的报告不够深刻。熟悉那个年代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干部在公开场合评论另一个挨批者的头一轮检查时就认为"检查深刻"，这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会给自己招来"同情"挨批者之嫌。对于这一点，赵紫阳不会不清楚。

赵紫阳在发言中不是一开始就作"正面"阐述，而是先讲这次会议对自己的"教育"，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讲道："这次会议对我最大的一个教育，是使我深深地认识了党内斗争的重要，有问题要摆到桌子上来，这样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点我过去是有错误的。对于广东所犯错误虽然没有现在认识这样系统深刻，但在许多方面是有感觉有意见的，但提得不明确不强调，有的就没有提。我过分的考虑了所谓'时机是否成熟'，'效果如何'，怕提出来亦不能解决，因而就索性不提，以此掩盖与发展了我的自由主义情绪。从这次大家的发言中，证明了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在党内是有着不同的意见和存在着争论的。由于党内民主不够，这些意见和争论没有表面化。假如当时注意了这一点的话，不同的见解都能摆到桌子上

来，则错误是可以早些被发现和减少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21)

由于赵紫阳本人系南下干部，又是公认的被方方不重用的出类拔萃之才，所以他的这个"自我批评"显得高超，既不违背会议的宗旨，又不致增加挨批者的不满情绪。

当然，对方方奉行"地方主义"、排斥南下干部的问题，赵紫阳还是有意见的。他讲道："排斥外来的干部这个问题，方方同志直到这次报告尚未解决。但事实是这样：第一批东北来的干部不重用；第二批中南来的干部受到排斥；……我到分局来亦有些感觉，虽表面欢迎，但实际不让插手。方方同志说，当时不依靠我搞土改，是要看看是否大轰大落，这是不能解释的。要看一个干部为什么不用着看呢？在工作中边用边看不行吗？不用是看不清楚的。"(22)

赵紫阳还讲道："地方主义影响外来干部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本地干部的提高。要不是地方主义的存在，在这次整队中地方干部就不会垮这样多。"(23)

赵紫阳的这种提法，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广东的地方干部"实力"比南下干部弱，一旦走上与南下干部对抗的路子，势必要吃亏。在这点上，方方的认识是不明确的。

赵紫阳在发言的结尾讲道："经过这次会议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更认识到党的伟大。今后我有充分信心，在以'参座'为首的分局领导下做好广东工作，并决心肃清自己的自由主义。同时，我作为一个外来干部，就更感到责任重大，今后当积极提高自己，切实做好对地方干部的帮助和团结工作。"(24)

赵紫阳注意方法，讲究分寸。作为在这次党内斗争中占上风的人，他还强调自己要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要肃清自己的自由主义"错误"，同时还表示要切实团结好地方干部。这表明赵紫阳是从工作出发、面向未来的。

在这次中共华南分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分局进行了改组。叶

剑英仍任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政府主席，陶铸代替方方成为分局的第二把手。方方被解除了分局书记的职务，仍担任分局委员。赵紫阳仍兼任分局办公厅秘书长。

随后，在中共华南分局内部又进行了“三反”运动。所谓“三反”，就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场运动，是从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开始的。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的祝词中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25)随后，“三反”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场运动，在中共各级党政机关内部几乎变成一场人人过关的运动，但并没有引起类似“肃反”、“抢救”运动那样的恐慌。各级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都得写出书面的自我总结鉴定，总结自己在工作、生活中有多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东西。谁也不能讲自己干干净净，一点这类东西都没有。谁如果这样说，别人就会质问他：“难道中央无的放矢？”自己检查之后，还得由基层党支部作出鉴定。

1952年7月18日，赵紫阳也同别的领导干部一样，向叶剑英上交了自己的总结鉴定。赵紫阳写道：“在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上，表现了我的警惕性不高，在生活方式上还不能和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线。在二中全会传达之后，在全国解放不久，在自己还在农村或小城市的时候，警惕还是比较高，嗅觉也较敏感，自己的生活也一般还保持着朴素。还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因看到干部中有些闹待遇，闹地位的问题，我即认为这是全国胜利和平环境下滋长着的一种蜕化倾向，就提出与开展过一次反蜕化斗争。当时对于城市的一些铺张浪费也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当周围的铺张浪费之风发展

更严重的时候，当自己由农村小城市走到大城市的时候，自己的警惕性反而减少了，嗅觉迟钝了，随着整个风气，自己也在变化着。我是去年四月从河南调来广州的。初来时对广东的铺张浪费是很看不惯的，觉得太过分了。但久而久之，有一些就习以为常，比较地看惯了，嗅觉也逐步迟钝下来，原以为是错误的、不应该的事情，也觉得无什么了(当然还有许多仍看不惯仍认为太过分)。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觉悟还不高，界线划不清。在这样一个风气下面，自己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对于那些所谓'国家规模'、'主人翁气魄'、'大城市生活环境'、要'大方'、要'排场'等一些铺张浪费进行维护的论调，虽不全以为然，亦不以为全无道理，亦是受了这些论调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自己的生活也有了变化，过得比较舒服了。因而对那些铺张浪费的现象的感觉就迟钝了，原来认为不应当的事，也觉得无什么了。"(26)

我们之所以引述这段话，是想让读者看出：早在 1952 年，三十三岁的赵紫阳不仅能把握住"检查"的分寸(既不讲自己很正确，又不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亦达到了高超的水平。

其后，赵紫阳在"自我鉴定"中检查了自己在掌握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上有摇摆偏向，他说："虽然因为我来华南后直接负责了农村工作，对城市工作方面的问题接触不多，处理尤少，不能从我直接处理的问题中更深入地检查我的认识和思想，仅从我来华南以前所处理的这方面的问题和来华南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仍能说明我在政策的掌握上还存在着片面性，掌握不稳，经常有摇摆的偏向。其规律是强调斗争时，往往发生一些左的思想，斗争得过分，不能适可而止，当强调团结时，又易发生一些右的偏向，过分迁就，应当斗争的不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既要长期相处，又要划清界线，既要团结又要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今后必须更好的学习。"(27)

从上面的"检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赵紫阳已认识到，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和方法，是党内常产生的"左、右"倾的一个重要根源。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正是由于赵紫阳较早地对这个重大问题在理论上有了升华，他才能够在尔后的若干次类似斗争中比较顺利地度过难关，化险为夷。

赵紫阳在自己的"自我鉴定"中还专门谈到自己在农民问题和反地方主义问题上所谓"自由主义错误"，他说："去年八月以前，我自己就是被排斥的。我是不满意的。但我没有对分局的农民和地方主义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我提出意见，可能有助于问题解决，至少会引起领导上的注意，使问题易于解决。我所以发生这样的错误，是不适当地过分地去考虑所谓'时机'和'效果'问题，怕提得过多和过分尖锐领导接受不了，反而引起反感，今后工作更难做，实质上还是个人患得患失，认为自己刚来不久，摸不清'行情'，顾虑较多，怕引起别人反对，怕解决不了。特别是当时我所处的地位困难，直接担负的土改工作还很难完全插进去，其他的问题，更觉得应当放到以后再说，因而一直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28)

这样，作为一个南下干部，作为实际上未犯错误并被此次会议确认为正确一方的人，赵紫阳通过这样的"检讨"，大大地缓和了地方干部、尤其是叶剑英等老上级对自己可能产生的不满。当时中共党内斗争往往表现为：胜利的一方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失利的一方垂头丧气甚至精神崩溃没完没了地反复交代检查。而赵紫阳这次的确做到胜不骄。尔后，他还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也能做到败不馁。

十天之后，即1952年7月25日，赵紫阳所在的中共华南分局办公厅党支部根据赵紫阳本人的自我鉴定，给他作了组织鉴定。鉴定是这样写的：

"赵紫阳同志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和较丰富的工作经验，思想方法与学习方法正确；因之，观察问题，考虑周详，认识深刻，全面而

又能抓住中心环节。工作能有中心、有步骤的解决问题。领导作风能经常保持冷静头脑与从容态度。在克服广东农民运动右倾和对土改的领导是有贡献的。其缺点是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时，有些自由主义和个人得失的考虑，对地方主义及办公厅的某些问题，不敢大胆积极提供意见，接触面过窄，了解干部的思想状态较差，故对一般干部的帮助尚感不足。"(29)

从华南分局办公厅党支部对赵紫阳的这个鉴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党组织对赵紫阳的工作作风和领导能力作了相当准确的判断。对于党支部所指出的赵紫阳的缺点，很大程度上是例行公事的，即任何一个干部都需要列举几条的。要知道，谁能没有缺点呢？何况这些缺点也是赵紫阳本人先讲的。另外，办公厅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们也很希望今后能多接触赵紫阳，因为上级领导对自己的接近、了解和帮助，对下级干部们取得进步和提升是必不可少的。

1953 年 7 月，叶剑英奉中共中央之命调武汉任中南局代理书记及中南大军区代理司令员，随后，又调回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30)华南分局的第一把手由陶铸接替。赵紫阳经中共中央批准，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同时兼任刚成立的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实际上已成为陶铸的副手(名义上仍居分局另外两名副书记之后)。这样，年仅三十四岁的赵紫阳已成为拥有三千多万人口、具有特殊战略地位的一个大省的副书记了。即使在当时中共高级干部普遍年轻的情况下，这也是不多见的。可以这么讲，赵紫阳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

在这以后的十五年中，赵紫阳是陶铸的最主要的副手，在南粤处于主持政务的地位，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巨大风暴从天而降。

(1)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605页,红旗出版社1983年北京版。

(2)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十三次常委会(1951年5月6日)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名单。

(3) 叶剑英:《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与华南当前的斗争任务》1951年6月。

(4) 同上。

(5) "赵紫阳关于乐昌县农运工作致华南分局的报告(1951年7月20日)。"

(6) 同上。

(7) 同(5)。

(8) 方方:"我的错误初步检讨"(1952年7月12日)。

(9) 同上。

(10) 同上。

(11) "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6月30日)。"

(12) 同上。

(13) 同(11)。

(14) 同(11)。

(15) 同(11)。

(16) 同(8)。

(17) 同(8)。

(18) "武光同志在华南分局1952年7月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19) "伍晋南同志在华南分局1952年7月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20) "赵紫阳同志在华南分局1952年7月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21) 同上。

(22) 同(20)。

(23) 同(20)。

(24) 同(20)。

(25) 《新中国纪事1949—1984年》第63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6) "赵紫阳致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信(1952年7月18日)。"

(27) 同上。

(28) 同(26)。

(29)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办公厅党支部对赵紫阳同志的鉴定.1952年7月25日。"

(30)　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9期第9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第七章　主管南国农业

1953年7月，赵紫阳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兼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当时，叶剑英调离，陶铸继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到1955年，华南分局与中南大区行政委员会同时撤消。赵紫阳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不再兼任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但在省委中分工负责农业。1960年，赵紫阳担任广东省委常务书记。我们可以把1953年到1960年这七年，视为赵紫阳主管广东农业的时期。

赵紫阳在广东的晋升与发展，是与陶铸的器重和放手任用分不开的。对此，赵紫阳本人在1979年3月发表的怀念陶铸的文章《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中写道："我在陶铸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十五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永生不能忘怀。他，对待党的事业，对人民、对同志炽热如同一团烈火；他，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敢于披荆斩棘，闯开新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他，忘我工作，不知疲倦，富于创造精神，工作效率极高。……回顾陶铸同志的一生，屹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卓越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1)赵紫阳写这篇文章时，陶铸早已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终于签字，这是一件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事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半岛上同以美国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甚至略占上风，迫使美国将军开创了在美国政府指令下签订一个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的先例。这一事件大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全世界、尤其是在亚、非新兴国家中的地位。中国长期的战乱局面终于结束，一个大规模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

这样，广东作为前线的色彩淡漠了。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于离任前的1953年4月18日宣布全省土地改革胜利完成。由叶签署的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布告宣称："我省土地改革任务业已胜利完成，所余少数地区复查工作亦可在夏收前全部结束。今后农村工作的任务，是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全力发展生产。"(2)

195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赵紫阳参与下，发出《当前稳定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的指示》，内称："近据各地反映：目前农村的情况仍然比较混乱，山林水利纠纷、械斗仍不断发生、强迫借贷、强迫互助等各种违反保护私有制政策的行为仍在继续，土改中伙分牛因管理不善造成大量死亡；农村中坏分子和二流子大吃大喝，聚赌、偷窃、打击乡村干部，使部分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一部分转业工人不安心农村生产，请愿、盲目流回城市；地主不劳动，丢荒了不少土地，未分配之机动田亦有一些丢荒。这些情况说明要搞好目前由改革到生产的过渡，必须针对上述情况，进行一系列工作，必须把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作为当前的中心环节。"(3)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土改刚结束的广东农村，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形势。赵紫阳就是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全面承担起粤海主农的担子的。

上述华南分局的指示强调指出，稳定农村、发展生产的关键一环是："在当前须着重宣传贯彻保护私有的政策，以稳定土改后农民所有制这一新的生产关系，充分发挥其对生产的积极作用。凡土改已结束者，应尽快颁发土地证，确定财权。在开展保护私有政策的宣传上，要针对当地群众思想疑惧具体解释，克服对目前农村中存在的各种侵犯与不尊重私有财权的现象，认真予以检查纠正，使保护私有的政策得以具体贯彻。"(4)

这个指示及相应的一系列具体政策的贯彻，使广东农村的混乱局面得到迅速扭转，生产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农民分到渴望了几

代的土地，现又被告知保护私有财权，致使生产积极性大大高涨。不仅广东如此，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是如此。实际上，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不奇怪，历史上在农民大起义基础上建立的新王朝，将原先腐败王朝过分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打破之后，社会生产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新王朝初年的强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二十世纪中叶的情况与旧王朝时代大不相同，但土改后稳定一段较长的时间，哪怕是稳定中共中央曾规定过的十五年时间，都将大大促进中国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并为国家的工业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

但是，历史却没有这么发展。1953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内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根据党的这个总路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不但要求工业经济的高涨，而且要求农业经济要有一定的相适应的高涨。但孤立的、分散的、守旧的、落后的个体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它与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已日益表现出不能够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改善生活的需要，不能够满足整个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5)

1953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次谈话中也讲道："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作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6)

这样，随着党中央、毛主席一声令下，广东和全国其他地区便雷厉风行地放弃了保护私有财权的政策，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道路，是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作为党的一名分局副书记的赵紫阳，自然必须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议，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于1954年6月对广东二十五个社的驻社干部讲道："现在农业跟不上工业，供不应求，农业落在国家需要的后面，问题很大。如何解决？靠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产是太慢了，靠国营农场大量开荒，因没有拖拉机，而且大量的荒地又在交通不便的地方，现在看来也不成。因此农业增产不能等待拖拉机，在目前就要靠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7)

不过，赵紫阳也强调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他讲道："我们的合作社虽然初步显示了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但还没有结果，今天只是初步克服了经营上的混乱现象，还不能说已经巩固下来。合作社是否能增产，增加收入，仍然是社员最大的顾虑。所以合作社能否巩固，还要看夏收能否增产，增加收入。这是决定合作社垮台和巩固的关键。为了要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我们便要真正做好防止灾害，抵抗灾害和田间管理工作，争取夏收丰收，同时还要贯彻互利政策。"(8)

在这里，赵紫阳从实际出发，把能否增产、增收视为合作社成败的关键，并要求干部们做好具体工作。赵紫阳还强调了互利政策，即农民群众的切身利害问题。

1954年10月，以赵紫阳为部长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就农业合作社的某些政策问题提出一些初步意见，内中讲道："正确地处理农业合作社在扩社、并社中的新老社员及社与社之间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9)

在这份"初步意见"中，农工部就土地增产问题，公共财产处理问题，并社中的具体问题和扩社、并社后的统一经营等问题都作了若干内容具体的规定。但是，作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经发动，任何具体的政策规定也就无济于事了。

赵紫阳于1954年12月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在肯定合作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指出："由于运动的时间短，

突击性大，收缩过猛，中间断气，干部经验不足等而又有着某些急躁情绪，因而运动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和错误：一，老社的巩固工作被挤掉了。前段着重扩大，结果很多老社变成新社；限期集中力量搞征购，两头一挤，老社的巩固工作便没有时间进行。由于老社没有前进，旗帜作用便不大。……二，新建社工作粗糙，主要是工作问题。一是思想发动差，组织巩固工作没有作好。二是三评遗留问题很大，执行政策上也有偏差。特别是卖牛、砍树等现象仍然存在。"(10)

自然，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全国性的。归根到底，这是由当时已经开始的党在经济建设等问题上"左"的倾向造成的。这不是赵紫阳所能扭转的。不过，赵紫阳毕竟还是看到了其中的弊病，并在分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出来。

由于全国各地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都出了问题，许多农业合作社都是按上级层层加码的数量指标一哄而起的。许多地方，还出现大批出卖、宰杀牲畜、砍伐树木、变卖生产工具等现象，致使生产受到破坏。1955 年 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要求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毛泽东也在与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谈话中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目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11)

在这种背景下，赵紫阳于 1955 年 5 月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中着重讲道："建社中特别要注意互利政策，这主要是贫、中农互利和公私互利的问题。中央指出，我们要以贫农的基本利益出发。什么叫贫农的基本利益？贫农的基本利益就是把中农团结好，社办好，生产搞好。"(12)

赵紫阳还很内行地讲："开始办社不要搞得太复杂，内容要单纯一些，要逐步地由低级到高级。目前我们对合作社的要求有些搞得太高太复杂了。今后任务增大，发展要多，内容就要单纯些，规模

要小些，经营管理的制度也随之要简单些，这样就可以多办，以后也要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的提高。不要办大社，办得小些，二、三十户左右即可。"(13)

从以上言论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赵紫阳处事稳当、不走极端的工作作风。这种工作作风，在当时为革命的巨大成功所振奋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中，还是不多见的。

在此前后，还发生了另外一些多少与赵紫阳的前途有关的事件。第一件事：1954 年 4 月 27 日，邓小平在北京就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为以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参与主持中央工作打下了基础。第二件事：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于 1955 年 7 月撤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仍受中共中央中南局领导。赵紫阳担任了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陶铸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三件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于 1955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这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草案决议，并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饶的党籍，撤消二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高岗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高、饶事件是建国后中共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

1955 年 9 月至 12 月，毛泽东不甘心放弃自己的农业合作化理想，在纠正运动中某些过火行为的同时，又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满怀热情地盛赞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当然，这些积极性大多数是人们根据毛泽东的喜好而挑选出来汇报上去的。毛泽东写道："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毛泽东还生动地介绍了全国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毛泽东在自己的多篇按语中大批所谓的右倾，并对建设的速度

问题提出了不少过急的设想。(14)毛泽东称1955年为“重要的一年”。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所以，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左”倾路线还将继续下去。

1956年2月至3月，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应邀参加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2月15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苏共代表大会上讲话，并向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词。(15)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事先未与中共协商，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报告。尽管中共在历史上与斯大林也有过分歧，但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与斯大林在苏共党内有相似之处，所以苏共反对斯大林搞个人迷信，就意味着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绝对权威构成了威胁。

同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邓小平当选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并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一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要在揭露和解决矛盾中前进。这个讲话还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并规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针方法。

同年4月29日，赵紫阳在广东省第一次水产会议上作了学习毛泽东上述讲话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赵紫阳详细论述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情况，其中不少思想，十分新颖精辟。赵紫阳讲道：“人民内部矛盾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这些矛盾主要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上，这一点必须特别指出来，因为有些同志不容易承认人民内部的矛盾，更不容易承认人民与领导之间的矛盾。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最不容易看到的是这一方面。群众与领

导者之所以会发生矛盾，是由于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彼此处于不同的地位，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不完全一致。人民群众是从事体力劳动的，不能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所以不容易了解全面情况和困难。他们只能从局部的情况，从很小的范围，从自己的范围来看问题，因此比较容易看到眼前的局部的和切身的利益，看不到长远的、集体的和全面的利益；领导者是直接管理国家事务的，比较能够直接看到长远的、集体的和全面的利益，比较容易了解整个情况和国家的困难。但是，也容易忽视具体情况及人民群众的当前的切身利益。这两方面都有片面性，因此从不同的地位、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群众服务的，因此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16)

赵紫阳在1957年讲的这一席话，就在今天听起来也是很能给人以启发的。他接着讲道："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处理群众与领导的矛盾，关键在于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在我们的同志中，第一不容易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第二不容易承认人民群众与领导的矛盾，第三不容易承认克服人民群众与领导之间的矛盾的关键在于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而事实恰恰是这样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在一般情况下不至于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如果领导机关、领导人员与干部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种矛盾会发展、紧张，甚至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及时解决，会不会扩大，关键在于领导。"(17)

赵紫阳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上述讲话，虽然是对毛泽东的讲话的"学习体会"，但是他没有象当时的许多干部那样、机械地重复毛泽东的话，或讲一些套话、空话，而是有所发挥、有所创新。尤其可贵的是，赵紫阳比较尖锐地谈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中最重要的一种——领导与群众的矛盾，并认为，解决这类矛盾的关键，在

于克服领导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1957年7月13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又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赵紫阳又一次全面地论及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他说："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要联系群众、了解下情，特别是了解工作中的缺点，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党的全体同志就必须自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经常想各种办法做到比较容易地面且是真实地了解下面的情况，听到一些直接或间接来自群众的反映，以便很好地发现工作中的缺点。"(18)

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通过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可以发现并能够处理一些虽然是具体的，但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甚至会发现一些严重的事件。因为在下边某些环节是有官僚主义的，而且某些官僚主义还是比较严重的。如果领导机关对于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比较重视，面由于领导的重视使群众相信了这点，那么社会上某些不平的、黑暗的事情，人民群众就可以直接向领导机关揭发和控告，或者请求解决问题。做到了这样一点，我们社会上的不平的、黑暗的事情就会因为掩盖不住而大大减少。"(19)

赵紫阳对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很重视的。其实，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正是靠着为群众办实事、解决最迫切的群众利益而赢得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和支持的。面全国胜利之后，由于强大的敌人没有了，因此，即使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也不致于下台。加之，有些政策受一套先验的、教条式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于是官僚主义等弊端便多了起来。与此相联系，人民的来信、来访也大为增加。

赵紫阳还专门谈到广东一些人要求赴港澳或外国的情况。对此，赵紫阳是这么讲的：

"关于群众要求去港澳或者要求出国的问题。据说，来信、来访

中有许多华侨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去港澳，而有关部门又不批准，所以感到不好办。我想，今后对于去港澳的限制可以适当放宽些，因为港澳同广东在历史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毗邻港澳的村镇同港澳之间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因此，有些人一定要去港澳的，就可以允许他去，中国人很多，让他出去一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到港澳去的人多了，那里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人们就再不愿意去了，你越不让他去他就非去不可。有人觉得香港、澳门好象'天堂'一样，其实那里失业、失学的人很多，许多国民党的伪军官及政客官僚在街头作小贩，他们的女儿则作娼妓，那有什么出路呢？因此，要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硬要去的可以允许并告诉他们，目前是香港方面搞所谓'出入口平衡'的限制，所以不能怪我们的政府。"(20)

赵紫阳对这个问题的处理颇为高明。如果简单地一味不允许人们赴香港、澳门及外国，反而会引来抱怨。按照赵紫阳的做法，既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又适当地解决了问题。如果人们去不成港、澳，只能怪香港、澳门当局。至于赵紫阳讲的港澳没有生活出路、失业、失学的人很多等情况，在五十年代港、澳经济尚未繁荣之际，大体上是属实的。例如，中共最老的党员，1938 年叛逃投奔国民党的张国焘，当时在香港的日子就很不好过，只能靠美国一所大学预付的《回忆录》稿费维持生活。张甚至还一度托人给党中央带话，想回归，并已将一个儿子送回大陆上学。张还张口叫穷，请求中央周济一下。对此，毛泽东曾宽大为怀，考虑同意张的要求，并指示，只要张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与美蒋割断联系，可以酌情给他一点钱。作为报答和留后路，张国焘表示将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笔下留情，还托人将未发表的稿子送交大陆。自然，以上讲的是五十年代的情况。到了六十年代，由于香港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由于中国大陆不断搞政治运动，人为地破坏生产，致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957年，还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即“反右派”斗争。

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普遍地、深入地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改进工作作风。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党外知名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并发动群众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5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不料，有的批评十分尖锐，还有极少数出格的言论，竟隐含有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意思。

6月8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时机，打着帮助党整风的旗号，发动了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21)

这样，从6月上旬开始，在全国各地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直到1958年夏季才基本结束。按照毛泽东于5月15日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的估计，参加整风提意见的人中有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十是恶意的（执行中实际上是按上限即百分之十掌握的）。这样，各地各单位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了不少右派，严重地扩大化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内干部被错误地划分为“右派分子”，长期蒙冤受屈，严重地践踏了民主和法制，大大地恶化了党群关系，沉重地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在广东，由于赵紫阳是主管农业的书记，而中央规定在工人和农民中一律不划“右派”，所以他可以不参与划“右派”的工作。从这一点看，他是幸运的。否则，作为党的一名书记，如果不划足够数的“右派”，那就证明你本人至少也归于右倾之列，甚至可能被划成“右派”。而陶铸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由于主持了广东的“反右

派"斗争，因此直到今天还不能得到广东一部分受冤屈的人们的完全谅解。

在1957年夏秋之际，根据广东省委和陶铸的建议，中共中央派遣1925年入党的广东籍老干部陈郁赴广东工作，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东省省长。在这之前，广东省长是由陶铸兼任的。陈郁在党内资格很老，是1930年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相当于中央委员)，曾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受到迫害，1940年返回延安。陈郁与陶铸及赵紫阳的关系都很融洽。当陈郁到广州任省委书记时，适逢广东省委召开干部会议。这个会议本已议定由赵紫阳作主要报告，陈郁一到，陶铸和赵紫阳都请陈郁作主要报告。陈坚决不肯，仍由赵紫阳作了主要报告。(22)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评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23)这是在报刊上最早提出"跃进"和"大的跃进"口号的文献。

11月中旬，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并在庆祝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英国的急于求成的口号。(24)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集了有九省二市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简称南宁会议。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重申了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讲了迎接新的生产高潮的任务、政治原则、工作方法。文件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提出今后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这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把周恩来、

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实事求是纠正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说成是所谓“右倾”、“促退”。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是方针性错误。(25)

3月9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评了反冒进，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讲话还进一步发展了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的讲话反复强调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26)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赵紫阳于1958年4月13日在广东省合作会议上作了讲话。为了与中央的口径大体一致，他也讲了争取大丰收、农业超过日本的话。他说：

“必须切实做到和保证1958年大丰收。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如果今年大丰收，五年计划的实现就不成问题。这对广大群众的鼓舞很大，对全国人民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很震惊，很重视这一点，他们在看着我们的结果，因为亚洲很多国家的粮食问题解决不了，如毗邻我国的印度，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年年闹灾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大国，今年能大丰收，可使人心向往，所以意义很大。因此，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说日本的农业了不起，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很快就超过它。如果全党能以抓水稻一样的劲头抓番薯，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增产一倍、两倍，甚至几倍，使广东的粮食提前实现800斤。各地可以研究一下，今年丰收究竟有无把握，还要采取什么措施？800斤的指标，要有1000斤的措施才行。”(27)

公道地讲，赵紫阳这段受到“大跃进”形势影响的讲话，按当时的标准看来，是不算太过分、太离谱的。例如，他提出的广东粮食实

现亩产800斤，必须采取亩产1000斤的措施，这也是说得通的。

赵紫阳还讲到爱惜民力、适当休整的问题，这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他说："冬春以来集中力量搞基本建设是对的，但春耕大忙之后，要注意副业问题。同时要划出一段时间休整一下。所谓休整，就是不开夜班，减轻劳动强度，每个月放一两天假，让群众喘一口气。现在多数地区的劳动强度已提得很高，但不能长期这样，要让群众有休息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一天干十个钟头，需要开夜班的，一天干十三个钟头就可以了。劳动强度是有限的，不可无限度地提高。"(28)

赵紫阳还强调了技术革新问题。他说："现在，工具革新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是一个进一步促进生产跃进的主要环节。大跃进出现的矛盾是劳动力不够，群众有点疲劳，怕吃不消。他们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太辛苦，将来共产主义更吃不消。'不能无限度地增加劳动强度。最近番禺县提出口号：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好的，但不一定要用愚公移山的办法，要有诸葛亮的办法，诸葛亮就创造了木牛流马。(29)

赵紫阳心里装着农民的疾苦。他这里讲的不一定非要"愚公移山"，更要用诸葛亮的"木牛流马"，这个比喻生动、具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就因为这一番话，在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赵紫阳作为"刘、邓、陶在广东的代理人"的"罪行"中便又增添了一条："竟敢用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反对毛主席的愚公移山"。

赵紫阳还讲到农业生产的管理制度问题。他说："合作社管理工作跟不上生产的需要，这个问题已很突出，而且已经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大跃进能够搞起来，现在主要是靠政治，靠群众热情。当然，搞好生产靠政治是一定的，政治是基本的，因为政治是统帅。但是单靠政治工作还不行，这样群众的热情是不能持久的，还必须有好的管理制度来保证，使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得到合理的解决，使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得到真正的体现，以促进生产的发展。(30)

在这里，赵紫阳在承认政治是统帅的同时，大胆地提出：单靠政治，群众的热情不能持久。他还强调，要真正体现按劳取酬。上述两点，也都是“文革”中造反派所列举的赵紫阳“反对突出政治，大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的重型“炮弹”。

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还讲到基层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说：

“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完全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应造成自由讨论敢于讲话的空气，使群众敢于讲正面话，也敢于讲反面话。应更好听取正面的意见和反面的意见，先进的意见和落后的意见。少数人讲了落后的意见并不可怕，不讲出来才难于发动。经过讨论以后，正确的意见为多数群众所接受，错误的意见有些就可以改正，有些就变成少数人的意见。制服群众是不行的。不要加压力、不要戴帽子、不要采取集中批判的办法，要对事不对人（当然不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批判，比如懒汉、二流子是可以集中批判的），讲错话没关系，这样是可以解决问题的。(31)

读到这里，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无须笔者多所评论了。读者只需记住一点：这一席惊人之语，乃是赵紫阳在 1958 年 4 月 13 日的公开讲话。当时，“大跃进”的战鼓已经擂响，“反右倾”的大网也即将“纲举目张”。

1958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重申，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2)

7 月 23 日，农业部发布 1958 年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宣称这一年夏收粮食作物总产量达 1010 亿斤，比去年增产 413 亿斤，增长 69%。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

么》的社论，主观主义地认为，现在“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所谓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33)

7月31日，赵紫阳在广东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作了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前半部分，赵紫阳为当时全国各地浮夸虚报的粮食产量所鼓舞(当时他不可能知道这些产量数字是虚假的)，对粮食生产的前景十分乐观。他说：

“在全国农业生产高速飞跃发展的情况下，粮食局势正在起着根本性的变化。一、二年之内，粮食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人民在粮食问题上的紧张心理也不要很久的时间就可以消除，这一情况将大大鼓舞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使生产更大跃进。同时，我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本地解决粮食问题。这对国际形势必会发生深远的影响。”(34)

在比较各省的粮食产量时，赵紫阳讲道：“广东早稻生产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今年的春收、夏收增产65亿斤，比过去成绩是很大的。原来我们都以为这已经‘差不多’了，但在中南与其它省相比，就不是‘很不错’，而是差得很多，广东在今年早稻是掉在后面的。这无论从放‘卫星’，或者从大面积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及增产总额等三个方面来讲，我们都不是站在前面，特别是从前两者来讲，我们确实已经掉在后面。”

赵紫阳在这里讲到的广东粮食的产量，在中南大区的几个省中是落后的，这正好说明广东在虚报产量方面是最少的。否则，以广东的自然条件和管理水平，怎么会在水稻的产量上落后于湖北、江西等省呢？(35)

赵紫阳接着讲道：

“至于放‘卫星’，(广东)则更是突出的落在后面，江西、湖南和湖北三个省都有比较大面积的平均亩产达到1000斤以上的，都出

现了水稻亩产800斤、900斤、1000多斤的县。还有亩产4000斤，或5000斤，以至1万五千斤的高额丰产田；而我们最高的丰产田不过2000多斤，最高的县只不过亩产600斤。前次，新华社发了一条消息，报道广东全省千斤亩有6万亩，800斤亩有21万亩，江西日报把它刊于第一版，第二天，又有一条消息，仅南昌一个县就有17%约5万多亩是千斤亩。广东一个省的千斤亩仅等于江西一个县，有点太不象话了。"(36)

对此，笔者无从猜测，赵紫阳是真的感到广东的水稻产量"太不象话"，还是暗指湖北、湖南、尤其是江西等省在搞虚夸？不管属于何种情况，人们都必须承认，由赵紫阳主管农业的广东，无疑是中南大区诸省中在这场大疯狂中显得比较冷静的一个省。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通过了在本年内就使钢铁的产量翻一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37)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山东寿张县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1到2万斤玉米、谷子。措施是所谓在足水、足肥、深翻的基础上放手密植。一亩谷子过去只留苗3万多株，现密植到10万、20万，40——50万株。这篇文章反映了在大跃进中，浮夸风和农业高估产达到荒诞的程度。(38)

9月28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委电话会议上讲到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建立人民公社是中共中央的决定，赵紫阳作为一个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一决定。因此，他也讲，人民公社运动是一场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是一次生产关系的大变革

和深刻的思想革命。(39)

但是，从赵紫阳的以下话语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的思想疑虑。他说：

"贫农下中农对人民公社是积极拥护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贫农下中农中还有些个人主义想占点便宜，特别是对这个新的制度不习惯，不知怎样搞，对政策不摸底。他们中不少人由于共产主义觉悟不高，对军事化社会化供给制工资制等等不习惯，个人得失疑虑多，有些地区一宣布不记工分实行供给制、工资制了，就出现劳动组织松弛、劳动纪律不好的现象。过去农业社是靠工分，很多农民为工分而劳动，现在一搞供给制(虽然不是全部供给制)，如果政治工作跟不上去，共产主义思想不增加，那就会出现一些劳动态度不好、劳动出勤减少的现象，但这是可以解决的，因为这是办公社初期群众对新的制度不摸底、不习惯、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去，这就说明广大群众提高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是很有必要的。"(40)

在当时的情况下，赵紫阳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对人民公社表示异议，这种事在中共党内是根本不允许的。他一方面隐约地表示担忧，另一方面，还得说这些不健康现象只是暂时的，是可以解决的。的确，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环境下，畅所欲言几乎是不可能的。

10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共有人民公社23,397个，参加的农户达总农户的90.4%，平均每社4,797户。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的，和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县联社的据13个省统计已有94个。(41)

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指出公共食堂在农村和城市将普遍地建立起来，成为我国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从此"公共食堂化"，实行"吃饭不要钱"，就作为"共产风"的一部分吹遍全国。(42)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

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43)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继续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积累同分配的关系和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从理论上、政策上对于公社所有制等问题,作了阐述。

这次会议在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等问题上,起了积极作用。(44)

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检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进一步调整生产指标,通过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

针对当时干部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45)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著名的庐山会议。会议在讨论中,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部分领导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了1958年的经验教训,批评了“大跃进”中的错误。认为农村“共产风”、农村食堂、供给制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另一部分人不满意对实际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彭德怀鉴于会议中的分歧意见,于7月14日,按组织原则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的工作成绩,指出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成绩确是伟大的”,在此基础上也指出了1958年工作的缺点错误。他指出,“大跃进”的缺点错误造成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在全民炼钢中有失有得,就其性质

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这个意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16 日，毛泽东批示将信印发给与会者讨论。讨论过程中，许多人对信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不少人对信中观点表示赞同。23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信，认为这封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毛泽东讲话后，会议方向转到了集中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

8 月 2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主要议程是：一、检查 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二、继续揭发批判所谓“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反党集团”。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了话。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全会继续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指责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并毫无根据地宣称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并牵连历史上的问题一起批判。8 月 11 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再次讲话，把彭德怀等的意见指责为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彭德怀等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党内的同盟者”。8 月 16 日，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46)

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斗争，不仅从上到下地打击了大批党员干部，而且，在政治上，使民主和法制再次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中断了正在进行的纠正“左”倾的进程，使“左”的错误延续和发展，给国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959 年就在这样一片“反右倾”的战鼓声中过去了。接着，极端困难的 1960 年和 1961 年来到了。中国人民在这两年经受了一场苦难。赵紫阳当然无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虽然参加了庐山

会议，但当时还不是中央候补委员，因而没有表决权。作为广东省委农业书记，他只能参加某些特许他参加的中央一级的会议，并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想必，当赵紫阳第一次听到庐山会议的决议时，他一定会感到无比震惊。彭大元帅、堂堂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第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朝鲜战场上打败联合国军的英雄，居然由于"反对大跃进"而一下子成了"反党分子"，这怎能不令赵紫阳寒心呢！

无疑，毛泽东是全党奉若神明的伟大领袖，彭德怀是战功卓著的元帅，但是，在政治上乃至在军事上的大争论中，元帅必须服从主席，就象在朝鲜战场上败北于彭德怀的美国五星将军麦克阿瑟必须服从杜鲁门总统一样。看来，各国概莫能外。所不同的是，当年美国麦帅扩大朝鲜战争的主张是错误的，因此，他被撤职，使一场更大的战争悲剧得以避免。而中国彭帅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因此，他被打倒，导致中国又出现一场大悲剧。据统计，在这场大悲剧中丧生的人数，并不比中华民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少。(47)

毛泽东曾在几个月前号召共产党人学习海瑞敢讲真话的精神，号召人们不要怕被撤职。但是，当真的"海瑞"挺身而出时，他却采取了比好龙的叶公厉害十倍的法子，不是"避走"，而是大发雷霆，断然"拿下"彭德怀这个现时代的"海瑞"。

想当年，在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转战中，毛泽东为了鼓励冲锋陷阵的彭德怀，曾赠他诗云："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如今，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威，也许还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毛泽东竟毫不手软地将患难之交的老战友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政治斗争真是如此冷酷无情吗？

当然，还应当看到，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个极端的决定，还有着当时难以明言的特殊原因，这就是怀疑彭德怀在苏联的支持下同自己进行政治较量。事有凑巧，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率领中国

军事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和东欧诸国。在苏联访问时，当时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明显分歧的苏联方面曾故意宣扬"彭德怀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对此，毛泽东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此外，在当时力量对比的情况下，一旦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发生难以调合的政治分歧，其结果，只能是以彭德怀要被打倒而告终。其实，彭德怀的思想深处并非全面反对毛泽东。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己的"检查交代"中写道："（我）同时也考虑到，我党中央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并积极支援国际上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威信受到了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48)即使含冤被自己的领袖所打倒，还要强求自己去维护领袖的威信，这不能不说是一场可敬的悲剧。

从1960年开始，赵紫阳结束其主持南国农业的时期，升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书记、第二书记和第一书记。但是，赵紫阳注定还要在南粤大地上经历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的十五年。

(1) 赵紫阳："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3日，又见《四川日报》1979年3月24日。

(2) 《广东省人民政府布告》，1953年4月18日。

(3)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当前稳定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的指示》1953年5月29日，载《华南农村》第一期，第1页(1953年6月3日出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主办。

(4) 同上，第1—2页。

(5) 载《人民公社万岁》第13页，农业出版社1960年北京版。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0页，1977年北京版。

(7) 赵紫阳："巩固第一批社，办好第二批社，迎接互助合作运动高潮"，载《华南农村》第18期，第1页，(1954年6月6日)。

(8) 同上，第7页。

(9)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扩社、并社中某些政策

问题的初步意见》1954年10月12日，载《华南农村》第27期第1—2页(1954年10月23日)。

(10) 赵紫阳："广东秋前建社运动情况与今后工作的意见"，1954年12月11日。

(11) 《新中国纪事1949—1984》第139—140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出版。

(12) "赵紫阳同志关于今后农村工作安排的发言"，1955年5月24日。

(13) 同上。

(14) 同(11)第153页。

(15) 同(11)第166页。

(16) 赵紫阳："在广东省1957年第一次水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4年4月29日。

(17) 同上。

(18) 赵紫阳："在(广东)全省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13日。

(19) 同上。

(20) 同(18)。

(21)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22) 欧初："丹心一颗见精纯"，载《回忆陈郁同志》第189页，工人出版社1982年北京出版。

(23) 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

(24) 同(11)第225页。

(25) 同(11)第229—230页。

(26) 同(11)第231—232页。

(27) 赵紫阳："在广东省合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4月13日。

(28) 同上。

(29) 同(27)。

(30) 同(27)。

(31) 同(27)。

(32) 同(11)第234页。

(33) 同(11)第239页。

(34) 赵紫阳："在(广东)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7月31日。

(35) 同上。

(36) 同(34)。

(37) 同(11)第 240 页。

(38) 同(11)第 241 页。

(39) "赵紫阳同志在广东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9 月 28 日。

(40) 同上。

(41)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 日。

(42) 《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25 日。

(43) 同(11)第 245 页。

(44) 同(11)第 250—251 页。

(45) 同(11)第 256 页。海瑞是十四世纪的明朝人,曾任兵部侍郎等职,因上疏反对皇帝的弊政,被明朝嘉靖皇帝罢官,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

(46) 同(11)第 262—264 页。

(47) 据中国统计部门发布的数据,中国人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展开的 1959—1962 年间,至少减少了两千万人口。

中国人口 1958 年至 1962 年统计如下:

1958 年人口 65,994 万 1959 年人口 67,207 万

1960 年人口 66,207 万 1961 年人口 65,859 万 1962 年人口 67,295 万。

另外,当时中国人口的年自然增长率为 2% 左右。参见《中国人口年鉴 1985》第 807 页、187 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北京版。

(48) 《彭德怀自述》第 277 页。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北京版。

第八章　走向省委第一书记

1960年年中，赵紫阳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升任省委常务书记，不再是省委中分管农业的书记，而成为协助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负责全省全面工作的书记了。

就在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西北、西南和中南六个大区中央局，而中南局的所在地，从中南大区行政委员会所在地的武汉，迁至广州。陶铸兼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这样，广东省的工作担子，更多地由赵紫阳来承担了。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估计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年更好。会议制定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又一次规定了钢产量为1,840万吨的高指标。会议还提出了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会后，在"大跃进"、"反右倾"的形势下，各省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致使"共产风"更严重地泛滥起来。(1)

2月19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委电话会议上就人民公社的过渡和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作了一个讲话。在这个讲话中，赵紫阳一方面必须按照党中央统一的口径表态，另一方面，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盲动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赵紫阳讲道："人民公社从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过渡是必然的趋势，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但目前一般来说还不具备过渡的条件。既然不具备条件，过早地过渡就会不利于生产，就会重复一九五八年曾犯过的'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一九五八年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深刻的，全党都要重视。目前的问题是要准备条件，不能勉强过渡，不能在过渡问题上抢先，要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规律

去办事。"(2)

在这里，赵紫阳明确地提出了在所有制方面过渡的标志，即必须按照客观的条件和客观规律去办事。强调这一思想，在1960年初全党头脑发热的情况下，是很可贵的。

赵紫阳对于在"大跃进"中盛行的"共产风"很反感，并在制定政策时适当加以限制（他也无力完全加以禁止）。他在这次电话会议上讲道："应该说，现在在发展社有经济当中，是有着一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做法，这是必须纠正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第一是无偿无限度的调拨大队的劳动力。……第二是乱调乱抓或无偿调拨大队的生产资料。……公社向大队调、大队向小队调、小队对社员也来这一套，这不就是'共产风'吗？这样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使生产大队的生产情绪动荡不安，影响大队生产，造成大批的浪费、破坏，使发展公社经济走上一个不正确的道路，大大助长公社一级干部不爱惜民力、物力、财力，没有经济核算观念，不勤俭办社。"(3)

赵紫阳在讲话中很注意农民的收入分配问题。他讲道："我们广东今年社员收入的增加是不快的。虽然是政治挂帅为主，但也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农民终究是农民，苦战一年，大跃进了，收入也要有较显著的增加。其次是供给部分的比例高了些，一般占分配部分的百分之四、五十。目前要压低供给部分有困难，应该往前看，今后供给部分不能再增加，大队只管口粮或基本口粮供给，小队及食堂管盐、油、菜，增加分配的部分应该用来增加工资。再次是要坚持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制度。此外，自留地还一定要有，而且要给群众一些时间去种，社员的家庭副业，养小量的猪、鸡、鸭、鹅是允许的，绝不容许再把农民的猪、鸡、鸭、鹅再集中起来。"(4)

人民公社体制竟集权到这样的程度，连农民养的猪、鸡、鸭、鹅也集中起来了。这一切，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它是实实在在地、大量地发生过的事实。

赵紫阳还专门谈到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他说：

“有些人不讲真话，不敢讲困难，不敢反映问题，谎报成绩，隐瞒缺点；工作不够踏实，指标搞得很高，但是没有措施或措施不具体，或有了措施没检查，还有铺张浪费，一些公社大盖礼堂、办公大楼和招待所，请客讲排场等；在基层干部中又有一些人滋长着生活特殊化，很少参加生产、吃小灶等脱离群众的现象。目前我们一方面发动群众苦战，多积累少消费，另一方面又这样铺张浪费，是一种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必然会遭到群众不满；有些人看到群众听话，作风就简单化起来，而不知道群众越听话，越要听取群众的意见，越要关心群众的生活。”(5)

在这里，赵紫阳实际上是批判了前一阶段的浮夸风。一个党、一个政权、一个组织，只有讲真话，才能存在和发展。一旦人人都不讲真话，谎报成绩，隐瞒缺点，那么，大灾难、大危险就要伴之而来了。赵紫阳的暗示很对：严重脱离群众，必然导致大乱子。

果然，到 1960 年春夏之际，“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批判彭德怀的严重后果终于显示出来了。各地农村开始大批地饿死人，其中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尤为突出。广东省由于自然环境较好，也由于省委在政策掌握上比较稳，所以，饿死的人数在诸省区中是比较少的一个省。

到 1960 年 5 月份，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5 月 28 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 月 6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到了随调随销的地步，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指示要求有关省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抢时间，调运粮食。(6)

由于国家的紧急干预，大城市中才没有出现大批饿死人的情况。但城市居民的日子也极为艰难，在一两天之内，所有商店里的

食品一下子都不见了，人们只得靠那一点定量粮食来维持生命。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工业部门应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压缩一切可能压缩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第一线，首先是粮食生产。同时，中共中央决定，降低城市和农村的口粮标准，淮河以南降到360斤，淮河以北降到300斤，重灾区则降到300斤以下；城市口粮标准，除高温、高空、地下和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口粮不动外，每人每月降低2斤左右。(7)

到了10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中，指出：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风和某些干部的特殊化，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8)

11月3日，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指示称：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1961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9) 由于中共中央已正式着手纠正"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赵紫阳在讲话时腰杆更硬了，口气更直率了。他在1960年11月11日广东省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道：

"现在许多地方经过了两年的农业欠收，再加上两年的'共产风'，底子已经非常薄弱，是经不起明年再来一个第三次的打击。农民在目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相信党，跟着党走，这是因为农民感念党以往的恩情，同时盼望毛主席和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之后情况会改变。如果我们不认真克服困难，明年春天还是一样发生问题，那就会使农民陷入无望的境地。如果真是这样，工农联盟就

会发生问题，整个经济局势就会严重地困难起来，这正是问题严重的地方。"(10)

看来，赵紫阳对问题的严重性是有深刻认识的。试想，成户、成村的农民面临饿死的威胁而不去造反，不去抢国家粮库，为什么他们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没有象千百年以来先辈们所无数次地干的那样揭杆而起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仍有着崇高的威信，它在土地改革中有恩于农民，使他们分到了土地。而且，当时党内还相当普遍地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据说，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的日子里，毛泽东在平日都不吃肉，周恩来则常去机关食堂买玉米面窝窝头吃，以示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赵紫阳在这次会议上还讲道：

"必须划清界线。对待基本群众绝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只能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处理问题。现在不是搞土改，也不是搞合作化的时期了。农村中的大量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当前突出的也不是两条道路的矛盾(当然这一矛盾还是长期存在，时紧时松的)，而是干部同广大基本群众，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矛盾。要在干部和基本群众中强调和坏人坏事、违法乱纪、国民党作风作斗争，强调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保护讲反面意见的权利，反对打击报复。"(11)

赵紫阳把反"共产风"与克服困难之间的关系分析得颇为透彻。他说："在粮食问题上要坚持承认差别，多产多吃，少产少吃的政策，不搞平均主义，又不能减少任务，还不准饿死人。有很多干部思想不通，认为这是有意为难。其实，这三条是粮食问题上必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任务不能减少，不准饿死人，这两条道理很明显。为什么又不准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呢?同志们很清楚，这两年粮食生产总产增加不多，除了自然灾害和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多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刮了'共产风'，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正在宣传贯彻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策，要纠正过去的'共产

风’，却又在秋粮分配上刮起新的‘共产风’，不承认公社与公社、大队与大队、小队与小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拉平，这就不能取信于民，会更加挫伤积极性。是不是困难的时候可以刮点‘共产风’？不对。‘共产风’既然是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之一，就绝不能用它来解决目前的困难。现在必须在粮食分配上体现‘奖勤罚懒’的政策，才能使原来生产好的更积极，生产差的认真搞好生产，使富队不怕平均，穷队不靠‘共产’，大家都安心努力去搞好生产。”(12)

赵紫阳还就宁“左”勿右、“共产风”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有相当多的干部存在着宁‘左’勿右的观点，他们认为刮‘共产风’终究不是立场问题，不是方向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只是脑子热一点，步子急了一些，不是什么大错误。靠‘共产风’刮起来的大集体的东西，终归是进步的。因此他们并不打算真正贯彻党的政策，不打算清退，不打算赔偿。这些同志在政策思想上还没有觉悟过来，还存在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状态是彻底纠正‘共产风’的大障碍，必须首先加以清除。”(13)

无疑，在1960年批评干部们的“宁左勿右”的思想，是需要勇气的。

11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中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14)

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几乎都没有饭吃了。这样，毛泽东才真正着起急来，才对纠正“共产风”等五风认真起来。本来，这些问题在一年多以前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大都提过，却不仅未予以采纳，反而把他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事隔一年多，在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之后，才又继续进行中断了一年多的政策转变。不过，在1961年这一年里，由于破坏太大、亏产太多，中

国人民注定还得勒紧腰带去奋斗，成千成万的农民，仍在继续默默地沦为饿莩。

1961 年 1 月 7 日，赵紫阳在广东省佛山地区农村整风整社试点总结会上发表讲话，大力纠正“共产风”等错误。他讲道：“要使干部倾听群众的呼声，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五风’，一般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但通过运动的彻底揭露，干部对‘五风’有了感性认识，感受就完全不同。对群众来说，他们身受其害，当然知道‘五风’不好，但要通过运动的揭发，通过干部的检讨，通过赔退，他们才能理解什么是党的政策，共产党究竟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才能分清是非界线。”(15)

作为在一个省参与主管全面工作、尤其是主管农业工作的负责人，赵紫阳对“左”的那一套深恶痛绝。事实是，每当局面稳定，经济好转，“左”的东西就抬头，又大闹一通，一直搞到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会收场，让别人收拾烂摊子。这到底是为什么？看来，那些存在于不少共产主义者头脑中先入为主的、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验，确实起了难以估量的催化作用。试想一下，在一个拥有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中，把某些外国的模式，作为行动纲领，强行加以实施，这会产生多么可怕的后果！

就在这段时间，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了。两国的报刊上常常出现相互抨击的大块理论文章。问题的实质，既有中共反对苏共控制的因素，也有双方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

历史的脚步在迈入 1962 年之后，事情有了重大的转变。由于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稳健务实的领导人的努力，由于党中央内部大多数领导人的倾向，特别是由于严酷无情的现实的教训，毛泽东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一直热心追求的“一大二公”的理想，终于同意对以往的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了扩大工作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厂矿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七千多人。所以，此次会议在历史上又被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书面报告，毛泽东实际上作了一点检查，又一次号召大家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广东省委常务书记的赵紫阳，也参加了这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刘少奇的“书面报告”在肯定成绩之后指出，几年来工作的主要缺点错误是：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中，一个时期混淆两种所有制界限，对集体所有制进行了不适当的过急的变动，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了“共产风”。(16)在这次大会上，还发生了两件对后来的历史进程影响重大的事情。一件事，是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会上作了与众不同的发言。林彪看到毛泽东的主张在会上受到大多数人的批评，认为有机可乘，便居心不良地在会上大讲：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一些”。林彪还说什么，“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17)对于林彪的这番讲话，在大会上是没有人敢于反驳的。当毛泽东在中央内部处境困难的时刻，林彪所表示的这个“坚定”态度，正中了毛泽东的下怀。于是，一个极大的祸根也从此种下了。

另一件事，是彭德怀在七千人大会之前曾向党中央写了申诉自己并不反党的一封信，这当然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如何不会允许彭德怀“翻案”。对此，中央领导人心里也清楚。但主持会议的刘少奇在批评了毛泽东之后为了缓和

自己与毛的关系，同时也为了表明今天自己的观点与彭德怀的观点不同，竟在大会上公开讲，彭德怀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向党的主席反映情况，谈自己的意见，而且大都是事实，这样做，即使有错误，也不是严重的问题，彭的问题的要害是有国际背景。刘言下之意是说，彭德怀投靠了苏联人。这席没有事实根据的话，既没有博得毛泽东的谅解，又激怒了彭德怀及其潜在的同情者，结果，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地位。这是刘少奇的一个重大失策。刘将为自己在七千人大会上批评毛这一行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这次影响深远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赵紫阳于2月3日下午代表广东省委在广东组会议上作了发言。赵紫阳讲道："几年来，我们丢掉了两大优良传统：一是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套正确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了过火斗争；另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这两年不知不觉地丢掉了，现在应该恢复起来。主观主义，过火斗争，一棍子打死，本来是我们党曾经经历过的痛苦的教训，支付了很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教训。这一段由于丢掉了这两大传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必须下决心改，恢复两大优良传统。"(18)

赵紫阳这席话，既可以视之为总结经验教训，也可以视之为对以毛泽东为主要提倡者的"左"倾政策的一种含蓄的批评。

在这个发言中，作为广东省委的常务书记，赵紫阳勇于承担责任，代表省委、甚至代表第一书记陶铸作了检查。他说："几年来的错误，主要来源于农业，我是分工管农业的，应由我负责。因此，这次应该多讲一些。……省委完全同意讨论中许多同志指出的'省委绝不要因为广东的问题不十分严重而自满骄傲起来'的意见。这话说得很好，很值得省委警惕。经验告诉我们，稍有好评而不警惕的地方，一定会翻筋斗。其实，省委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不应该只是与最严重的几个省去比。那不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19)

在简述了几个具体数字之后，赵紫阳接着说道："在省委主要同志中和农业战线的负责同志中，只有我影响他们，不是他们影响我。这几个错误，主要是我的问题。大家知道，陶铸同志和省委在农业问题上是尊重我的意见，总是照我的意见办的。"(20)

看来，对于广东在"大跃进"时期情况比较稳定这一点，是全国公认的。一般地讲，一个地方如果犯有错误，总是由第一把手负主要责任，除非第一把手成心推卸责任。赵紫阳却勇于承担起第一把手的责任，并讲得合情合理。当然，陶也为广东出的问题作了检查。

赵紫阳在历数广东存在的问题之后，讲道："总之，广东的错误是很突出的，还有什么值得自满的地方？同时，还应该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之所以还不是最严重，同我们的具体条件有关。一是应当看到广东的自然条件好，一年两稻，冬天还可种东西。死人少，这是一个好条件。还要看到广东工业任务少，新办工业、土法搞煤、炼铁不多，除了五八年大炼钢铁外，很少人上阵了。这两条有利条件要打进去。本来错误是严重的，但情况还好些，要估计到这两个优越条件在内。广东并没有什么比人家高明的地方，因此不应骄傲。否则，就不能很好吸取教训。"

赵紫阳接着讲道："当然，作为总结经验讲，我们的情况不很严重的原因，同广东在这几年的政治运动中伤害干部终究少一点（包括整风整社）有关。其次，五九年特别是六零年以来省委揭盖子是坚决的，没有拖泥带水。虽然给各地有些压力，但效果是好的。三反，暴露了几个县死人，觉得情况不妙，有些地方问题较多，便下决心揭盖子，同时对几个死人多的县采取了断然的态度。这起了好作用。现在证明，哪里有错就揭、就改、就好。第三，十二条，特别是六十六条贯彻得较坚决，思想也较解放，如家庭副业、开荒、供给制等等，转得快。这当然是同中央同志在广东调查，带领我们学习，帮助很大分不开的。"(21)

赵紫阳的以上说法，是全面、客观的，既没有为自己评功摆好，又讲清了事实。他讲到的中央同志在广东作调查，帮助广东学习，这大约是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那段时间在广东视察的情况。

接着，赵紫阳又专门讲到自己个人的思想情况，他说："在这里有必要讲讲我的精神状态。我的精神状态是从五八年庐山农业书记会议以后开始变化的，到新会农业会议提出少种高产多收时发展到高峰，到五九年四月开会反瞒产发现没有粮食时才回头的。这个时期真有点象'红枪会吃朱砂'那样不清醒。有人说我在庐山会议后变了，我承认这个时期是有些变了。我在五六年以前对农业生产的看法还是失之于'保守'的，对自然灾害有足够的估计，考虑问题比较谨慎，比较扎实。五七年两条道路斗争以后有些变化，但仍感到农业生产不简单。但到八大二次会议听到各地发言，觉得广东落后了，要加劲，反映了自己有点紧张、怕落后的思想。八大二次会议回来后开了大会，组织万人检查，一到韶关地区感到气候不对，干部对完成不了高指标有思想负担，因此写了'从化四日'，提出'保证指标应低些，争取指标可以高些'，并沿途讲群众路线。接着到庐山开会，听到各省早稻大丰收的消息，觉得广东落后得无法比。当时对各地丰收信以为真，报上公布了五个早稻千斤省，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去找原因。"(22)

赵紫阳的这席话，是实事求是的。这席话给历史留下了关于赵紫阳本人在"大跃进"前后思想变化过程的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记录，即为后代留下了这么一个记录：一个熟悉农业、来自农村的党的省委书记，在"大跃进"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影响和逼迫下所产生的接近于真实的想法。的确，在那种声势浩大地将成绩描绘得活龙活现的宣传攻势之下，连平时很慎重、经验很丰富的人也会头脑发热的。当然，这种头脑发热，不同的人，温度是有很大区别的。

2月7日，七千人大会结束，赵紫阳立即同与会的数百名广东干部赶回本省，投人纠正左倾政策，恢复生产的工作中去了。

2月13日，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将原来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普遍改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少30年不变。

5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未参加，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经济的情况，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批评了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另一种是恐右心理，怕承认困难被说成“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提出要以马列主义者的态度正确对待困难。指出现在危险是丧失信心，不敢迎接困难，看见困难不采取办法，慢慢拖下去，拖垮，这是真正的右。(23)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又一次退居二线（第一次退居二线是1959年），并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协助。这样，全国范围的恢复工作便全面展开了。

在这个时期，赵紫阳应抗日老根据地人民的要求，为家乡办了一件好事，即下令从广东调拨了若干车皮的白薯干给河南滑县。众所周知，河南省是三年困难时期情况很严重的省份之一，饿死的人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比较而言，广东由于生产力水平高，自然条件好及政策上失误少等原因，比河南要富裕得多。赵紫阳下令调拨的这批杂粮，真是雪里送炭，救了许多父老乡亲的命。据作者在全国许多地方调查时发现，革命老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有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即坚决听党的话，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这个“优点”，在中央的政策发生偏差或失误时则很可能成为一个“缺点”，从而比其他地区更严重地破坏掉本来就薄弱的生产力，造成自身更大的困难。这类现象在全国大多数的老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真是一个可悲的“优点”。

回到广东的赵紫阳，在1962年春天又遇到了一个相当棘手的复杂问题，即处理广东省毗连香港的农村人口大量逃往香港的事件。

虽然开了七千人大会，转变了政策，但粮食不可能一下子长出来。到1962年春天，最难熬的春荒到了，人们没有吃的，加上听信了“香港可以收留，有活干有饭吃”的传言，从4月下旬开始，尤其是从5月9日以后，群众外逃人数猛增，每天冲出边防线的竟有几千人，最高达到六千人。在广州至深圳的路上，携儿带女，挑着担子，推着木车的农民，在烈日下疲惫不堪地朝南方走着，沿途不时有人病饿而倒。农民们渴望摆脱饥饿，找到一个有饭吃的地方。可悲的是，港英当局决不让这么多农民涌入，冲过去的大部分人，又被抓住送了回来，小部分漏网，或潜入市区，或又落人香港黑社会人贩子之手。此事极大地影响到广东大部分地区，农民思想混乱，人心惶惶，人心思走。总之，情况非常混乱，国际舆论大哗。台湾的国民党也想插手。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周恩来指示，广东省委要将此事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赵紫阳。

体察下情的赵紫阳当然很清楚，造成事件的原因所在，所以他不忍对这些可怜的农民们采取激烈的措施。

5月17日晚，赵紫阳从广州对各地发出电话指示。赵紫阳指出，必须迅速将严重情况扭转过来，否则，政治上、生产上损失太大。赵紫阳提出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看来等人跑到边沿再劝阻比较困难，主要工作应当做在这之前。发生大批逃亡或正在酝酿逃亡的地方可能是比较困难的地方。首先一条，要安排好群众的生活，使群众看到前途。凡生活困难的地区，要派工作组下去解决，粮食主要从当地解决，县和专区都要清仓，粮食不够的上报地区，可以由省里解决。层层扣押粮食的地区，要派工作组下去一级一级地查，为此，召开群众代表会

议也可。要迅速想办法把粮食搞上去，这是最根本的。

“二，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凡已有外流或将要外流的地区，要迅速开展宣传工作。群众确有困难，我们一定要表明态度，要讲建设工作有缺点，加上自然灾害，但是政府一定下决心解决。不能等到人民过不下去往外跑才去解决。个别地区任务重，政府拟适当应急，先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三，要对群众讲清楚，现在跑到香港不是办法。如果跑到香港能好过，政府也赞成；而现在的情况是，去一个香港抓一个，抓不住的，香港也要查户口，吃水、住房、吃粮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因此有的人被打伤，孩子死掉。政府事先要将这个情况讲清楚，不然群众为了逃港什么都卖掉花掉，劳民伤财，家破人亡，非常悲惨，政府要对人民负责。如果真能过去，政府也不反对。香港不让去，那儿放不下多少人，没出路，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是搞好生产，否则，生活会更困难。”(24)

赵紫阳接着讲到对此进行控制的问题。他说：“这些天群众大批跑，与我们放松有关。放松，主要是对群众只说服，不动武，实在要跑的就让他去，这条是对的。有三万人受到教育，也有好处。经过他们宣传，群众已知道香港立不住脚。可以让绝大多数群众知道，不是我们不让去。但是，这种放任不管，浩浩荡荡、络绎不绝的现象，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为了对人民真正负责，必须积极地管。现在已经到了管的时候。但管也要有个办法：一，首先是就地管，由生产队来管。大队、公社，这些基层来管最有效。这是对人民负责，否则，跑出去被送回，政府还要负责，损失更大，问题更大。二，主要是控制交通。广深铁路往南走的，都要有大队以上机关开证明，才能买车票。每个火车站都要派工作组去。三，在铁路、公路线，分别设送人回去的接待站，在沿途劝阻。特别要注意让来往的人们能碰头，有计划地让他们现身说法，这比较有利。边防民警部队，也要积极进行工作，管得严一些，用软办法不让走。对于一定要

走的，也不要动武，只能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劝阻。四，对于从深圳遣送回来的人，要有正确的政策，一律热情欢迎，要表示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绝不能歧视。……对于遣回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要正面教育，认错的不要处罚，批评一下算了，以观后效。这些人跑了一场空，吃了大亏，如处理不好，会绝望，到处流浪，或再往香港跑。……对于香港方面的态度，要注意。它不愿意美国插手的态度，对我有利。对香港要客气些，不要过于苛求、过于刺激，因为这涉及到反对美、蒋的斗争问题，同时国际上还可能刮起一阵风来反华。当然，我们不怕，但还多加注意为好。"(25)

赵紫阳在这个电话指示的最后还说，凡是用于遣送救济的车辆、粮食和款项，由省里实报实销。

从以上言论可以清楚地看出，赵紫阳是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他采取的做法亦是合情合理的。的确，群众逃港也是出于无奈，当时，内地一些省份不也存在着严重的逃荒现象吗？从根本上讲，广东 1962 年群众的逃港风，也是对人民公社灾难的抗议。

经过这么一番工作，广东群众逃港人员在 6 月份大为减少，到了 7 月份，就基本上平息下去了。如果不是赵紫阳采取这种稳健的处理办法，而采取高压措施，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更严重的乱子来呢！

在这前后，赵紫阳为了解决群众和地方的困难，批准恢复了广东毗连港澳地区的小额对外贸易，放宽了边防线以外若干地方群众赴港探亲的规定，并另开口岸，帮助在港澳有亲友、有生活来源的群众出境，以解决出口拥挤的问题。(26)

六十年代初期，赵紫阳还在广东农村许多地区主持试点，推广了一种名为"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农业生产形式。这是值得专门介绍一下的。

"联系产量责任制"最早在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试点，其办法，说来简单明了。这就是把名义上属于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土地分块

固定给各个农户，由各户在这块土地上播种、施肥、精心管理，收获后，按规定上交给生产队一定数量的粮食，多产的、剩余部分归农户所有。这种形式，与今天使中国农村一举摆脱长期徘徊不前困境的"包产到户"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二者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是字面上的区别。"包产到户"听起来似乎更接近"单干"这个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概念。而"产量责任制"在当时听起来不那么刺耳。赵紫阳能想出这个名称，可算是用心良苦了。在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就曾主张搞"包产到户"，不消说，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幸，毛泽东判定邓子恢在政治斗争中没有"入伙"，只是"单干"，因而对他高抬贵手了。

赵紫阳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亦承认："我当时推行'产量责任制'的出发点，就是在对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发生怀疑的情况下，为了调动个体生产的积极性而搞的。"(27)

本来，"联系产量责任制"也是群众的一种创造。1960 年，广东清远县洲心公社凤凰大队的负责人，根据农民们的要求，把队里的低产田一块块地定出产量标准，分给社员一家一户去种，当作口粮分配，以解决口粮不足的问题。当时取名曰"就地分粮"。这个情况，公社党委和县委向省委汇报，在省委的同意下，先搞出了一个"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的责任制，于 1961 年下半年在清远县推广，效果十分显著，获得农民的拥护。

赵紫阳十分重视群众和基层干部的这一创造，于 1962 年 7 月亲自率领工作组赴洲心公社调查研究，进一步加以总结提高，并向全省推广。(28)

赵紫阳在作报告时称赞"产量责任制是经营管理的一大革命"，"解决了合作化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并着手将这种形式推广到林业、渔业、手工业中去。赵紫阳坚持抓了这个典型经验，得到陶铸的支持。陶又将这一典型介绍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当时，刘少奇相当重视，曾指示陶铸和赵紫阳，以党中央的名义起草

文件，准备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向全国推广。后因形势有变未能如愿。(29)

尽管这样，在陶铸和赵紫阳顶着压力、冒着风险的情况下，"联系产量责任制"仍然在广东省得到推广，从而救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命。

1962 年 8 月 22 日，在赵紫阳主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批发了《关于彻底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内称："实行包产到队，责任到组，田间管理农活包到人的管理制度，把生产责任制贯彻到底。……为了使社员对农活质量负责，因此，在作业组内，还应当进一步把生产责任固定到社员个人。凡是适合于个人(或户)操作管理的田间管理农活，……可以采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或户)，由社员个人(或户)连续操作，管理到底的办法，一次包到底。"(30)

《意见》还指出："为了加强作业组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责任制，保证农活质量，因此，必须建立一定的奖罚制度。"(31)

这样，"产量责任制"的主要框架便建立起来了。这套办法有效地克服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平均主义，使广东的农业迅速恢复起来。赵紫阳在广东主持制定的"产量责任制"，与当时在安徽广泛实行过的"包产到户"，在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历史上起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的确，那种导致千万人饿死的高度集权的集体农业体制真是走到尽头了。如果中国农业从那时起就走上"产量责任制"或"包产到户"的道路，那么，今天中国农业的面貌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可惜，历史没有给中国人民这种机遇，他们注定还要经受种种没完没了的灾难。

1962 年 9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出席并主持了这次全会。

会议对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等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

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全会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全会还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等不实之词，而于6月16日给党中央写的长达8万字的申诉信，当作“翻案风”进行批判。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对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周、邓等人政治上的“反击”。在这次会议上，深得毛泽东器重的康生进入了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则提出，要把做好当前的经济调查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要因抓阶级斗争干扰了经济工作。毛泽东表面上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个意见。(32)

1962年冬天，赵紫阳到广东紫金县视察农村，发现许多田没有进行对来年生产至关重要的冬犁(冬天翻地)，便质问县委，得到的回答是：“现在集体经济已经垮了，个人犁田，政策又不允许，所以，没有犁。”赵紫阳当时很着急，怕影响生产太大，同时也料到，依靠所谓集体经济，是犁不成地的，便讲出了后来十分闻名的惊人之语：“单干也是干，比不干好。”(33)为了这句“名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不计其数的批判。

就在1962年年初，赵紫阳由陶铸提名，经中共中央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批准，就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本来，广东省委只设一名第一书记，未设第二书记，另有若干名书记。赵紫阳是省委书记中分工协助第一书记工作的常务书记。各省、市和自治区的中国共产党委员会领导班子的名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例。有的省区设一名书记、若干名副书记；有的省区设一名第一书记、若干名书记；还有的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及书记；也有设第一书记和副书记的。总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情况而异。

历史的车轮辗进1964年之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同时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国民经济全面好转，工业和农业生产上升，比较快地摆脱了困境；二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全面“左”倾，阶级斗争更被人

为地突出到压倒一切的地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增长。

1964 年 5 月，在林彪的“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下，《毛主席语录》编辑出版。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借以猎取更高权力地位蓄谋已久。自从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以后甚至还提出“要百分之九十九地”)学习毛泽东著作，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作法，邓小平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从此与美、苏、英、法等核大国一同跻身于世界的“核俱乐部”。事有巧合，就在同一天，长期成为中共中央抨击目标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被撵下台。这两件事凑在一起，大大地振奋了中国的人心。全国人民奔走相告，欢呼跳跃，有人甚至认为，赫鲁晓夫是被中国的原子弹震下台的。

然而，这个时期中共的各级领导所面临的任务却是艰苦的、棘手的。广东的赵紫阳又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中央号召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去了。

从 1964 年 9 月 9 日起，赵紫阳来到自己抓的“点”——佛山专区顺德县伦教公社荔村大队，并在这里办公，随后又到库车大队蹲点。在乡下，赵紫阳住到贫下中农家中，与老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与自己的房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交上了朋友。从房东那里，他了解到村里的不少实际情况。为此，他还很认真地将自己与房东夫妇的谈话记录下来、打印出来，供省委领导人传阅。(34)

在这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于 8 月 21 日印发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这

个经验总结，就是后来很闻名的“桃园经验”（那个大队名叫桃园）。(35)

在1965年1月召开的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公开爆发了。本来，会议是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主持的。按当时的惯例，许多会议毛泽东是无需参加的，邓小平也曾善意地劝毛泽东不必参加这次会议。但毛泽东坚持要参加，并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强调说，“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刘少奇插话说：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交叉，有党内矛盾和党外矛盾的交叉，因此，还是讲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毛泽东听了刘的话，很是生气，第二天开会又讲了话。他气愤地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人不让我讲话（指刘少奇）。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主要是刘少奇）的矛盾就激化和公开化了。后来，刘少奇在党中央政治局的生活会上被迫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主席不够尊重。但毛泽东反驳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36)据美国作家斯诺称：毛泽东告诉他，1965年1月，当刘少奇反对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概念时，毛在内心中就作出了刘必须下台的决定。(37)

人们可以肯定，此时正在广东搞“四清”的赵紫阳，是不会想到刘少奇与毛泽东争论“四清”这个提法将对于自己产生什么影响的。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赵紫阳与刘少奇、邓小平一样，都被戴上了“党内走资派”的帽子。所不同的是，刘少奇是“党内头号走资派”，邓小平是“党内二号走资派”，而赵紫阳则是“党内走资派兼刘、邓、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所以被戴上这顶“帽子”，是因为1965年初他被中共中央正式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前此他只是中南局的委员）。陶铸不再

兼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专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此时的赵紫阳，年方四十六岁，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第一书记这个位置上，赵紫阳进进退退地度过了十五个春秋，直到1980年。

赵紫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伊始，便于1965年3月提出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振奋人心的口号。赵紫阳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定为水稻亩产超千斤、每人全年集体分配超百元，每个生产队的家当超两万元，加上在农村实行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机械化。赵紫阳还批准进口并翻译了一批介绍美国、法国等国农场管理的书籍。一时间，广东全省人心大振。赵紫阳认为，这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伟计划，可以“使所有的人看到前途，有奔头，鼓舞信心和斗志，确立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心”。赵紫阳号召：“今后整个农村工作要以此为动力，为总目标。”(38)

然而，可惜的是，当时中国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已不允许赵紫阳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左”的灾难性的病根，已在中国庞大的躯体内蔓延开了。一切迹象表明，此时的中国，已是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大大加强了。

与此同时，美军直接在越南参加地面战斗，越南战争升级，这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两广地区，构成了威胁。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内称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

对此，赵紫阳于1965年11月16日在广东省委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上讲了准备打仗的问题。他说：“怎样准备？是否现在天天就准备打仗，什么事都不干了？当然不能这样做。所谓战争准备，就是通过各方面工作去准备，包括人的工作、思想、建设等各方面。但就广东省来讲，战争准备的最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是人民战场的准备问题。”(39)

肯定地，赵紫阳在讲到准备打仗时，会联想到自己在八年抗日和三年打国民党时期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的经验。

然而，毛泽东虽然大讲准备打仗，实际上，他当时更关心国内和党内意识形态的斗争。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1960年底写成，1961年1月在北京首次上演的。编写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来源于毛泽东在1959年4月党中央会议期间的讲话，他为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讲了海瑞的故事，提出要学习海瑞"直言敢谏"的精神。1959年6月，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1960年底受人之托写成《海瑞》(后改名为《海瑞罢官》剧本)，翌年初开始演出。这篇文章是1965年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共同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毛泽东在不通知中央政治局的情况下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响应者寥寥，反对者却发表了大量意见。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操纵下，《文汇报》把姚文元的"大辩论"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序幕和导火线。(40)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及其党羽罗织罪名，诬陷总参谋长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结果，罗立即被打倒。(41)林彪进一步取得了军事大权。这也是毛泽东用"文化大革命"对付刘少奇等人一个重要环节。

1966年是风暴骤至的一年。2月3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康生、周扬、吴冷西为组员)会议。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于2月7日在北京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并取得同意，2月8日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2月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根据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

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不久就否定和批判了《二月提纲》。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指责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42)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0日，江青以受林彪委托的名义，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之后，由陈伯达、张春桥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

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在文艺工作方面的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很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并且在《纪要》中，专设一部分吹捧江青的话，江青则说，要请林彪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企图利用军队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肆活动的开始。(43)

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提议增加的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会议是按照他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由刘少奇主持进行的。会议的内容

主要有：1. 揭发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2. 通过了在会前由康生、陈伯达等人负责起草，经毛泽东几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通知》首先宣布：中央决定撤消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其次，《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批判。《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发言，作了自我批评。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44)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发动阶段，标志着"左"倾方针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由于毛泽东已决定搞掉刘少奇，一时又不愿或不便将大权全部交给"中央文革小组"，所以决定调陶铸来北京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深感此时进京任职不好工作。他与赵紫阳商量。赵紫阳忠告陶铸，这工作对他不合适。但是，陶铸不能不同意就任新职，并于6月1日赴京。也许，陶铸考虑到，毛泽东已决定，自己不能不听，那时已很时兴"听毛主席的话"这样的格言了。也有可能，陶铸对北京政治局势的险恶缺乏足够的认识。更可能的是，陶铸对于毛泽东对自己的重用感到振奋。总之，他没有听从赵紫阳的劝告，赴京去了。(45)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赵紫阳对陶铸的劝告是有预见性的。可惜，陶铸没能避开险恶的环境，以致最终酿成个人的悲剧。

诚然，在"文化大革命"这场中华民族的大悲剧中，几乎人人在劫难逃，但是陶铸付出的代价毕竟是太惨痛了。

陶铸赴京后，中南局的日常工作由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长陈

郁主持。陈郁是党内元老，并不多管广东党内的事情。这样，赵紫阳就必须全面承担起广东省委的担子。前此，当陶铸尚在广州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之时，赵紫阳还不能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广东第一把手。而此时，他完完全全地成为广东的第一把手了。不过，这一点并没有给赵紫阳增加多少喜悦之感。不仅如此，还反而使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中受到更凶猛的冲击。

(1) 《新中国纪事》第273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版。

(2) 赵紫阳：“在广东省委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2月19日。

(3) 同上。

(4) 同(2)。

(5) 同(2)。

(6) 《新中国纪事》第281页。

(7) 同上、第284页。

(8) 同(1)第287页。

(9) 同(1)第288页。

(10) 赵紫阳：“在广东省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1月11日。

(11) 同上。

(12) 同(10)。

(13) 同(10)。

(14) 同(1)第289页。

(15) 赵紫阳：“在广东省佛山地区农村整社试点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7日。

(16) 同(1)第312页。

(17)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19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天津版。

(18) 赵紫阳：“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广东组会议上代表广东省委作的发言”，1962年2月3日。

(19) 同上。

(20) 同(18)。

(21) 同(18)。

(22) 同(18)。

(23) 同(1)第317——318页。

(24) 赵紫阳:"关于大批群众外逃香港问题给各地的电话指示"。1962年5月17日。

(25) 同上。

(26) 1968年2月3日赵紫阳:"我的检查"。

(27) 赵紫阳1969年10月20日对"联系产量责任制"作的第二次检查。

(28) 《南方日报》记者、通讯员联合调查组:"陶铸、赵紫阳合伙贩卖的黑货见鬼去吧!"载《南方日报》(原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1968年4月12日。

(29) 任志左:"赵紫阳是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载《南方日报》1967年12月18日。

(30) 中共广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彻底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1962年8月22日。

(31) 同上。

(32) 同(1)第323—324页。

(33) 赵紫阳1969年6月2日对"联系产量责任制"作的第一次检查。

(34) "赵紫阳致陶铸并广东省委各书记、常委的信,"1964年10月28日。

(35)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文件》(1964年)80号,1964年8月21日印。

(36)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第6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海版。

(37)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6—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上海版。

(38) 齐向阳:"评赵紫阳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载《南方日报》1968年1月7日。

(39) 赵紫阳:"在广东省委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1月16日。

(40) 《文汇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1965年11月10日。

(41) 同(1)第382页。

(42) 同(1)第384—385页。

(43) 同(1)第388页。

(44) 同(1)第398—399页。

(45) 曾志(陶铸夫人):"如烟往事难忘却",载《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67年纪实》第三卷第1页。华夏出版社1986年北京版。

第九章　“文革”冲击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华民族来说乃是一场浩劫。这是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同的一种看法。对于我们这位传记人物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个人的事业和生活的一场冲击和劫难。

“文化大革命”正式始于1966年5月16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那一天。

《五·一六通知》宣布：撤消原政治局委员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实际上是隶属于毛泽东个人。

5月18日上午，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就是不久之后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讲到的那篇令他“很不安”的讲话。

林彪这篇讲话的中心点，是所谓“防止反革命政变”。他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1)

林彪大讲了一通古今中外的政变，什么臣弑君、父子残杀、兄弟相诛，等等。林彪的这篇讲话，使毛泽东有所警惕。但是，毛泽东为了借助林彪的力量打倒刘少奇，仍需重用林彪。

林彪以其惯用的手法，常贬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吹捧毛泽东。他说：“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

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象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象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2)

林彪针对毛泽东惧怕中国将来出现类似苏联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揭露其暴行的心理，大讲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3)

尽管毛泽东当时对林彪已有了戒心，但他仍于当年 9 月 22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党批转了这个讲话。中共中央的批示称："林彪同志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林彪同志这个讲话，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文件。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拿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4)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策划下，由当时在北大的"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授意，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党

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并说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5)

6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扫除一切害人虫"。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6)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7)

这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便在全中国熊熊燃烧起来。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虽然"落后"于北京的形势，但也以迅猛异常之势展开。各大专院校，以中山大学为主，学生揪斗党政干部、教授、老讲师，"挖"阶级敌人等，一时间闹得热火朝天。教育、艺术单位，一下子掀起了"革命"的轩然大波，几十万中学生也开始"造反"。

自从陶铸于6月1日匆匆赶赴北京任新职之后，广东地区的工作担子，就名副其实地全部压到赵紫阳这个省委第一书记肩上了。

1966年5月初，广东省委知悉中共中央已认定当前的斗争不是学术争论，而是政治革命，于是就匆匆忙忙撤消了省委原先设立的"学术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了由省委书记区梦觉为组长的"中共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革"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委宣传部，原学术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合并于"文革"小组办公室。(8)区梦觉是党龄很长的一位"大姐"。她是当时仅次于赵紫阳的广东"第二号人物"。

1966年6月9日，在赵紫阳的主持下，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

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内称：“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必须充分理解这场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充分估计这场大革命的形势，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十分认真、十分得力地去领导好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革命，把这场大革命推向广泛和深入发展。

关于开展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央、中南局都已有指示，各级党委应该坚决贯彻执行。”(9)

自然，此时广东省委还不知道，毛泽东已决心抛开党中央大多数领导成员，只通过“中央文革”直接发动广大群众去造各级党委的“反”，因而省委一级的党组织，将继学校党委之后受到严重的冲击。

广东省委的指示明确要求：“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把政策交给群众，斗争必须坚持文斗、严禁动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口诛笔伐，但不得动手。在策略上，要抓住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等人物，打击面不要过宽。不要搞变相肉刑和侮辱人格的粗暴做法。严禁打人。不要在斗争会上去追问有关男女关系等一些容易使运动引向歧途的东西。一般应采取小组会活动，大会批判要有领导进行，重点批判对象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10)

这些规定，无疑是必要的和及时的，因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动力，在大哄大嗡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过火行为和庸俗行为。

不过，堂堂的中共广东省委，此时对运动的前途已心中无底，不知道北京的党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到底想干什么，于是，只好号召人们深入学习毛泽东著作，这当然不至于犯错误，但又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呢？“指示”在结尾时这么写道：“文化大革命从始到终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

东思想作为运动的最高指示。运动的每个步骤，都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摆在首位，绝不能离开毛主席著作来搞运动。可根据每一段的具体内容，选学毛主席有关的著作和语录，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当前运动紧密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统帅运动，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深、更透、取得伟大的胜利。

以上指示，请即贯彻执行。如中央、中南局有新的指示，应按中央、中南局指示为准。"(11)

看来广东省委心中无数的状况，在"指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指示"一方面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一方面又讲，如中央、中南局有新的指示，即以新指示为准。此时的中南局，从陶铸、王任重调北京之后，由陈郁代理第一书记。

6月初，毛泽东故意停留在浙江，不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面对着一片混乱局面，举棋不定，无所适从，于是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报告，并请求毛泽东尽快返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表示，暂时不拟返京，同时，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2)

为了坚持党的领导，使运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协助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时，制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举行示威"，"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此后50多天里，北京和各地都采用了派工作组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13)

6月20日，刘少奇将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批发全国。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避开工作组，揪斗干部、群众40多人，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打人，侮辱妇女。工作组发现此事后，对群众进行了教育，明确指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是有

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北大工作组将此事写成北大文革简报第9号。刘少奇在转发这个简报时指出，"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指示"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项文件发出后，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4)

广东与全国各地一样，于6月初由省委向各大专院校、文化艺术部门等运动激烈的单位派出工作组或工作队。由于派遣工作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的(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所以，工作组实际上是代表上级党组织的。然而，被报纸、电台的激情鼓动起来的不少青年学生很快便不满意工作组及上级党委对他们"造反"行为的限制，并在中央文革的鼓动下朝工作组开火了。

这类情况，在广东也每每发生并造成很大的混乱。各校的党委已全部瘫痪，校长、书记、系主任、教授纷纷挨斗。学生中间小组织林立，互相争斗。工作组则尽力维持秩序。有的学生辗转传抄所谓"北京来信"，其中介绍北京的运动如何轰轰烈烈。于是，广州的学生更认为本单位受压制，造反不痛快。

为了稳定广东、特别是广州的局面，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于6月26日在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赵紫阳对运动的形势作了分析。他讲道："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单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所谓运动被动状态，就是说，这个运动我们还未真正领导起来，运动的领导权还未真正抓到手，学生还不太相信我们；或者有些是工作队已初步取得了领导权，但很不巩固，还时刻有脱离领导的危险。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还差。我们跟不上去，他们就会离开工作队的领导。"(15)

赵紫阳接着讲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今天一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四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16)

赵紫阳在这里直言不讳地指出，报纸社论直接同青年学生见面，学生群起响应，领导无所适从，行动缓慢，处于被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在于党中央(即毛泽东)对于这次运动，不像以往的历次运动那样，通过自己的各级组织来贯彻中央的指示，而是采取了"自上而下，抛开中间"的做法。而这个运动的重点，正是要"整党内的走资派"。

不过，赵紫阳对于领导群众运动毕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被陶铸誉为"三大专家"，即土改专家、群众运动专家和农业专家。

赵紫阳讲到学生"造反"的问题时指出："对学生要有个正确的估计。绝大多数学生要求革命，热情很高，总的革命方向是对的。党中央、毛主席一号召，他们就干起来，闻风而动，把高帽子戴在资产阶级'权威'头上，青年人有一股子劲头，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他们主观上认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他就反，动不动他就怀疑。现在学生对我们是要观察一下，我们要经得起。学生多数人热情高，但经验不足，运动怎样搞，不清楚，有盲目性。所以要我

们去领导。学生要革命，他们要求有一个正确的领导。不少人心里很紧张，很敏感。他们怕搞不好，当了保皇派；怕搞过头了，又是反党。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去领导他们，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要求有一个正确的领导去领导他们闹革命。只要我们态度正确，坚决支持他们革命，对他们的不正确的东西，给他们讲清楚，他们多数人是会接受我们领导的。"(17)

本来，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赵紫阳在当时难以理解的极为反常的现象的话，青年学生是会接受省委领导的。不管怎么讲，赵紫阳对青生学生状况的分析还是合乎当时的实际的。每一个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对当时青年学生在"革命"大道理激励下爆发出来的冲闯劲和盲目性留下深刻的印象。这股力量，如果是用于建设事业，自然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而一旦用于破坏性的所谓"大革命"，则会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

赵紫阳接着讲道："对这[illegible]爆[illegible]

了验证。许许多多虔诚地投身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青年人，也或迟或早地接受了这种"反面教训"，直到1976年"四·五"事件之时，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五的投身于这场大动乱的青年人，都对之深恶痛绝了。当然，那已经是在漫长的十年之后，在国家、民族承受了难以估算的巨大损失之后了。

赵紫阳也讲到广东教育界的运动情况。他说："学校党委的领导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问题。现在，院校党委事实上处于一个被审查地位。既要发动群众引火烧身，检查错误，又要使学生信任自己，领导运动，这确实有问题。所以说，加强领导，主要是加强工作队的领导。这不是说党委都有大问题。因为根据农村四清的经验，既要领导群众革命，又要自己革命；既要领导运动，又要群众揭自己，那是有实际问题的。因此，现在主要是加强工作队的领导。前一段，学校本身没有主动领导，限制、压制群众，脱离了群众；后一段工作队下去后，有的又尾巴主义，附和群众中一部分人的错误意见，造成了一些混乱。这主要是没有经验。所以工作队讲话要留有余地，要向群众表明：第一是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以及省委的指示，一定要把革命搞彻底；第二是在运动中，工作队也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工作队有决心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表明我们要在运动中边革命，边学习，边工作，边整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走群众路线，注意听取群众意见，对正确意见要采纳，对错误意见要解释说服。"(19)

赵紫阳对工作队队长们讲的这番话，是比较中肯、比较全面、比较高明的。当时，在北京及全国的许多地方，的确存在着工作组自恃代表上级党委，甚至自譬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因而打击不听话或给自己提意见的学生的现象。有的工作组成员，还抱着1957年"反右派"的观念来搞这次运动，他们一碰上风吹草动，就抓"右派"、划"反动学生"。这样，部分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紧张、越压越激化。6月下旬，当工作队在高校的存在还未受到什

么威胁之时，赵紫阳要求工作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到是棋高一招的。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按当时的惯例，赵紫阳必得专门讲一下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问题，否则，就很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横祸。

赵紫阳讲道：“最重要最根本的是，这个运动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学好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最高指示，统帅整个运动，这是保证运动健康发展和保证取得彻底胜利的根本。不要工作一忙了，就把这个根本丢掉了。要认真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必要时，休整一下，集中学习一下。”(20)

从上面这个讲话的引文中，读者可以看到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许多政策思想。作为权力很大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一方面对这场“大革命”不理解、不热心，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力去领导它，使它朝着破坏性较小的方向发展。而北京的中央级大报又几乎天天以党中央、毛主席的名义向全国的青年学生发出“造反”、“革命”的号召。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省委第一书记真是太难了。可以说，在汹涌而来的狂潮中，在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笼罩下，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精心挑动下，赵紫阳在广东所作的努力，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北京所作的努力一样，都是无补于大局的。

其后，赵紫阳于7月7日和7月21日，又在省委对干部和工作队员作了两次其内容与这个报告大同小异的报告。

果然，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随着毛泽东于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而进一步逆转了。

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获悉毛泽东返回北京，连忙于当日晚间驱车前往汇报运动情况。但毛泽东正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根本不理睬刘少奇。7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刘少奇时严肃指出，派工作组去大学是错误的。毛泽东还说，自己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学生运动受到镇压，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前一段的运动犯了方向路线

性的错误，必须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21)

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话没有做到"一句顶一万句"。他在工作组的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工作组有三类：一类是同左派一起斗争"牛鬼蛇神"的；二类是当官作老爷，脱离群众的；三类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刘少奇争辩说，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这么猛烈，共产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22)这样，在工作组问题上，刘少奇实际上选择了一条与毛泽东对抗的方针。

于是，毛泽东便放手让"中央文革小组"去"发动群众"。中央文革选中了北京大学这个在全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的学校。7月22日和23日，陈伯达、江青等人以调查情况为名，赴北京大学活动，发动北大师生就"六·一八事件"辩论。7月24日，毛泽东在党中央的会议上说，"中央好多部，没有作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同时，毛泽东更加明确表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驱逐之"。

这样，7月25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赴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对工作组推行的"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康生在会上强调："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23)

次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时又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必须撤消。当晚"中央文革"们再赴北京大学，召开第二次万人辩论大会。会上，"中央文革"们把同工作组的斗争，说成是阶级斗争，最后宣布撤消北大的工作组。(24)

7月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传达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并宣布撤消所有工作组。毛泽东在

大会接近结束时来到会场接见与会人员，于是，会场上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毛主席万岁”声。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被迫在工作组问题上作了检查。刘少奇承认自己不知道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是莫明其妙地犯错误。(25)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寄去《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8月1日，毛泽东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表示热烈的支持”。消息传出之后，红卫兵运动如脱缰之马，一发而不可收，迅速遍及全国。

8月1日到12日，为了进一步扫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会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中央文革成员，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之外，居然还有“首都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会议，真是罕见。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专程赶来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不是中央委员，他在会上没有表决权。

会议第一天，刘少奇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毛泽东插话，严厉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说工作组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天，全会还印发了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第二、第三天的小组会上，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汇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问题，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仍然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等等。(26)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内。他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的大字报发表

后，会议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十六条》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的通过，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8月12日，全会通过了会议公报和进行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补选和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被名列第二位(以后不久，被称为林副主席)，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主席和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27)

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权力，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中共中央对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完全失去了抵制和纠正的能力。

这样，赵紫阳已清楚地意识到，运动的狂涛即将冲击而来。为了争取主动，赵紫阳于会议期间通过电话口述了一份"大字报"，由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于8月8日贴到省委大院内，表示"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贴自己的大字报，揭露、批判自己的错误。

次日，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也联名写出一张内容大体相同的大字报，以表示欢迎群众揭发、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错误。这也是许多地方或部门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采取的共同性作法。

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的

红卫兵、学生和教师。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八次共接见红卫兵、学生、教师1100多万。林彪在8月18日、31日和9月15日的接见大会上极力煽动"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28)

8月22日至29日，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20日，首都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发出通令、倡议书。将原有地名、店名、校名改为"反修路"、"红卫商店"、"反帝医院"、"井冈山战校"一类新名称。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干预群众的衣着、发型等等。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此后，全国各地红卫兵立即效法，并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违法行动，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29)

赵紫阳于8月16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飞返广州。由于广州的运动毕竟比北京慢一拍，所以广州的局面还未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北京的红卫兵南下的人数还寥寥无几，共产党的省委、市委也还能继续开展一些工作。这期间，由于长期主持广东工作的陶铸在中央的地位有了明显的上升，其名次紧排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所以广州省委所受的冲击和压力相对来说要小得多。

8月17日，即返回广州的第二天，赵紫阳在省委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传达会议精神，仍表示要尽力领导运动。

8月20日至23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学习讨论中央文件的县(市)委书记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广东的县委书记们当然必须表态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中央的人事变动。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的干部们差不多都提到陶铸的上升。比如，佛山地区8月22日的小

组讨论的简报，是这么记载的："同志们还热烈拥护陶铸同志参加中央最高领导。大家说：陶铸同志多年来领导广东和中南的工作，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很高，执行主席的指示十分坚决，在困难的时期，最坚决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保卫三面红旗；大家还说：陶铸同志有彻底革命精神，干劲大，热爱新生事物。这都是我们最熟悉、最感到亲切的。"(30)

政法部门8月22日的小组讨论简报，也有如下记载："对于陶铸同志排第四位的问题，大家认为也是由于陶铸同志能一贯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以工作做得出色。……这都说明陶铸同志一贯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31)汕头地区的小组讨论简报则讲得更明显："……大家对陶铸同志参加中央常委感到很兴奋。许多同志说陶铸同志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高，对主席思想跟得紧，对困难顶得住，干劲大。认为他管党的思想工作，很放心。"(32)

广东干部对陶铸参加中央工作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不仅意味着广东以往的工作成绩得到肯定，而且意味着大批广东干部都是"红线上的干部"或隶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干部。不消说，这一点对于一直受到陶铸重用的赵紫阳也完全适用。不过，好景不长。广东省的干部、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不久就得在陶铸问题上吃苦头了。当然，这决不能怪陶铸。看来，这是毛泽东有意安排的。而"中央文革"们，更是对陶铸的上升恨得咬牙切齿。关于陶铸与"中央文革"们的矛盾发展，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在6、7月，便有外地学生到北京串联。8月，到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这期间，大批北京学生也到全国各地串联、"点火"、建立"联

络站"，冲击机关，揪斗干部。通知发出后，大串联在全国出现高潮。(33)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运动来得猛，只有5个月，难怪同志们不那么通、有抵触，是可以理解的。他提出对待所谓"乱"的方针，他主张乱它几个月，大字报要上街，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林彪于10月25日作了煽动性讲话，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周恩来对会议如何传达作了具体部署，对运动中若干具体问题作了原则性的答复。关于大串联影响火车运行计划问题，他提出全部徒步，搞军事化的全程徒步；他要求工矿企业、机关团体不搞红卫兵；他提出红卫兵不能对干部搞"罢官"，不能抓人、抄家，不要打人、体罚等。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机关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被审查、挨批斗。很多知识分子、劳动模范被当作"反动权威"、"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冲击，甚至抄家、坐牢房。党团员被迫停止了一切组织活动，社会秩序更加混乱。(34)

广东的局面，也同全国一样，一天天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8月下旬，红卫兵冲上广州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其中最极端之举，是8月28日近千名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捣毁黄花岗烈士墓碑顶端的"自由神"。"革命小将"在开完批判会后，用铁锤砸碎了"自由神"，他们手持"自由神"之头发表宣言，声称"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今天决不能再毒害人民。(35)

9月4日，中共广东省委为了表示对运动的重视，作出决定，撤消省委5月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由省委常委直接领导文化大革命。(36)

但是，此举根本无法扭转日益混乱的局势。从北京南下的大学生，横行广州，到处煽风点火，惟恐南国天下不乱。

8 月 31 日，北京清华大学南下的两名大学生给中共广东省委贴出一张与毛泽东的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该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其矛头直对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曾讲过，广东省委派出的工作队的问题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该大字报则说，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相互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赵紫阳曾提出，选举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要由各派代表组成。大字报作者则认为，委员会一定要由坚一定一的一革一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各派都参加的议会制。最一后，大一字一报一的作者断定，中共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37)

9 月 15 日，中共广东省委面对蜂拥南下的红卫兵，只得发出一个"关于进一步做好接待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通知"，内称："在当前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都和各省、市大批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怀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高昂的革命斗志，陆续来到广州和省内各个中等城市，进行革命串联，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交流革命经验，这是对广州和广东全省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持，这对于推动我省和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尤其起了还将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

在这些南下的"革命小将"中，北京的红卫兵是骄子，其中少数还与"中央文革"有种种联系，省委更是不敢怠慢的。对此，《通知》专门写道："首都是革命的中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首都和全国其他各省、市都有着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许多宝贵经验。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来到之后，党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各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主动向他们介绍当地和本校运动的情况，听取他们对省委、市委和本单位工作上的批评和意见，虚心学习他们的好经验，并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的好经验应用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38)

同一天(9 月 15 日),一名广东省委的普通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赵紫阳出身地主,父亲于土改时被处死,要求将此事摘清楚。此举不啻在赵紫阳早已愈合的伤口上又扎上一刀。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揭发”是多么严酷狠毒!大约同时,赵紫阳的在河南老家的老母亲也被以“地主婆”的罪名受到“斗争”。呜呼,一位把自己唯一的儿子交给共产党的老太太,在“文革”中竟无法避免如此无情的冲击,真令人寒心。要知道,刘老太太当时已七旬高龄了。其实,赵紫阳的父亲赵廷宾,是在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发病去世的,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

10 月 1 日国庆节,省委按惯例邀请广州著名艺术家红线女上观礼台,此事又被红卫兵抓住,认为是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包庇反动艺人。

10 月初,北京来的“首都红卫兵”在广州印发两张传单,一是“广东省委机关运动向何处去!”,一是所谓“特急倡议”,其主要内容是指责广东省委把运动引入歧途,造成群众斗群众,认为省委“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实际上是文而不斗,保护了右派,打击了左派。传单认为,广东省委决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很大,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等等。(39)

10 月 19 日,华南工学院的红卫兵又递交“赵紫阳亲收”的信件,题为“强烈质问省委”,其中写道:“省委负责同志:我们觉得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你们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前头,而是落后于群众运动。……目前群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发动下起来了。省委当然不敢出来阻碍了,但是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40)

九月份,外地赴穗红卫兵以及广州的部分红卫兵竟截获了赵紫阳 6 月 26 日、7 月 7 日和 7 月 21 日三次讲话的部分内容,指责这些讲话“镇压了群众运动”,并为此事纠缠不休,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另外，一些外地赴广州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红卫兵），在各招待所中大吵大闹，闹伙食、闹待遇，同时向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中南局等单位强行借款，纠缠不休，借了钱也不还，甚至随便抄家，对现金、金银、衣物等抄走而不给收据，不登记，对方不服即大打出手，有的红卫兵离广州前最后还抄一次家，抄得财物随即带走。（41）总之，局面一片混乱。

大串联造成大动乱。由于交通工具及火车车次有限，许多学生滞留在广州，北上不成便日夜赴省委吵闹。许多学生本来响应北京发出的“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号召，步行串联，但脚走肿了，又要求乘车。11月16日晨，一列火车刚进入广州站，一万多名学生便拥挤抢车，当场踩死一名女生，受伤多人。于是，学生们又要求省委采取措施，以保证学生安全。（42）

随之而来的怪事层出不穷。例如，某传单声称：北京已更名为东方红城；天安门广场更名为东方红广场，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凡是“红五类”（指出身于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学生）都可以加入红卫兵，凡是红卫兵都可以赴“东方红城”见毛主席。（43）

越南侨生也要求参加大串联，步行长征。转业军人、青年工人和农民也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广州海运学校的学生建议，成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主义第四国际”，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些学生只知道第三国际，完全不知道世界上早就有一个托洛茨基派的第四国际了。

11月4日，赵紫阳被迫代表广东省委作检讨。检讨不得不按老一套公式承认省委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省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44）

但赵紫阳也辩解道：省委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

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

当然，赵紫阳还得婉转地作如下解释：

“《十六条》公布以后，全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汹涌澎湃，出现了许多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省委对于革命大串联，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等革命行动，是表示欢迎和支持的，对于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衷心感到高兴的。但是，由于省委对这些伟大创举和新生事物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思想准备不足，感到有点突然，对有些事情很不理解，因此不是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同革命同学一道，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是被动应付，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使得省委的领导，仍然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45)

赵紫阳代表广东省委检讨后(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党委书记都作了检讨，除非已被打倒，失去检讨的“资格”)，广州和外地来的一部分红卫兵并不满意，认为检讨是假的，是阴谋，是为了蒙蔽群众，等等。

在这期间，赵紫阳与北京的陶铸之间常常有电话联系。赵仍主动向陶请示汇报。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陶铸的尊敬，另一方面也想及时了解一些北京的运动情况。另外，陶铸刚刚离穗赴京，广东有些重大问题的处理还得征求陶的意见，有的问题，很可能是陶铸经手办过的，如果重新处理，自然少不了要向陶铸请示报告。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赵紫阳与陶铸的关系十分密切，而陶铸当时又名列中共中央第四号人物，是公认的“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应当说，当时广东省委的日子比其他许多省委还算好过一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陶铸的上升。如果否定了广东省委的主流，也就等于否定了陶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赵紫阳不能处处向红卫兵让步。然而，陶铸在北京的地位并不巩固，很快便发生动摇了。

陶铸地位的动摇，始于他同“中央文革小组”、尤其是同江青之间的原则争论。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用陶铸，一方面是由于当时还不便或不能将党内主管文教的大权全部交给“中央文革”，另一方面是需要有一个在党内威望较高、文化素质较强、具有工作热情的人来暂时维持局面。

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刘少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0月25日，已经知道会议情况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三百多名工作人员，要求赴中南海向毛泽东送交批判刘、邓的决心书。当他们与陶铸联系此事时，陶铸明确表示：“组织几百人去中南海喊打倒刘少奇，贴他的大字报，这种作法我不赞成。”11月初，当陶铸看到中央组织部有人贴出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时仍然说：“不能把刘少奇同志叫作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是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46)

早在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江青就私下找到陶铸，让陶铸在会上向刘、邓开火，打头阵，陶以自己刚到中央、不了解情况为理由拒绝了。陶铸还为某些具体问题与江青发生激烈口角，他不能容忍江青用训斥的口吻同自己讲话。陶铸还与周恩来商量，建议任命江青为文化部副部长。这也严重触犯了江青，因江青已经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自认为自己已经是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根本看不起区区副部长的职位，因而把陶铸的建议视为对自己的侮辱。(47)

陶铸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不错。本来，他们二人历史渊源不深，1949年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路经武汉时二人才第一次相见，但陶对邓的印象很好。1954年，陶铸曾讲过：“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毛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我愿拜邓小平为师。”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新华社发一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发现没有邓小平的照片，指示一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的同志说，可做技

术处理。结果将邓小平的头像换到陈毅的身上刊出了。(48)这事后来成为陶的一大罪状,成为轰动一时的"换头术"事件。

到1966年12月下旬,陶铸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尖锐化。12月27日,中共中央开会,"中央文革"指斥陶铸犯了很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江青周密安排,批判陶铸推行"刘邓反革命路线",说陶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而与会的一些老政治局委员,也由于陶铸前一段地位猛升,并参与领导了"文化大革命",而对他心存芥蒂。这么一来,陶的地位就更岌岌可危了。(49)

12月29日上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说江青太任性,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在会上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专门留下陶铸,对他说:"江青这个人很狭窄,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毛泽东并让陶铸到中南地区去搞两、三个月调查。(50)

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尚未决心打倒陶铸,但陶铸已失宠。毛泽东对陶铸与江青争吵表示宽宏大量(至少表示出对陶铸的礼貌),但他不能容忍陶铸在与刘邓斗争中下不了手的态度。

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代表,以绝食为手段,强迫陶铸接见。在接见之前,这批造反派代表已接受"中央文革"整陶的指示。结果,接见过程中陶与造反派代表发生严重冲突,造反派甚至企图当场揪走陶铸,陶的警卫人员带枪入场制止,于是造反派反咬说,陶铸用武力镇压群众。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大罪状。(51)

王任重作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一度受到毛泽东信用,调中央工作,旋与"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受到造反派冲击,强迫赴广州养病。陶铸保了王任重,于是,造反派将矛头指向陶铸。

1967年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接见上述造反派代表。陈伯达、康生、江青严厉批判陶铸，声称：陶铸到中央之后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中央文革"还逼使周恩来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宣—布—陶—铸—的"问题"，利用周恩来在群众中的威望，把"打倒陶铸"的活动推向高潮。(52)"中央文革"同时也妄图以此来挑拨周与"刘邓司令部"的关系。

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就"陶铸问题"表了态，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有刘、邓的照片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53)

有了毛泽东这个表态，陶铸的案就算定死了。从此，陶铸从列名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正面人物一下子变成了反面第三号人物，成了仅次于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党内"第三号走资派"。于是，"打倒刘邓陶"的口号，响遍了全中国。

(1)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第10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编印，1969年3月北京版。

(2) 同上，第120—121页。

(3) 同上，第123—124页。

(4) 同上，第106—107页。

(5) 《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

(6) 《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2日。

(7) 《人民日报》1966年6月4日。

(8) "中共广东省委通知"1966年5月9日，粤发(66)18号。

(9)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1966年6月9日，粤发(66)47号。

(10) 同上。

(11) 同上。

(12)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第2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天津版。

(13) 《新中国记事1949——1984》第402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版。

(14) 同上，第402—403页。

(15) "赵紫阳同志在广东省委文化革命工作队长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6月26日。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12)第30—31页。

(22) 同(12)，第32页。

(23) 同(12)，第32—33页。

(24) 同(12)第33—34页。

(25) 同(13)第403页。

(26) 同(13)第405页。

(27) 同(13)第406—407页。

(28) 同(13)第408页。

(29) 同(13)第408页。

(30)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简报"佛山地区第1号(总第9号)、1966年8月22日印。

(31) 同上，政法部门第1号(总第10号)1966年8月22日印。

(32) 同上，汕头地区第1号，1966年8月22日印。

(33) 同(13)第409—410页。

(34) 同(13)第411—412页。

(35) 《南方日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1966年8月29日。

(36) "中共广东省委决定"1966年9月4日。

(37) "群众来访来信情况反映"第14期,1966年9月6日。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室接待组编印。

(38) 《南方日报》1966年9月16日。

(39) 同(37)第59期,1966年10月7日。

(40) 同(37)第87期,1966年10月19日。

(41) 同(37)第104期,1966年10月28日。

(42) 同(37)第149期,1966年11月18日。

(43) 同(37)第90期,1966年9月11日。

(44) "赵紫阳同志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作的检查"1966年11月4日。

(45) 同上。

(46) 同(12)第126——127页。

(47) 曾志(陶铸夫人):"如烟往事难忘却",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二册,第18页,《华夏出版社》1986年北京版。

(48) 同上。第16——17页。

(49) 同(47)第7——8页。

(50) 同(47)第9页。

(51) 同(47)第9——10页。王任重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陶铸曾保护王任重,所以揪王任重的造反派将矛头指向陶铸。

(52) 同(12)第129页。

(53) 同(12)第131页。

第十章　经历劫难

陶铸在北京被打倒之后，广东省委和赵紫阳所面临的局面，也一下子变得极端危险了。陶铸在广东当了十几年的第一书记，1966年6月1日，他以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离开广州赴北京，至此才半年时间。陶铸被打倒，自然意味着对中共广东省委的全面否定。于是，中共广东省委及其第一书记赵紫阳，也一下子失去了与造反派抗争的基础。

从1966年11月下旬开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中共广东省委和赵紫阳的处境日益困难。11月23日，中山大学《红旗》等群众组织在政法干校开大会斗争赵紫阳。11月28日，一些群众组织为了抗议所谓赵紫阳"拒不参加"省委机关群众批判省委的大会，到省委大楼静坐，闹得省委秩序大乱。12月11日和14日，广东许多群众组织又连续召开两次十万人参加的所谓"广东省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赵紫阳被迫前往接受"批判"。

本来，在1966年12月下旬，由于红卫兵造反派逐渐升级的"炮轰"、"火烧"，中共广东省委已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省委书记处的办公地点亦需保密和经常变换，省委书记们的住宿地点也不能固定，需要不断变动，以防被红卫兵冲击(1)实际上，中共广东省委已转入"地下"，在广州市内到处流动，竟有些象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况了。赵紫阳从参与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从来没有过白区地下斗争的实际经验，这回也多少尝到一点"地下斗争"的滋味了。

1967年1月5日，陶铸被定性的消息传到广州。赵紫阳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讲："陶铸被揪后，红卫兵小将对省委的看法将

会根本改变，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今后省委书记处碰头的机会将更少更困难了，希望大家独立作战，处理工作中的问题。”(2)

同一天在省委碰头会上，他还讲道：“看陶铸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广东省委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陶铸被揪，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我是重点人物，准备被打成黑帮。”(3)

在这里，赵紫阳表现出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复杂困难局面下可贵的应变能力和负责精神：只要还有一线可能，就坚持工作。但是，在“文革”的浩劫中，也确有不少党委书记失去抗争的勇气和独立判断问题的能力，随波逐流，消沉下去，个别的人还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压力下讲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

1967 年 1 月份的全国形势，又出现巨变。这就是发源于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1 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1 月 5 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分在上海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代表王洪文等人。张春桥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6 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1 月风暴”。8 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 日，《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等，肯定和支持上海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林彪煽动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对领导干

部，“有的要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张春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从基层到中央，党权、政权、财权、文权以及其他权”，“我们对所有的权都要夺”。在上海“1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之风刮遍全国。(4)

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评论员的评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其中写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人，但是，在他们盘踞的地方和单位，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着党权、政权、财权。他们总是利用掌握在他们手中的这些权力，来打击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5)

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的社论，其中写道：“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把政治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文化的权力，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这个革命，我们不干谁干！这个权，我们不夺谁夺！”(6)

在强烈的鼓动之下，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便不顾一切地向各级共产党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发起夺权斗争。

对中共广东省委的夺权，是由“广东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于1967年1月21日至22日进行的。

“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它以中山大学“红旗”为主，包括若干个群众造反组织，并得到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航空学院“红旗”驻穗联络站等当时全国闻名的“左派”造反组织的支持。

1月21日傍晚，赵紫阳、区梦觉和尹林平等正在省委党校开会，研究运动出现的新情况及省委应采取的对策，大批属于“省革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冲入省委党校，将赵紫阳等几位省委书记强行绑架到“省革联”的大本营中山大学，同时强行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在北京发出夺权号召的形势下，连省委的警卫部队亦不能制约红卫兵的夺权行动了。

当天晚上，赵紫阳等几位省委书记被扣押在中山大学主楼，即当时被红卫兵更名为“革命造反大楼”的楼上。红卫兵质问赵紫阳：“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多少错误？打算怎么办？”赵紫阳用手支着头，苦思了几分钟，抬起头说：“夺权嘛，是毛主席给你们的权利。要夺权，我看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监督我们的工作，另一种是彻底的办法，你们干，我们靠边站。”赵紫阳的这一回答，可能是当时一个省委书记能够作出的高明的回答。赵紫阳讲完之后，红卫兵代表要在场的书记、常委们表态。大家一个个都同意赵紫阳的话。红卫兵代表们在商量之后，恐怕也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和经验管理广东这么一个近四千万人口的大省，于是，只得同意赵紫阳提出的第一个方案，并宣布：“好，就这样。今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7)

这一夜，赵紫阳等省委书记们被强行扣留在中山大学，根本无法休息，被折磨得疲惫不堪。次日凌晨五时左右，“省革联”起草完毕“夺权通告”。负责人命令手下的红卫兵将赵紫阳从关押地点中山大学外语系“语音室”拉到二楼的“红旗公社”总部办公室，让赵站着听取“省革联”负责人宣读“夺权通告”，并被明确告之：“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8)

随后，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夺去中共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的大印。代理省长、书记处书记林李明要求，在报告党中央并召开省委常委会之后再交印。红卫兵立即指责他抗拒夺权。林李明争辩说：“你们造反有理，但我们报告毛主席也应该。”红卫兵蛮

不讲理，居然说："毛主席根本不是你们的主席。"林李明又争辩说："同志，不能这么说。"红卫兵更蛮横地说："谁跟你们是同志？叫你们不要给中央打电话，你们为什么要打？"于是，省委、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大印便被红卫兵强行夺走了。(9)

1967年1月22日，《南方日报》(本是中共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刊登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夺权通告"，内称：

"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

长期以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下的省委，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阳奉阴违，欺上压下，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把广东省搞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省委一小撮资产阶级老爷们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狡猾地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把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妄图把运动引向歧途。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何其毒也！

"铁的事实证明：广东省委就是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样的省委，非反不可！他们手中的权，非夺不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我们就是要造反！我们就是要夺权！"(10)

这份"夺权通告"，充满"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的专用语言。今天读起来，凡是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人都会有似曾相识之感。而未曾经历过那场浩劫的青年读者，也可以从中领悟到一点当年的"时代气氛"吧！

1月22日下午，赵紫阳等省委书记被造反派释放。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在省委东一楼召开会议，决定发出《中共广东省委告全

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赵紫阳对参与起草这一文件的省委常委说："省革联与省委是监督关系"，"夺权只是象征性的"，"不能承认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承认省委领导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只能承认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工作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损失。"(11)

于是，该常委根据赵紫阳的这种说法写成《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然后，由赵紫阳批示发出。

1967 年 1 月 23 日发出的《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称："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改正很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将更有利于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更有利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学习他们的聪明智慧，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运动、生产的双胜利。"它还强调：

"省委郑重表示：我们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所犯严重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后，一定更加积极工作，决不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我们认为，任何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都是同革命对抗的犯罪行为，是决不允许的。"(12)

这样，中共广东省委通过这份《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实际上向全省表明自己的存在以及仍在积极工作。正因如此，这次夺权后来才被军管会斥为"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

就在中共广东省委被夺权的当天，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又

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这篇社论大肆鼓动："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13)

可以设想，这种杀气腾腾的文字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出之后，那些狂热地参加夺权斗争的年轻幼稚的红卫兵造反派会有何反应。他们热血沸腾、如醉如痴了。

就在这前后若干天，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权相继被造反派夺了。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决定》就坚决执行这一指示作了五条规定。(14)

1月2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内称："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边，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要满腔热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起来夺权。即使他们暂时是少数，也要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15)

这样，有了军队的介入，造反派闹得更猛烈了，全国局势更加动荡混乱了。

广东省委“1·22”被夺权之后，由于造反派根本不懂行政管理，所以，以赵紫阳为主的广东省委实际上仍在办公处理日常事务。所不同的，是省委、省委文革小组的两颗大印交由“省革联”造反派派来的一个小组保管，用印的时候，由这几个年轻的中山大学学生来盖章。掌握了这两颗大印，稚气未脱的造反派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为了表明自己确实在监督省委，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在省委交来的文稿和批件上胡乱作些不得要领的增删修改。

1月28日，即夺权后的第六天，又出了一起使赵紫阳显示出其智谋的事件。那天中午，由广东省委机关几个一般干部组成的“硬骨头”、“工农兵”和“追穷寇”三个造反派的战斗队，在当时省委书记处办公的省委东一楼楼厅贴出一份“勒令”，勒令赵紫阳和省委书记处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搬出东一楼，将东一楼让给他们作“总部”。这些人将赵紫阳拉出来，逼迫他念大字报并表态。赵紫阳冷静机敏地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本应支持，有些具体情况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因为省委书记处在东一楼集中办公是与‘省革联’商定的。”造反派们蛮横地反驳道：“省委已经被夺权，哪里来的书记处？你们还有什么权力，还办什么公？”赵紫阳沉默片刻，讲道：“夺权是象征性的，当时我们在中山大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象征性夺权，由小将们监督，二是我们彻底靠边站。小将们选定了第一个方案。现在省委是在‘省革联’监督下工作，既然还需要工作，那就还要有办公地点。”

这些造反派坚持自己的“勒令”，并说：“夺权就是夺走资派的

权，走资派就得靠边站。"这时，赵紫阳笑道："我现在还不认为我是走资派，勒令的事你们可以与'省革联'协商一下。"这几个省委机关内部的"小造反派"当然不敢去惹中山大学的"正牌造反派"，只得嘴硬道："不关'省革联'的事，我们的勒令是算数的。"随后，他们便去吃午饭了。所谓"勒令"也就不了了之。(16)

然而，就是这个局面很快也维持不下去了。"文化大革命"的汹涌狂潮，冲击着全中国，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也开始了一场大混战。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讲道："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阴暗面。"(17)这番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形式。

2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同年1、2月间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有几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或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革命元勋，即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与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正面的激烈争论。这一事件，当时被诬为"二月逆流"。早在1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随后，2月14日和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主要在三个原则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交锋。

第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

第二，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

第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由于江青等人向毛泽东作歪曲事实的汇报，也由于毛泽东本

人对老干部的看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干部，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局生活会”，批评这些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二月逆流”加罪这些老干部，并在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8)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派人民解放军进行“三支两军”。这虽然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三支两军”的主旨是支持“造反派”，是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因此必然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19)

3月20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要求“采取主动地进攻”，“刮他十一级、十二级台风”。(20)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赵紫阳在广东所面对的形势，也严重地恶化了。

本来，在广州“1·22”夺权的“广东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只是由大专院校的几个所谓名牌造反派组织于夺权前几天才成立的，其目的也只是为了夺省委的大权。“省革联”夺权之后，匆忙向省市各机关派出自己的“监督小组”，监督各机关的原“当权派”。这样，自然引起其他造反派的严重不满。在自命英雄的各造反派组织之间，这是必然会产生的矛盾。更严重的是，这次夺权未得到以黄永胜为司令员的广州军区的支持。实际上，当中共广东省委被冲击之后，广州军区已成为广东最强大的权力中心了。

1967年1月25日，即“省革联”夺权后的第三天，“省革联”派驻广州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负责人与“广州市公安局革命造反

派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的负责人之间发生权力之争。当日晚,"省革联"调集上千人冲击市公安局,与"一总部"人员发生流血冲突。26日凌晨,广州军区插手,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同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监督小组"召开"控诉大会",批判斗争了"一总部"负责人。这就是"1·25"事件。(21)

1月29日,广州军区陆海空三军部队举行万人誓师大会,支持"革命造反派"向党内"走资派"夺权。会后,举行武装游行,誓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22)

2月2日,"省革联"所属人员为了控制广东省广播电台,与广州军区的军事管制人员在电台发生冲突。8日,"省革联"又冲击广州军区机关,这就进一步地激怒了广州军区。于是,在广州军区的支持下,广州大部分造反派组织起来反对"省革联"。2月19日,广州五万多造反派举行"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声讨"省革联",要夺"省革联"刚刚夺到手的权。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省革联"派到省委的"掌印小组"最惊恐不安,生怕那两颗象征广东省最高权力的大印又被别的造反派夺去。

在各个造反派对"省革联"的一片声讨中,最主要、最厉害的一条罪名乃是:"省革联"对中共广东省委的夺权是"假夺权",是中了赵紫阳这个"走资派""假让权、真反扑"的计。其根据是:第一,"省革联"没有将旧省委的"专政机器"砸烂,而是保留下来;第二,省委还在办公,2月2日还向广东全省发出"抓革命、促生产"的电报,赵紫阳还很"神气",还在处理全省的大事;第三,"省革联"的夺权没有实行"真正的大联合",只是少数组织的行为。(23)

在这场造反派之间的争权混战之中,由"省革联"控制的《广州日报》与反"省革联"派控制的《南方日报》大打文字仗,直到2月28日,广州军区明确表态,对《广州日报》实行军事管制,这场争斗才以"省革联"垮台而告终。

3月15日,以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为主任的广东省和广州

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军管会”遂成为广东省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这场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赵紫阳成了最重要的攻击目标。其罪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假让权，真反扑”等等。这些整人的“套话”，在当时确实具有可怕的威力。

在造反派及广州军区的压力下，赵紫阳为了说明情况，于2月23日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对于“省革联”问题的声明》，内称：“1月22日，‘省革联’向省委夺权，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一，认为夺权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二，当时出面的是中山大学‘八·三一’和红旗公社，武汉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红卫兵、还有哈军工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我一向认为这些单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夺权，我认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三，对当时广州地区造反派的大联合，我是不清楚的。听说他们有很多单位参加。根据当时情况和我处的地位，不可能先问他们大联合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对夺权是否接受；四，在1月22日之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的一些重要社论和一些省的经验，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24)

赵紫阳在“声明”中讲的情况，是合乎情理的。赵紫阳实际上批评了《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它们的社论只喊夺权、不讲具体做法，致使人们心中无底，无所适从。赵紫阳的这个“声明”不可避免地被造反派指责为“推卸罪责”、“嫁祸于红卫兵小将和党中央”等等。在那个疯狂而荒唐的年代里，一切都颠倒了。

3月31日，赵紫阳约广东省委机关《东方红公社》的几个负责人谈话，讲道：“我想和同志们多接近，想和机关各造反派保持接触。一方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志们，另一方面，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和批评。我脑子里经常起伏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这个人在广东应不应当被打倒？我有严重错误，在广东党内有相当影响。但是，

我这个人真就这么坏？我今天还不完全通，在理智上通，在感情上不完全通。二是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不跟群众一起揭发自己的错误。陶铸问题出来，省委的盖子逐步揭开，我思想上有比较大的抵触，认为别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总觉得只讲了我的一面，认为你们怎样讲就怎样讲吧，我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知道。"(25)在这个谈话中，赵紫阳等于明确表示自己不服，认为造反派对自己的批判是错误的。

接着，赵紫阳又谈到自己与陶铸的关系，他讲道："我和陶铸在广东相处时间很长，就象同志们讲的，陶铸是我的后台。陶铸的问题揭出后，势必和我连在一起。这在一开始我就估计到了。广东的文化大革命温度会迅速加高，而且造反派会对我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我和陶铸的关系，的确是工作关系，但一下子说不清楚，以后会讲清的，同志们将来会理解的。现在要我交代和陶铸的关系，与同志们完全站在一起，谈出更多的问题，我有困难。所谓跟陶铸的关系，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过去干了些什么，同志们都看到。我不交代，同志们都会揭。"(26)

赵紫阳在这里讲的与陶铸的工作关系问题，也是坦率的。他明白表示自己不能揭发陶铸。他讲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指在1966年下半年广东省委曾向陶铸电话请示三十余次，陶回电话二十余次的事情。这些电话记录，均已被造反派们费尽心思搞到，作为"罪证"予以公布，这在当时可算是炮轰省委和赵紫阳的"重磅炮弹"，当然，现在看来，无非是平常的情况通报和工作商谈而已。

在1967年整个春季里，广州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为了显示自己是正牌的造反派，都纷纷召开批判斗争赵紫阳及省委其他书记、常委的大会，不下数十次。每次批斗会，都发动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大呼口号，大肆上纲，甚至搞体罚和变相体罚。尽管这样，赵紫阳并没有在精神上示弱，广大群众也不热衷于整他。这从"广州市批斗赵紫阳联络站"负责人向广州军区文化革命办公室作的汇报中可

以清楚地看出来。汇报是这么讲的："赵紫阳的问题所以揭的不深，有两个主要原因：一，赵紫阳的真正面目还没有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由于广东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快，赵紫阳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从中捞取政治资本。加上陶铸多年来一直吹嘘赵紫阳为'三大专家'（土改、农业和群众运动），其实，情况也不是这样。赵紫阳在农业上一向是搞资本主义的东西。……二，知情人还没有真正站出来进行揭发，省委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中，虽有揭发，但是多限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而对赵紫阳的'三反'罪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揭的少。根本的问题是发动群众不充分，火力还不够集中。"(27)

看到这里，读者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同一个"情况反映"中，"广州市批斗赵紫阳联络站"负责人提出如下计划："我们对下一步做法的意见是：一，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揭发批判，造成斗批赵紫阳的高潮；二，采取内外结合，大会小会结合的办法，把要害问题揭深揭透，发动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专题揭发，组织力量进行重点调查，发动地委第一书记们和省委内部知情人揭发，从各方面收集材料；三，迅速综合编印已经揭发出的材料发下去，作为线索，顺藤摸瓜，把揭发赵紫阳的斗争引向深入。"(28)

其后，造反派对赵紫阳的斗争又有升级，各派组织争相斗争，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武斗现象也已出现，搞车轮战术，甚至整夜斗争，强迫赵紫阳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逼他交代与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的关系。1962年，刘少奇来广东视察时曾到赵紫阳家中小坐，这也成为一条大罪状。赵紫阳曾讲过，"邓小平讲话斩钉截铁"，这也被挑出来大加批判。至于他与陶铸的关系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当时赵紫阳年方四十七，正当壮年、身强力壮，也难以经受这种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可以想象，如果这样折腾下去，就是"铁人"也会拖垮的。

在这个关键时刻，是周恩来向赵紫阳及全国许多老干部伸出了援救之手。1967 年 5 月 5 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下达了“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并命令黄永胜将执行情况上报。

作者有幸看到一份珍贵的材料，即当年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给广州军区的题为《对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实行监护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里，不厌其烦，抄录如下：

“为贯彻总理 5 月 5 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司令部于 5 月 5 日 22 时 30 分之前，已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三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29)

看来，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的考虑的确很周到。这样，造反派批判斗争赵紫阳，已受到一定的约束了，而在此之前，造反派斗争省委书记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赵紫阳本人对这种监护的反映如何呢？该报告写道：“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到警司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了话。赵、区反映较好。他们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生活学习都有较好的保证’，也愿意考虑自己的问题。对赵、区、尹实行监护斗争，尚需考虑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目前揪斗赵、区、尹的革命群

众组织很多(学生、工人、农民各系统都有),需要统一安排。现划由警司一组归口安排,文革专案组、机关组参与商定,可否,请首长批示;二,需要尽快将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较大的革命群众组织中去,充分依靠群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分别进行传达;三,赵紫阳原配备的警卫员这次未随同来监护驻地,警司考虑,为工作方便,是否可以来,请首长定。"

报告还讲到三位省委书记的身体思想近况:"赵紫阳有肠胃病。他承认过去很娇、伙食硬、冷一点觉得受不了,前几天犯过一次病。区梦觉主要有高血压,最近血压有些高,头晕,曾发生呕吐现象。尹林平有心脏病,据说前些日子曾晕倒过一次。现在赵紫阳和尹林平情绪比较镇定,区梦觉有些悲观。"(30)

报告还专门讲到赵紫阳所谓的交代问题的情况,内称:"对赵紫阳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紫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紫阳'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31)

从上面这一段文字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当年造反派斗争赵紫阳,竟残酷地搞了五个通宵的车轮战,真是非人的折磨;也可以看到,赵紫阳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仍在坚持原则。看来,他效法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即可以毁灭自己,但不能牵累别人,更不能毁坏党的威信。他不在造反派面前谈及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同时坚持不喊"打倒刘邓陶"一类的口号。无疑,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代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都知道,狂热的造反派对于持抗拒态度的"批斗对象",会使出什么样的斗争手段。

孟子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确,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了孟老

夫子在两千多年前所描绘的考验，今天才成为被“天”降于大任的“斯人”。

. 实行监护之后，赵紫阳的人身安全有了基本保障，生活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安定，但还得不时地去接受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的“批判”。自然，在“批判大会”上，有广州警备司令部的监护人员在场，斗争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野蛮了。此外，有警司控制的斗争会亦不能象以前那样频繁地举行了。

从1967年春季开始，“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在中华大地上越烧越旺，不时有新的省、市、自治区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

4月1日，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4月6日，在江青策划下，在中南海第一次揪斗刘少奇。

4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32)

7月，林彪、江青一伙在武汉制造了一场打击武汉军区和一派群众组织的事件。早在4月16日，江青煽动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在他们的煽动下，武汉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一派公然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7月14日，王力和谢富治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到武汉。他们违背周恩来关于使两派组织联合起来的指示，支一派压一派，加剧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7月20日晨，武汉一派群众组织质问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活动，这无意中惊扰了当时正在武汉秘密视察的毛泽东。这一行动，遂被林彪、江青诬为“反革命事件”。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临大会，于是，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之后，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聂元梓、蒯大富、

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人派人到各地，串联当地群众"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挑动武斗，制造事端。(33)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文章对陶铸1962年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1964年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进行攻击。(34)

强化对陶铸的攻击，使赵紫阳的地位进一步恶化。这个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的造反派，已分化为"红旗"和"东风"两大派，在全市和全省大肆展开武斗，争夺地盘，甚至动枪动炮，劫夺铁路上运输援助越南抗美战争的军事物资。两大派各自控制势力范围，组织武斗队伍，私设公堂，自行审人甚至处决人。广州军区虽然对广州市和全省的重要目标实行了军管，但下属各部队亦时有参与武斗、散发枪支事件发生。这时，造反派忙于大打内战，自然顾不上赵紫阳等省委书记们了。这期间的赵紫阳，仍被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监护。不同于以前的是，此时已经以军区的人员为主成立了一个"赵紫阳问题专案组"，专门负责审查赵紫阳的所谓"问题"。赵紫阳亦必须检查自己的各种"错误"。这个"专案组"不同于以往的造反派，它是由"上级组织"专门成立的。

9月16日至17日，周恩来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的代表，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小将，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要求红卫兵做自我批评，迅速实现"革命大联合"。(35)

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最近一个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由于毛泽东仍然坚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大乱的局面无法结束。(36)

1968年2月21日，酝酿了数月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终于宣告成立。六十万军民在广州召开庆祝大会。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任省革委会主任，孔石泉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其他副主任有陈郁、王首道、邱国光、阎仲川、刘继发和黄育英等人。

黄永胜在成立大会上说：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广东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中南和广东地区的代理人陶铸、赵紫阳之流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彻底破产，揭开了广东省革命历史的新的光辉篇章。"(37)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赵紫阳是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黄永胜是广州军区司令员。现在，经过这场大动荡，昔日的座上客成为阶下囚。黄永胜落井下石，使自己登上了南国第一把手的高位。此时，在北京和广州被羁押的陶铸、赵紫阳二人，从报纸上看到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及黄永胜的讲话，肯定会怒从中生。

黄永胜的讲话中强调："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立毛泽东思想，始终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地位。要下最大的决心，用最大的力量，把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得更多更好，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省人民的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全省的一切阵地，把广东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38)

2月2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其题目借用毛泽东于1934年写一首词中的一句，即《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社论的副标题为"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社论写道："广东省文化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是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明察秋毫的毛泽东思想，同陶铸和陶铸式的反

革命两面派针锋相对的斗争过程。陶铸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长期在广东推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通过在广东的代理人，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破坏广东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9)

显然，社论中讲到的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就是指赵紫阳了。不过，细心的人还可看出，北京的社论毕竟没有象黄永胜等人那样，直接点出赵紫阳的名字。这个区别在当时似乎是无所谓的，但日后事态的发展却证明，这个区别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许，是周恩来的努力使赵紫阳避免了在中央一级的报刊上被公开点名批判的厄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庆贺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中，几乎对全部原省委第一把手都进行了点名批判，而赵紫阳是例外。正是这么一点似乎微不足道的区别，对当时的赵紫阳却非同小可，因为它可能包含着这样的暗示：赵紫阳的问题“尚未定性”。

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1968年2月3日，赵紫阳在“专案组”的要求之下，写了一份一万余字的《我的检查》。然而，就是这份检查，竟被以黄永胜为首的广东革委会斥为“假检查，真反扑”，并招来了更大规模的批判。

在“检查”中，赵紫阳只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刘邓陶的路线，并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赵紫阳承认自己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狠抓阶级斗争，只注重生产而忽视革命等等。在与陶铸的关系上，他承认，由于陶铸对自己长期重用和支持，自己对陶有好的印象，长期形成“盲从”，并在文革中接受陶的指示，成为陶在广东的代理人。(40)

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时，赵紫阳写道：“我之所以犯这样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的立场和世界观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最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根

本态度有问题。我没有真正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努力理解'。这是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不忠。我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学习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至今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还是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当解决问题时，对于毛主席的教导，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还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去办。"(41)

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标准，赵紫阳这样的检查，还不能算是"深刻"和"触及灵魂"。在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的书不能不读"；"毛主席著作，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赵紫阳坦率地承认自己对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并不如饥似渴，而是不熟悉、一知半解。应当说，赵紫阳敢于在检查中这么说，是要冒风险的。

赵紫阳接着"检查"道："我过去对待许多重大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首先去对照一下，看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着重地去考虑根本的、长远的、政治方面的后果，而是多从眼前的效果、特别是眼前经济方面的效果出发去考虑，依靠自己的'感想'自作聪明地去想一些小方法，打一些小主意。结果就不能不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42)

作为一个管理着三千多万人口的大省的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处理现实问题时，当然不能首先去考虑符合不符合某种抽象原则，而必须考虑经济效果。历史证明，那些自称对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最最忠于"的人，乃是口蜜腹剑的野心家、阴谋家，甚至会干出谋害领袖的勾当，而那些脚踏实地地治理国家、注重经济建设的人，倒是人民共和国的忠实维护者。

赵紫阳在检查中写道："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的，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

解的和不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更严重的是，我有时不是努力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实质，按毛主席本来的意思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带着自己的倾向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话，片面孤立地加以强调，这样形式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更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忠诚。"(43)

看来，当时的赵紫阳是怀着某种负疚的心情来作检查的。凡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共产党人，尤其是老干部，大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阶段。赵紫阳在自己的检查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点。许多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戎马半生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都有过类似的思想经历，即一方面感到"文革"有许多不对头的地方，另一方面，在主观上又想跟上毛泽东的思想进程，于是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为解决这个矛盾，绝大多数老干部不愿意从毛泽东可能有错误的角度去想问题，而宁肯强迫承认"自己的思想的问题"。当然，即使看出毛泽东有错误，当时也不能用语言把思想讲出来。

赵紫阳的这一"检查"，给自己招来一场横祸。

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将权力收到自己手中，并忙于统一两大派造反组织，号召"大联合"，于是，又想起了广东省各造反派的共同目标——赵紫阳。

1968 年 9 月 14 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革命群众紧急行动起来，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迎头痛击广东省头号走资派赵紫阳的翻案妖风"。赵紫阳 2 月间写下的"我的检查"被斥为"万言翻案书"，说它"向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反攻倒算"，"与'二月逆流'翻案妖风北呼南应"。(44)

于是，一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骤然而至。各方面的大批

判文章如雪片飞来，何止于百张。群众斗争大会又频繁起来，赵紫阳以往的言论被精心收集、断章取义，编成所谓的“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赵紫阳的反动言论摘编”，对赵紫阳的指责，可以说，是极端的牵强附会。例如，赵紫阳于1966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曾对一位领导干部半开玩笑地说：“在天子脚下嘛，京官难做”。这被说成是“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赵紫阳于1965年8月在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自觉自愿，不能强制，奉命学习，那是徒劳无功的，”这被说成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赵紫阳于1959年1月说：“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焦点，”这又被斥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物质第一”。赵紫阳讲“产量责任制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调动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最好措施，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新发展，可以把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被指责为“鼓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推行‘三自一包’”。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这被斥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5)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4月13日广州“工人纠察队”组织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上，有一个干部上台揭发了一件所谓的“赵紫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例，即1962年秋，当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时，一位干部在下面讲了一句“刚刚好了一点，又来了”，当场即有“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站起来，指出这是反对毛主席的行为，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只说这是认识问题，没有追究。这就构成了赵紫阳的“反动问题”了。(46)由此可见，这类批判是多么荒唐可笑。

这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从1968年4月开始，搞到5、6月份，即成为强弩之末，揭不出什么“爆炸性”的问题，只好收场。更重要的是，各个造反派组织和省革委会的头头们，不会因为批判赵紫阳而团结起来，他们仍在或明或暗地争夺权力，打击对方。

北京的情况更是如此。林彪、江青等人或争夺或勾结，千方百计地夺取权力，享用着“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47)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到1968年底，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文化大革命”终于该“胜利结束”了。

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国和苏联边防军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一时成为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影响深远。

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林彪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报告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丰功伟绩”，全面肯定和发展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方法，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规定林彪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48)

在4月28日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同时，也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

与中共“九大”召开大体同时，负责赵紫阳问题专案的广东省军区第五办公室，经过长期的准备和策划，于4月20日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紫阳破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

该报告一开头便以这样的文字给赵紫阳定了性：

"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明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勾结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49)

该报告在历数了所谓赵紫阳破坏文化大革命，死保陶铸等"罪行"之后，又专门讲到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报告是这么写的："1967年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东四千万革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奋起向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赵紫阳看到他疯狂镇压、笼络利诱革命群众的种种阴谋已经遭到破产，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全面崩溃，特别是看到他的主子，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被揪了出来，更加恐惶万状，眼看'权'保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失败，出于其反革命的'寸权必争'的反动本性，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于1月22日玩弄一个假让权真保权的阴谋。结果，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的伟大方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赵紫阳反革命修正主义真正目的的一次大暴露，是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反扑"。(50)

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这类文字，一方面是想让读者重温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语言，另一方面亦可以对当时被"赵紫阳专案组"正式定性的"问题"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的几个月，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登

峰造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许多被审查的老干部都感到绝望了。我们无从知道当时的赵紫阳是否有这种绝望之感，但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心情无疑是暗淡的。全国到处都是一片对“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狂热欢呼。刘少奇和陶铸二人，相继于 1969 年 11 月被迫害致死，具体情节十分悲惨。

赵紫阳仍被广州市警司监护，还得不时奉“专案组”之命写一些“补充交代材料”，诸如“产量责任制”、“与陶铸的关系”等等。由于他是前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定不了他的案，而他的材料报到北京之后，一直未被中央定性，所以他的“问题”被“挂”起来，没有结论。但是，正如英国诗人雪莱的著名诗句所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黑暗的天际终于露出了一线鱼肚白色的光亮。

1969 年 10 月 17 日，林彪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即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严厉制止。在“紧急指示”影响下，大批党政干部及其家属被强行疏散到中、小城镇和偏僻农村，有的送往“五七干校”。(51)

这一事件使毛泽东对林彪的抢班夺权提高了警惕，从而成为林彪在政治上由盛而衰的起点。

197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问题。会议之前，3 月 8 日，毛泽东就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提出意见，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到会者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但是，由于林彪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在这次会议以后不久，4 月 11 日，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且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4 月 12 日，毛泽东对林彪的建议作了批示，指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时，林彪一伙还不死心，继续进行阴谋活动。叶群对吴法宪

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52)

1970年期间，赵紫阳在失去自由三年多之后被解除了军事监护，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这是当时对"犯了走资派错误"者的一种处置方法。

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有三项：1.讨论修改宪法；2.审定国民经济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在全会开幕会议上，林彪在事前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按照事先的预谋，突然发表了蛊惑人心的长篇讲话，推翻政治局的决定，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同时，以颂扬毛泽东个人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声称他要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在林彪讲话之后，其集团成员便纷纷活动起来，妄图将会议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家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却提出要全会听林彪的讲话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蓄意改变全会的议程。同时，陈伯达等人连夜加紧炮制"称天才"的材料，并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宪法条文。毛泽东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毛泽东批判了陈伯达的谬论，并找林彪谈话。周恩来找吴、李、邱谈话，并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检查。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指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53)

全会挫败了林彪集团的突然袭击，于9月6日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强调高级干部要加强学习的问题以及党内外的团结问题。周恩来作了总结讲话，并代表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54)

由于林彪集团的问题大暴露，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主持下，一些老干部陆续获得"解放"，被重新安排工作。在押的老干部的境况也有好转。这是对林彪集团的一种牵制。但是，江青集团趁机也有

所发展。

1971年3月，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林彪不甘心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失败，认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便开始策划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林立果组成了武装政变的秘密骨干力量，取名为"联合舰队"。(55)

4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在"批陈整风"过程中，为了打破林彪集团包办的一统天下的局面，1971年4月党中央决定李先念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会上讨论了林彪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宣布：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为第二政治委员。(56)

就在这个大背景之下，1971年4月，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赵紫阳被解除监护审查，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57)这对于丧失自由达四年之久的赵紫阳来说，真是一大福音。为了与林彪集团斗争，毛泽东和周恩来需要各地都有一批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与林彪集团不共戴天的干部。本来，赵紫阳在广东工作多年，似乎留在广东工作更能发挥作用，但由于他在广东曾被大肆批斗，加之广州又是林彪集团的主要根据地，所以，容不得赵紫阳此时在广东立足。

于是，赵紫阳便偕妻将雏，告别了度过二十个风雨春秋的广东，奔向祖国北方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

(1)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刘田夫1969年1月7日的"交代"。

(2) 原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彬1968年12月30日的"交代"。

(3) 《南方日报》(从1968年起改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1968年4月25

日。

(4) 《新中国记事 1949—1984》第 418——419 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长春版。

(5) 《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6 日。

(6) 《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9 日。

(7) 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寇庆延 1969 年 1 月 6 日的"交代"，"赵紫阳的两个方案"。

(8) 原"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负责人蔡某某 1968 年 12 月 26 日的回忆"关于赵紫阳在我宣读夺权通告后的表态"。

(9) 原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代理省长林李明 1969 年 1 月 23 日的"交代"。

(10) 《南方日报》1967 年 1 月 22 日。

(11) 原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彬 1968 年 10 月 24 日的"交代"。

(12) 《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1976 年 2 月 23 日。

(13) 《人民日报》1967 年 2 月 22 日社论。

(14) 同(4)第 420 页。

(15) 《解放军报》1967 年 1 月 25 日社论。

(16) 原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干部姚某某 1969 年 1 月 5 日的"揭发"。

(17) 同(4)第 421 页。

(18) 同(4)第 422——423 页。

(19) 同(4)第 419 页、426 页。

(20)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6 年 3 月 20 日，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第 185，188 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政治部编印，1969 年 3 月北京版。

(21) 《南方日报》1967 年 2 月 19 日。

(22) 《南方日报》1967 年 1 月 30 日。

(23) 《南方日报》1967 年 2 月 16 日"省委交权是个大阴谋"。

(24) 载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编《情况反映》第 64 期，1967 年 2 月 25 日。

(25) 载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编《情况反映》特第 14 期，1967 年 4 月 2 日。

(26) 同上。

(27) 同(25)第 12 期，1967 年 3 月 17 日，"斗批赵紫阳联络站朱某某反映斗批赵紫阳的情况及今后打算"。

(28) 同上。

(29) 同(25)第9期,1967年5月8日,广州警备司令部:"对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实行监护斗争的措施"。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4)第126页。

(33) 同(4)第133页。

(34) 《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35) 同(4)第437页。

(36) 同上(4)第437页。

(37) 《南方日报》1968年2月23日。

(38) 同上

(39)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8年2月22日。

(40) 赵紫阳:"我的检查",1968年2月3日。

(41) 同上。

(42) 同上。

(43) 同上。

(44) 《南方日报》1968年4月15日。

(45) 《南方日报》1967年12月19日。

(46) 《南方日报》1968年4月14日。

(47) 同(4)第453页。

(48) 同(4)第462页——463页。

(49) 广东省军区第五办公室:"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紫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1979年4月20日。

(50) 同上。

(51) 同(4)第470页。

(52) 同(4)第475—476页。

(53) 同(4)第483页。

(54) 同(4)第483—484页。

(55) 同(4)第491页。

(56) 同(4)第492页。

(57) "赵紫阳同志在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2年3月25日。

第十一章　北上内蒙古

1971年4月，赵紫阳第二次获得“解放”。被中共中央分配到内蒙古工作。关于他的职务，周恩来在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决定，派他担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当时，内蒙古的党、政、军的第一把手是尤太忠。尤是一位军队干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本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是乌兰夫。乌兰夫是蒙古族人，二十年代前期入党的中共老干部，获上将军衔。但是，如同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一样，乌兰夫也被造反派和红卫兵打倒了。他被指责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饱尝了“革命大批判”之苦，当时尚未被“解放”。

早在1967年11月1日，即赵紫阳还被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监护地”之时，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就宣告成立，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早成立几个月。当时，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第一任主任是滕海青，滕是一位军队干部，当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北京部队（大军区）副司令员。为祝贺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发表了《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的社论。这篇社论在结尾时写道：“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内蒙古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把内蒙古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

5月1日，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举行的庆祝国际劳动节的集会上，赵紫阳第一次露面。(2)他终于又以省级领导人的身分公开活动了。

5月13日至1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经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尤太忠任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

伦和赵紫阳为书记。(3)这样,赵紫阳便从原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降为中共内蒙区委排行第五位的最后一名书记。不过,话又说回来,比起那些此时仍被关押审查的大批老干部来,赵紫阳算是相当幸运的了。

当时的内蒙古,被认为是"北疆反修前线",所以,自治区党委中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军人。赵紫阳以往对内蒙并无特别的了解,此时又作为第五把手,分工管农牧业。这可是他的老本行了。

赵紫阳恢复工作伊始,内蒙古的农牧业就遇到了自然灾害。从5月份以后,内蒙古气候反常,风沙大,气温低,相继出现旱、风、冻等灾害。入夏之后,旱情尤烈,庄稼不长,牲畜缺水,情况严重。(3)

6月7日晚,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召开紧急抗旱电话会议,各盟(市)旗(县)以及生产建设兵团负责人都出席了。分工主管农牧业的赵紫阳讲了话,号召:调动一切可调动的人力、物力,支援抗旱第一线,千方百计地完成播种任务,保苗保畜。(4)

随后的几天,包括赵紫阳在内的内蒙古党、政、军领导人带领干部前往呼和浩特市郊区参加抗旱劳动。(5)

8月下旬,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全区"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会议要求"狠狠抓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狠抓根本,批修读书,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这在当时就是专门指批判陈伯达);第二、狠抓阶级斗争;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第四,进一步抓好生产。前三条是虚的,第四条是实的,因而也是真正重要的。关于第四条,会议提出:要完成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今后四个月的任务很重。要充分发动全区各族革命人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保证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做出贡献。在工业方面,特别要抓好原材料工业的生产、机电产品的生产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狠抓基本建设工程的完成。要加强企业管理,发动群众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所有企业都要挖掘潜

力，全面完成产品数量、品种、质量等指标，降低成本和原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坚决反对那种只追求产值和产品数量、不管产品质量、不讲求成本的不良现象。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严格劳动组织纪律。

农牧业方面，要抓好秋季作物的田间管理，做到以秋补夏。今冬明春还要进一步掀起搞农业水利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从现在开始就要着手抓，做出规划，做好准备。畜牧业要充分抓住当前的大好时机，加强放牧管理，大抓畜牧膘情。同时抓紧做好打草储草工作，各级领导必须对牲畜过冬准备予以相当的重视。(6)

这个时候，林彪集团即将复亡，抓生产已经不是什么罪过了。这个时期的赵紫阳，在内蒙所处的地位比较超脱，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内蒙古没有任何牵连。第一书记尤太忠与赵紫阳是同在刘邓大军战斗过的老战友。尤是红四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出身，是邓小平的老部下，1947 年任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的旅长。当时，赵紫阳的地位比尤略高一点。此时尤太忠将农牧业的工作交给赵紫阳。据了解当时情况的内蒙干部称，赵紫阳在内蒙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各盟、旗、县度过的。赵紫阳常常亲自带几名干部去搞调查研究，制定有关农牧业生产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尔后多年在内蒙古农牧区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就是赵紫阳制定的。

历史巨钟的指针，渐渐地指向那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日子 1971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林彪摊牌的时刻逼近了。

8 月 14 日至 9 月 12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湖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着重谈了 1970 年 8 月在庐山会议上同有些人搞突然袭击抢班夺权的斗争，指名批评了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武汉毛泽东说：在庐山会议

上的阴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泽东还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陈伯达后面还有人”。在长沙，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直截了当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这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毛泽东还不指名地点了林立果，指出“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在南昌，毛泽东还特地把许世友等人从南京叫来，向他们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项基本原则：“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7)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对于动员党员、干部起来同林彪一伙作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9月5日和6日，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被林彪一伙截获。他们猜测，在10月1日国庆节前后，将要召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可能在会上解决他们的问题。7日，林立果向其政变突击队“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的命令。8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政变手令：乘毛泽东外出之机，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然后林彪以“接班人”的身分宣布“接班”；如果此计不成，便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发动内战。但是，完全出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于11日下午乘专列提前离开了上海，并于当日晚上10点多钟安然地通过苏州车站，跨过林立果的“小舰队”阴谋放置炸药的硕放铁桥。这就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12日，林彪得到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密报后，准备南逃广州。当晚，毛泽东安抵北京。驻北戴河的警卫部队得知林彪、叶群、林立果要坐飞机叛逃，立即向北京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获悉后，立即部署限制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惊恐万状，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密谋。当晚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改南逃为北叛，图谋飞往苏联伊尔库茨克。13日零点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仓皇登上飞机，命令飞机强行起飞，油尽迫降蒙古温都尔汗时起火，机上八男一女全部烧

死。(8)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大戈壁烧毁时所发出的巨大爆炸声,实际上敲响了"文革"的丧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破产。这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对林彪集团的成员及其罪行进行了清查和处理。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高级干部通告林彪仓皇外逃,自取灭亡。10月1日以后,逐级下达,使全党、全民都了解事情的真相。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夺回了被林彪一伙所篡夺的权力。(9)与此同时,按照中央的部署,结合对林彪集团罪行材料的传达和讨论,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林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对林彪一伙长期以来互相勾结,阴谋抢班夺权,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计划谋杀毛泽东,发动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和批判;第二,对林彪一伙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本质和他们结党营私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第三,对林彪一伙所鼓吹的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进行批判。但是,由于仍受毛泽东的"左"倾思想的指导和江青等人的干扰,这个时期,还不可能彻底完成全面清算林彪一伙罪行的任务。"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这时起至1972年底,周恩来极力排除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结合批林整风运动,为纠正极"左"错误,克服它在经济、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为消除林彪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各项经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国内形势开始出现新局面。

林彪集团的败亡,对于此时正在内蒙古的赵紫阳来说,无疑是

一大福音。这不仅由于赵紫阳深受“文化大革命”之苦，被打成“走资派”，还由于他本人直接受到林彪集团重要成员黄永胜的打击迫害。在林彪事件中，广东一度变成林彪集团的“根据地”，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都属于“上了贼船”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林彪的败亡，在客观上为赵紫阳重返广东准备了条件。不然的话，赵紫阳恐怕就不可能南归了。

1971年11月18日，赵紫阳在呼和浩特市出席了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10)当时，抓农业生产已经有功无罪了，不过还得冠之以“学大寨”的头衔，这个头衔起着护身符和通行证的双重作用。当时的农牧业政策，虽然已多少放松了一点对农牧民个体收入的限制，但仍在“集体统一分配”的框框里打转。当时的奋斗目标，亦不过是为达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六十年代制定的“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所规定的指标，即黄河以北达到亩产粮食300斤，黄河以南达到亩产500斤，长江以南达到亩产800斤。因此，对内蒙古的农业地区，只要求粮食产量“达纲要”就不错了，如果能“跨黄河”就更不得了了。

然而，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光靠大会号召是不行的，还得有适当的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对于这一点，久历“戎行”的赵紫阳不会不知道。

12月29日，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题为《增强政策观念，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牧区的经济政策》的社论。社论写道：“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通过正确的政策和错误的政策之间的斗争表现出来的。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了实现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从右的方面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物质刺激’、‘分田单干’等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就是从‘左’的方面提出‘割掉私有制尾巴’，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推行‘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对立，妄图达到其瓦解农村、牧区社会主义阵地、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11)

这篇社论，从表面上看，是既反"左"，又反"右"，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左"的那一套。这是因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已属"文化大革命"中老生常谈的套话，而批判"割私有制尾巴"、"否定等价交换"，却有着大胆的拨乱反正的潜在意义。至于社论所说的"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则是毛泽东亲定的暗指林彪的专门政治术语。本来，刘少奇与林彪是死对头，二者的为人处事也截然不同，毛却把二人等同起来。人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搞"实用主义"已经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篇社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倒是相当机智勇敢的。

社论还写道："我们党关于农村、牧区人民公社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所规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等，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适用的，不能任意改变。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反对自作主张，自立规章，任意修改党的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2)

这样，社论就重申了不允许再刮"共产风"的立场。

针对当时许多干部"宁左勿右"的心理状态，社论写道："在某些人中间有一种情绪：政策过头了，却不愿意纠正。他们把纠正这种错误，看成是后退，说什么将来总是要走这条路的，已经搞了，也就算了，何必后退。这种情绪对于落实党的政策妨碍极大，必须予以高度注意。应当指出，把明天要办的事，勉强拿到今天去做，并不是方向路线对头。纠正这样的错误，决不是后退，恰恰相反，而是创造条件，以便更好地前进。"(13)

在当时，这篇社论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也就很不容易了。若不是林彪垮台、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篇社论肯定是发不出来的。今天的人们不应当忘记赵紫阳在这篇社论中所起的积极

作用。

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中国的发展说来具有深远意义的外交大事。一件是1971年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台湾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26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一切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正式通知。(14)

另一件事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访问，于1972年2月21日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21日至26日，周恩来和尼克松举行会谈。27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双方联合公报。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15)

这两件外交大事，实际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中国自我封闭、与世界隔绝的反常状态，使中国又重新走上世界外交舞台。

1972年3月，经周恩来报请毛泽东批准，赵紫阳离开上任不到一年的内蒙古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6)

赵紫阳在内蒙古仅仅工作了十个月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以林彪败亡为标志，极左路线发展到顶峰，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人们将建国后极左路线的发展画一条曲线的话，就会发现，从1971年9月13日起，极左路线就最终地失去了迷惑人的上升势头，尽管后来还有若干次跳动，但都成不了"大气候"了。

赵紫阳在内蒙古工作十个月的一个最明显的收获，就是在内蒙熟悉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这一点，对于他在后来被任命为有较大面积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川省的领导者，无疑是有意义的。不仅如此，这种经验同样有益于他在以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时的工作。另外，这段时间也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使他能顺利地重返南粤，承担起在广东揭批林彪、黄永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

(1) 《人民日报》1967年11月3日。

(2) 《内蒙古日报》1971年5月2日。

(3) 《内蒙古日报》1971年5月23日。

(4) 《内蒙古日报》1971年6月8日。

(5) 《内蒙古日报》1971年6月13日。

(6) 《内蒙古日报》1971年8月22日。

(7) 《新中国纪事1949—1984》第497—498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版。

(8) 同上，第499—500页。

(9) 同(7)第500—501页。

(10) 《内蒙古日报》1971年11月19日。

(11) 《内蒙古日报》1971年12月29日。

(12) 同上。

(13) 同(11)。

(14) 同(7)第502页。

(15) 同(7)第508页。

(16) 《南方日报》1972年4月8日。

第十二章　重返南粤

当赵紫阳重返南粤之时，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是丁盛。丁是林彪的老部下，红一军团和第四野战军出身，1955 年授少将军衔。丁在林彪事件中不同程度地“上了贼船”，或犯了错误。林彪之所以打算南逃广州，是考虑到自己在广州军区的势力。他手下的大将黄永胜曾长期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林彪垮台后，黄永胜被捕，丁盛等人亦惶惶不可终日。北京电话通知广州军区，立即抓捕几个从北京南逃到广州的隶属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丁盛等人见有立功赎罪的机会，连忙追捕，捉到之后向北京报功。(1)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稳住局势，没有马上处置丁盛等人的问题。但是，调赵紫阳回广东是有深谋远虑的。

赵紫阳离开内蒙古之后，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在场的还有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孔石泉。当着这两个人的面，周恩来明确指示，赵紫阳回广州后主要负责党的工作。(2)

这样，赵紫阳就返回到自己长期工作过的广东。此时，他已从“阶下囚”上升为“座上客”了。不仅是“座上客”，而且是掌握着特殊主动权的领导者。赵紫阳虽然不是省委第一书记，但是，由于他在广东工作过二十多年，拥有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基础，所以，他所发挥的作用，比名义上的地位要大得多。

1972 年 3 月 24 日，赵紫阳在返回广州之后头一次出席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书记孔石泉在会上说：“丁盛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好班长，赵紫阳同志回省里工作，我们一致表示热烈欢迎。赵紫阳同志在广东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经验很丰富，我们要向他学习。”(3)

广东省委书记、老干部王首道也说："赵紫阳同志回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必要的。"(4)

在这个会议上，赵紫阳也讲了话。他说："向同志们交心。我是犯了大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都犯了错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到广东来工作，对我是宽大，是信任，也是寄予希望，给我在哪里犯错误就在哪里改正的机会。"(5)

赵紫阳接着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打倒，不是我没有错。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是毛主席对我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是怀着去年5月去内蒙时一样的心情，要努力工作来感谢和报答毛主席的恩情，立功赎过。我要好好学习，向广州军区学习，向老同志学习，向各级领导学习，向群众学习，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一定要搞好团结，做到亲己疏，疏己亲，亲己严，疏己宽；搞五湖四海，不搞小圈子；服从集体领导，服从省委领导。我有一个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我在广东欠了一笔债，还账是个很好的机会。"(6)

最后，赵紫阳讲道："我身体还好，有积极性，过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嗅觉不灵、模糊。今后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鼓足干劲，振作精神，以功补过，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7)

随后，在省委分工中，丁盛等人并没有将主管党务的工作交给赵紫阳，而让他分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5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上报"关于从林陈反党事件中反映出我们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内称："由于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在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也宣扬了林贼及其一伙所散布的一些反动观点。"(8)

"检查报告"承认："在我们常委的一部分军队同志中，过去与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等人相处较久，工作上有不少联系，思想上总感到广州军区是四野的老底子，产生了一种盲目的'优越感'，宣扬

林彪的东西更多一些。这种'优越感'的实质，是林彪为了分裂我党我军，复辟资本主义，长期散布的那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流毒，在我们这些同志头脑中的反映。"(9)

总的说来，广东省委的这份"检查报告"很不深刻，避重就轻。显然，这份检查是丁盛、孔石泉等人主持下起草的。当时，赵紫阳刚回广东，省委中的军人又对他颇为戒备，因此，还不可能参与这个工作。在军人们看来，深受林彪和黄永胜迫害的赵紫阳对自己是一种威胁。

对于这个"检查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但他们统筹全局，一时还不急于处理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委的问题。

这个时期的赵紫阳，重操起主管工农业生产的旧业，致力于在生产领域清除林彪推行的极"左"路线。

7 月 4 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农林科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林业生产和科研领域中，要清除他的流毒。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没有正确的路线就没有一切。我们要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当前关键的问题是批林。下半年要把批林整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要贯彻到各个方面去。林彪的流毒是很广的，不仅在军队而且在地方，不仅在政治而且在经济，不仅在工业而且在农业，各个领域都有他的流毒。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他的东西说成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假乱真，使下边混淆不清。"(10)

赵紫阳接着讲道："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把批林整风和各个领域里的路线问题结合起来，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各个领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批得深。我们对林彪的反革命政变和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一定要声讨、揭发、批判，同时要批判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在批判中，要同本地区本单位存在路线问题结合起来，清除他的流毒。把各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去认识。"(11)

赵紫阳还专门讲到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广东，总的来讲粮食还是偏紧，群众的口粮还是紧张，市场也比较紧张，归根结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跟不上去。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和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一些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有那样迫切的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还应当进一步的缩短，这样我们才可以挤出资金和材料支援农业，我看这是考虑农、轻、重关系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12)

作为长期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赵紫阳一贯重视农业，他是不同意在当时大搞重工业的。

赵紫阳还讲到农业和副业的关系问题。他说：

"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单纯搞粮食不搞经济作物，不搞林、牧、副、渔，不搞其他。其实，只搞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就是上去了也是不能够巩固的。这是辩证的，不能有片面性。在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这一点。另外也有实际问题，粮食如果绷得很紧，搞得群众一个月吃三十斤粮食，再讲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所以粮食如果搞得很紧张，农民担心口粮问题，他就没有心情去搞多种经营。"(13)

赵紫阳积累了农业方面的大量知识和经验，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即使是在批判林彪的高潮中，也不可能完全纠正长期形成的"左"的农业政策。

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详细的论述了秋收分配问题。(14)

果然，毛泽东发现批判林彪的怒潮有可能冲毁自己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基础，便又一次运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出来扭转运动的方向。12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路线是"极右"，是"修正主义"。这就否定了周恩来等人要求批"左"的意

见。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批林整风出现了严重的曲折。结果，"左"倾错误不但得不到纠正，反而继续发展。(15)这样，广大群众对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更加无法辨认了。

在这个局面下，赵紫阳在公开讲话中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只讲一个方面，得同时讲两个方面。比如，赵紫阳1973年3月31日在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道："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和谬论，教育干部、群众坚持'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整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批判'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也要批判'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防止在克服一种倾向的同时，掩盖着另一种倾向。"(16)

在1月14日召开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上，赵紫阳又不得不再次检查自己在广东执行了刘少奇路线，犯过错误。他还讲道："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批判，震动了我，使我不能不重新解剖自己，逐渐认识到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多严重错误的。冲击、批判，这对我是大有好处的，是起了革命的促进作用的。"(17)

在当时，凡是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得小心谨慎，不能被别人抓住"翻案"的把柄。在"文革"期间，担任需要经常公开"亮相"的领导职务的人，会陷于"两难"境地。的确，当这样的"官"，很难获得心理上的平衡，因而是不愉快的。

1973年3月10日，发生了一件对中国现代历史关系重大的事情，即在周恩来的力争之下，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决定认为，邓小平犯了严重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决定称：1972

年8月3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示："邓小平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挺(应为'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18)

在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同时，还将邓小平致毛泽东的信作为附件发出。在这封信中，邓小平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他写道："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19)实际上，邓小平之所以免遭刘少奇、陶铸等人的悲惨命运，更为关键的是周恩来的保护。

在信中，邓小平再一次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说："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20)

这里，我们不由得联想到，邓小平的这个检查，与赵紫阳前些时所作的检查竟很相像，连文字都有一致的地方。当然，他们二人当时不可能有什么联系。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被认定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都必须违心地在检查

中极力为自己的错误"上纲"，但又不愿意承认自己"反党"、"反革命"，于是，只好说自己对毛主席不忠、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等等。这成了一种"例行公事"。

在信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了恢复工作的问题。他写道："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出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万一。"(21)

邓小平的这封信，感动了毛泽东。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正为林彪事件而苦恼。原来精心安排的"接班人"，竟是一个谋害自己的凶手，这个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毛泽东一下子好象苍老了许多。毛泽东一直重用的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在整彭德怀时打掉了一批，这次林彪事件中又垮掉一批，红二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本来人数就比较少，又受到贺龙的牵连。而邓小平，不仅在历史上有功于毛泽东，他还是刘邓大军的政治首长，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多曾在他的麾下战斗过，另有一大批地方干部，赵紫阳是其中的一员。另外，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一大批老干部的惨死，也使毛泽东于心有愧。看来，尽管"绝对权威"犹存，也不能不考虑调整政策了。重新起用邓小平，正是这种政策调整的最佳体现。当然，在邓小平复出这件事上，周恩来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很重要的。从二十年代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周恩来与邓小平就是老战友了。

邓小平的复出，对赵紫阳的前途关系重大。他毕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又同是"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可以说是共命运的。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召开的。林彪事件的

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没有改变，也由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干扰破坏，大会不可能总结历史的教训。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虽然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但又认为“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通过的党章也是九大党章的继续。在个别地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东西，如指出“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要求党员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大会选举出中央委员会，一批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斥和打击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赵紫阳也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从而第一次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但是，十大在组织上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九大的错误。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8月30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姚文元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王洪文取得党中央副主席的地位，江青的势力又得到加强。(22)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12月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等人。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12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调八个大军区司令员职务。(23)

在这次对调中，原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到广州军区，丁盛则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后者到任不久就被中共中央宣布“停职检查”。

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24)从此，邓小平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其深远的影响至今不衰。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了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1973年3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要求同时批孔。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江青等人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妄图通过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篡权的目的。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中直机关及国家机关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江青企图把大会讲话录音发至全国，煽起打击周恩来的运动。

由于江青等人的破坏，粉碎林彪集团之后刚刚好转的局势又急剧恶化，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及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大动乱的迹象。心理极端矛盾的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25)

随着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广州军区在林彪事件中的问题被大量揭发出来。许世友出身于红四方面军和第三野战军，1955年获上将军衔。他与林彪作斗争，是十分坚决的。

1974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赵紫阳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从此，赵紫阳又成为广东省的党政第一把手了。他的“官复原职”，意义重大。

于是，在许世友和赵紫阳的领导下，广州军区和广东省批判林彪、黄永胜的运动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

4月24日，《南方日报》发表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的社论，内称：

“林彪反党集团那个曾在广东进行阴谋活动多年的主要成员，长期以来，死心踏地追随他的主子林彪，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在广东建立反革命根据地，蓄谋已久，苦心经营。

……林彪那个法西斯儿子同林彪反党集团在广东的死党，还多次窜到惠阳、汕头等地区的一些边防地带，观察地形，搜集情报。他们在汕头秘密召开反革命黑会，大搞什么'盟誓'、'表忠'，说什么'誓死捍卫'林家父子，'不成功，也要成仁'。他们叫嚷'要发展骨干力量'，'要抓枪杆子，既抓空中，又抓地面'。林彪反党集团那个主要成员及其同伙，在不少地方大量印发林彪那个法西斯儿子的所谓"讲用报告"，以及《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等黑书，数达几十万册，大肆吹嘘，有的地方还强要人家"天天读"。(26)

社论还写道："面对这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到底是'敢'字当头，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还是'怕'字当头，束缚群众的手脚，调和折中，甚至捂盖子，这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现实的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对此，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都要有鲜明的态度，经受严峻的考验。"(27)

4月26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广州市机关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罪行大会上发表讲话。赵紫阳讲道：

"广东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是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一伙妄图建立伪中央，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的地方。当时，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同林彪一伙的关系非常密切，陷得很深。因此，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广东的表现必然是十分尖锐、十分激烈的。但是，由于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批林整风不联系广东的斗争实际，长期捂了盖子。所以，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广东的盖子并没有彻底揭开，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一伙在广东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行和推行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还弄不很清楚，还不那么明朗。因此，我们必须在批林批孔批黄的斗争中，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盖子彻底揭开。"(28)

赵紫阳接着讲道：

"广东有不少地方流传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黄永胜'在广东

时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甚至说什么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以前还是革命的'。散布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继续为黄永胜歌功颂德，是为他们的罪行辩护。有的人所以极力散布这种论调，是同为掩盖他们自己的错误分不开的。还有人以广东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作为借口，不承认广东有林彪、黄永胜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说什么广东对林贼路线，只有抵制而没有受干扰和破坏。他们把广东置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之外，看成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真空地区。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更不符合广东在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中的实际情况。(29)

想当年，黄永胜等人大整赵紫阳，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如今，这些人已成了毫无还手之力的阶下囚。

5月17日，赵紫阳又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批林批孔联系广东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第一，就是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一伙搞反革命阴谋政变的罪行，查清广东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第二，就是要揭发批判他们在广东推行的那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第三，同时要联系各个领域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进行揭发批判。这些，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都是斗争的大方向，目标都是指向林彪反党集团。"(30)

赵紫阳还专门讲到批判林彪、黄永胜与评价广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在当时，他当然不可能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只能强调："不能低估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广东的干扰和破坏。当然首先必须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东始终占统治地位；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东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成绩。但决不能因此认为广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正是为了更好地巩固、

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31)

看来，赵紫阳在掌握斗争策略和方法步骤方面，是运用自如了。明明是肃清林彪、黄永胜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行，却巧妙地说，这正是为了发展"文革"的成果。这么一讲，在北京的毛泽东、江青等人就挑不出什么错了。不然的话，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翻案"的帽子，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这也许是当时中国的畸形政治所产生的政治家自我保护的扭曲性功能。

在"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曾在广东支一派压一派(先支持"红旗派"而打击"东风派"，后又打"红旗"拉"东风")，赵紫阳担心广大群众可能为此发生混战，因此，专门讲道："事实证明，他们(指黄永胜等人)的反动路线，是造成群众分裂、使一些分歧长期不能彻底消除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不管他们镇压的是哪一派的群众，都是镇压了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是原两派群众的共同敌人。原两派的革命群众都应出以公心，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积极地投入这场斗争，团结在一起，共同揭发批判黄永胜一伙的这条反动路线。只有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揭深批透，真相大白，群众中长期存在着的某些分岐的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革命的大团结才能更加巩固和发展。"(32)

赵紫阳强调："斗争锋芒要始终对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一伙，不要指向革命群众、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革命干部，不要层层揪代理人、追随者，扩大打击面。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过去曾经为他们做过一些错事，执行过他们一些东西的人，仍是我们一条战壕里的战友。"(33)

赵紫阳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大局，避免出现混乱，并使知情人勇于揭发问题，使犯错误的人有盼头、有希望。从这里可以看出，赵紫阳是一位头脑冷静的、成熟的政治家。

7月15日，身为广州军区政委的赵紫阳在广州军区部分原支左干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作动员报告。赵紫阳讲道："当前广州地

区运动的任务，还是许司令员说过的，要围绕着林彪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建立反革命根据地这个要害，把盖子彻底揭开。这个问题在军队和地方是一致的。地方经过几个月的运动，群众发动起来了，盖子逐步揭开，取得很大成绩，主要问题是明朗化了，现在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地深入地揭发和清查。"(34)

赵紫阳提出了"揭盖子还是捂盖子"的问题。他说：

"揭盖子还是捂盖子，对揭盖子采取积极态度还是消极态度，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是在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政治态度问题，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把有牵连的事讲清楚，是为了彻底揭发广东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不致留下一点隐患，也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对自己接受经验教训有好处。许多事情，对本人来说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说不清楚，掩盖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问题，就影响清查。林彪反党集团搞阴谋活动，从全国来看，牵连的人和事是有一些的，但真正知道阴谋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对牵连到的人，要具体分析，分清性质。有牵连的人要解除顾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把知道的情况讲清楚，这也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作出了贡献。"(35)

赵紫阳也讲到部队"支左"的问题。他讲道：

"必须肯定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支左的巨大成绩，担负支左工作的同志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了新功的。这次会议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但会议的任务是揭发问题，就势必牵涉到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对支左工作的干扰破坏问题。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把所有揭出来的问题加在一起，对整个支左工作来讲，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支流。对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要清醒，不要因为揭发问题，而否定了军队支左的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要因为要肯定成绩，就不敢去揭发问题；把问题揭发出来，正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肯定和发扬支左的成绩。"(36)

从赵紫阳的这些言论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于揭批林彪集

团，是义无反顾的；另一方面，他十分注意策略，尽量缩小打击面，争取大多数，同时避免自己被冠之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反对解放军”等罪名。在当时，毛泽东仍在极力维护自己“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还在虎视眈眈地提防“走资派”们翻案。

重新就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赵紫阳在大抓揭批林彪、黄永胜的同时，还以很大的精力抓经济工作，特别是抓农业生产。

1974年6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对农村工作的破坏。到会者指出：在“九.一三”事件后，原省委有的领导人仍然坚持错误路线，严禁在批林整风中联系实际，不准通过批林整风去抓好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哪里的批林整风一联系实际，他们就说那里“偏离方向”，扣上“锋芒指向群众”、“矛头向下”的大帽子。(37)

1974年，广东全省夏粮丰收，征购入库比1973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八。(38)全省三千多万亩早稻大面积丰收，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一成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39)这在当时各省的政绩中是名列前茅的。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赵紫阳卓有成效的内行领导关系不浅。赵紫阳虽然在1965年就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但始终未能在农业领域以第一把手的身分大显身手，直到1974年才如愿以偿。

赵紫阳重视副食品生产，在他的主持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专门召开养猪会议。《南方日报》于11月9日发表了题为“分清路线是非，大养其猪”的社论。社论写道：林彪一伙对包括养猪业在内的农村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是严重的，这就使一些地方养猪业的发展缓慢，有的地方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40)社论要求全省党员、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按照党的政策，充分调动集体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养而特养其猪，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具体表现；如果对养猪事业采取消极态度，实际少养甚至不养，那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迷失方

向的具体表现。只要从领导到群众，分清了路线是非，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就会有无穷的智慧，就能战胜一切困难，养猪业的大发展就是指日可待的了。"(41)

在当时，要想"理直气壮"地提倡养猪，还必须大讲一通"路线"和"方向"，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代特征"吧！也许，今天的年轻人对此会感到十分奇怪，但这确是历史的真实。

在北京，江青集团不甘于受到削弱，他们在加紧活动。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42)

9月30日，周恩来抱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4500多人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出席招待会并致祝酒词，受到与会者极其热烈的欢呼。在招待会上，周恩来的讲话每每被暴风雨般的掌声所打断。周恩来的巨大威望，的确达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作为周恩来首席助手的邓小平的威望也在同步增长。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要他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24日，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说："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翌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起用邓小平，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43)

在1974年一年里，身为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赵紫阳还比较频繁地参加一些外事活动。这主要是以主人的身份接待赴广东及路过广东的外国元首和领导人。比如，1974年他就接待了英国首相希思，丹麦首相哈特林，赞比亚总统卡翁

达，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加蓬总统邦戈，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等。这类工作，对于开阔他的眼界，积累他的外事工作经验，无疑是有益的。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44)为了取得政治平衡，同时任命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从1975年1月起，邓小平开始正式主持中央工作。

1975年，广东省的农业生产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早稻丰收，全省三千多万亩早稻，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保持了1974年大丰收时的水平，改变了历史上大雨大减产的状况。(45)赵紫阳在这场抗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庸赘言的。

8月15日，《南方日报》还发表了"一定要抓好晚稻生产"的社论。社论写道："我们要夺得晚稻大幅度增产，需要继续进行一系列艰苦的工作，解决一个个困难，战胜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我们丝毫不应当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而应当拿出比夏收夏种期间更大的干劲，更自觉地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带领广大群众大干苦干，把晚稻大丰收的可能变成现实。如果我们把增产的希望寄托在今年晚稻有一个好天气上面，就会使大干晚稻变成空话，就会浪费极为宝贵的时间。"(46)

在当时，如此强调增产，是要冒被打成"宣扬唯生产论"的风险的。

1975年的秋天，中国的政治局势又处于风雨飘摇的局面。邓小平在主持工作的大半年中，坚持整顿、坚持反派性、坚持安定团结、坚持落实政策，使全国的生产形势和社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的虚伪性和破坏性日益为全国人民所看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怀疑并断定邓小平要"翻案"，又开始将自己的倾向转到江青等人一边。周恩来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已不可能再坚持工作。值此关键时刻，毛泽东的侄子兼政治局"联络员"毛

远新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47)江青集团感到自己的“时辰”来临，又跳出来大干一场。

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1975年10月，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征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同意后，调赵紫阳赴四川工作，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大军区政委。这样，邓小平就在自己第三次失势前夕将自己的家乡、中国第一大省四川的党、政全权交给了赵紫阳。历史已证明，邓小平的这一决策，有着多么深远的意义。

自从1951年4月由河南南下广东，赵紫阳在南粤大地上一共度过了将近二十四个年头。想当初，他刚南下时还是个三十二岁的青年，如今已是五十六岁的人了。岁月既无情又多情，在广东的二十多年时光，使他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吹打，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一个领导者，长期领导着拥有几十万平方公里、几千万人口的大省，肩上的担子的确很重。广东毗连港澳，洋面南风劲吹，得开放风气之先，这对于开阔视野、提高能力，真可谓得天独厚。赵紫阳有幸作为一个省级领导者在广东度过从青年到中年的二十多年时光，其作用，可谓受益无穷。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在“四人帮”倒台之后，赵紫阳之所以能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在中国的改革事业中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这与他长期在广东工作是分不开的。任何在广东主持工作的领导者，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都面临着一个与港澳比较和竞争的严峻问题，并迫使他采取大大不同于中国内地省份的政策和措施。这既是广东的历史，也是广东的现实。

接到新的任命之后，赵紫阳迅速移交了工作，未带家眷，兼程西去，走马蓉城，就任新职。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治蜀”，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大难题。此刻，历史将“治蜀”的重担压到赵紫阳肩上了。他将如何治理四川，人们拭目以待。

(1) 单印章 1974 年 7 月 18 日在广州军区原支左人员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发言，第 20 页。

(2) 同上，第 11 页。

(3) 孔石泉 1972 年 3 月 24 日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4) 王首道 1972 年 3 月 24 日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5) 赵紫阳 1972 年 3 月 24 日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6) 同上。

(7) 同上。

(8)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从林陈反党事件中反映了我们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72 年 5 月 3 日，《中共广东省委文件》粤字(1972)9 号，第 3 页。

(9) 同上，第 13—14 页。

(10) "赵紫阳在广东省农林科技会议上的讲话"，1972 年 7 月 4 日。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南方日报》社论"把秋收分配当做一件大事来抓"，1972 年 11 月 11 日。

(15) 《新中国记事 1949—1984》第 521 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长春版。

(16) "赵紫阳在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 1972 年 3 月 31 日。

(17) 同上。

(18) "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 14 号，第 2 页。"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和古柏四人，均为当时中央苏区的党政军干部，其中毛泽覃为毛泽东的胞弟。

(19) 同上，第 11 页。

(20) 同上，第 12 页。

(21) 同上，第 12—13 页。

(22) 同(15)第 529 页。

(23) 同(15)第 537 页。

(24) "中央通知"1973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 年)44 号，第 1 页。

(25) 同(15)第539——540页。

(26) 《南方日报》社论，1974年4月24日。

(27) 同上。

(28) "赵紫阳在广东省、广州市机关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罪行大会上的讲话"，1974年4月26日。

(29) 同上。

(30) "赵紫阳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1974年5月17日，第3——4页。

(31) 同上，第4页。

(32) 同上，第6页。

(33) 同上，第6页。

(34) "赵紫阳在广州军区部分支左领导干部批林批孔 座谈会上的动员报告。"1974年7月15日。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南方日报》1974年6月24日。

(38) 《南方日报》1974年8月17日。

(39) 同上。

(40) 《南方日报》1974年11月9日。

(41) 同上。

(42) 同(15)，第547页。

(43) 同(15)，第555页。

(44)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5)1号，第1页。

(45) 《南方日报》1975年8月14日。

(46) 《南方日报》社论，1975年8月15日。

(47) 同(15)第574—575页。

第十三章　五年治蜀

1975年10月，在中国政治风云又一次面临急剧变化的前夜。在周恩来和邓小平提议之下，经毛泽东同意，赵紫阳就任了中国最大的一个省——四川省的共产党省委第一书记和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他还被中共中央任命兼任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这个显要的职位。四川省的党、政第一把手都由赵一个人担任。(1)

四川位于中国内陆腹地，西临青藏高原，东有长江三峡，北凭秦岭巴山，南枕云贵高原，总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是日本国面积的1.5倍，中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更重要的，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1982年全省人口9970万，接近日本全国的人口。

四川的行政区划单位之多，也居全国之首。1981年全省有地专级单位1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3个，县级单位191个，是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行省。在中国的各个省区中，唯有四川的省情最体现中国的国情。四川人口众多，东部为汉族聚居的平原和丘陵地区，西部为少数民族（主要为彝族和藏族）聚居的草原和山区。四川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自古以来，"治蜀"被认为是一大学问。同时，四川又是一个难于治理的省份，因此，历史上流传下一句名谚："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当赵紫阳刚刚抵达四川的省会成都着手工作之际，中国政坛又开始了一场大动荡。

1975年11月初，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的批示，围攻刘冰等。从此开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

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2)

对赵紫阳在四川的新任命，显得非常之"巧"，如果晚一个月，甚至晚半个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从这件事看，赵紫阳是幸运的。

调赵紫阳赴四川工作，估计还有以下考虑，即四川本是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即刘邓大军)的"根据地"，在那里工作的许多高级军政干部均出身于第二野战军。这样，调赵紫阳这个出身于第二野战军的干部来主持工作，自然有其方便之处。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充满戏剧性重大事件的 1976 年终于来到了。法国大文豪雨果曾写过一本《九三年》，中国作家有责任写一部《七六年》。1976 年伊始，不平凡的事件就开始了。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毛泽东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

1 月 8 日，在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的去世大大改变了中共中央内部的力量对比，全国局势朝着急剧恶化的方向转变。1 月 11 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八宝山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百万人自动伫立在几十里长街的两旁，冒着严寒为灵车送行。出现了悲壮无比的送灵场景。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言，骨灰将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姚文元的禁令下，《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从 1 月 9 日到 14 日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讣告和悼词，报纸不发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照片和首都百万人民洒泪数十里长街哭送灵车的照片，只发一版关于周恩来生平的照片。姚文元还不

准新华社发行纪念周恩来的新闻照片。(4)所有这一切倒行逆施的做法,大大激怒了全国人民。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5)

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社论未点名地批判邓小平,说邓小平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还在搞“修正主义”。(6)

3月初,中共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点名批判邓小平。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判”。(7)

4月5日,震惊全国、震动世界的“天安门事件”暴发。4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每天都围集着大批工人、学生、干部,甚至有士兵和农民,最多时达到几十万人。人们自发地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并表示对邓小平的支持。4月4日是清明节,首都人民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禁令,涌向天安门广场,声讨“四人帮”,义愤愈益高涨。当晚,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研究连日来天安门前悼念周恩来的事件。华国锋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很恶毒的”。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会议认为,天安门前聚集那么多人,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这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还提出,清明节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应付“更大事端”,其中包括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和公安人员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并且调动卫戍部队在

二线待命。(8)

4月5日，事态更加扩大，出现群众、民兵、警察受伤，“工人民兵指挥部”着火，车辆被砸等。当晚6时半，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声言：“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9时30分，1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和5个营的警卫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对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9)

4月6日凌晨，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此会认定群众的行动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称：“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转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10)

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使人们震惊，更使人们沉思。天安门广场，这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是中国现代史上庄严神圣的广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成了棍棒暴力的“见证人”，成为镇压人民群众的广场，这怎能不令人震惊和沉思呢？

清明节前后，在四川省会成都的市中心，也发生了人民群众自发地向周恩来遗像送花圈的事件，不过规模比北京天安门要小得多了。

天安门事件之后，全中国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在政治高压

下，各地区、各单位都必须召开例行的大会，以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拥护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作为邓小平家乡和第二野战军"大本营"的四川，更是不能例外。

4月8日上午，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市召开拥护"中央两个决议"的大会。作为四川省党、政、军第一把手的赵紫阳，必须在会上表态，于是，他像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第一把手一样，在会上作了其内容大多是引自文件和报刊的讲话。不过，赵紫阳在这个讲话中强调，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进行。这意味着不能象"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搞得"天下大乱"。赵紫阳还强调，"要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实际行动，发展大好形势"。按照当时的"语义学"，这意味着，不放松生产，不让"革命"冲击生产。(11)

大体相同的内容，也贯彻在4月7日中共四川省委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电报之中。(12)这是每个省都必须例行的公事。

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彻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运动。按照统一的布置，中共四川省委、解放军成都部队、机关于5月10日在成都召开"追谣动员大会"，在这个会议上，身为四川党、政、军第一把手的赵紫阳，以不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采取这样的态度，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这个会议只以省委一位书记处书记的发言搪塞了过去。(13)

7月6日，朱德元帅逝世。朱德是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一直担任红军、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是德高望重、军民衷心爱戴的一位领袖。

天灾与人祸并降。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北京有较强震感。这次地震为7.8级，震中烈度为11度，震中地区损失重大，累计死亡242,000余人，重伤164,000余人。(14)

8月16日，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一带发生强列地震。成都市

和甘肃省武都地区有强烈震感。这次地震为7.2级，由于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曾作了预报，中共四川省委在事前采取了防震措施，因而损失较小。(15)

四川地震发生之后，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重心立即转移到抗震救灾方面。8月19日，赵紫阳亲任慰问团团长，离开成都，奔赴灾区。随后，在8月22日和23日，四川又发生了6.7级和7.2级的两次强烈的余震，这使四川省委把主要注意力更加集中到抗震上来。(16)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中国现代史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在战乱中统一了中国，的确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在毛泽东身上，集真理和谬误，伟大与荒唐于一体。毛泽东曾是时代的大英雄，曾在中华大地上一领风骚数十年。但到了晚年，他的确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障碍。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不管人们是否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一点。

在同一天，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电报，深切哀悼毛泽东逝世。电报称："在这无比悲痛的时刻，四川各族人民无限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他老人家率领工农红军，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是他老人家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的关键时刻，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亲临重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美蒋反动派'假和谈、真战争'的阴谋。"(17)

9月18日，北京一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毛泽东的大会，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同一天，成都也举行了五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大会由解放军成都部队司令员刘兴元主持，赵紫阳致悼词。(18)

就在1976年间，赵紫阳的老母亲刘氏，也在河南老家去世了。这位享年近八十岁的老太太，经历了多少风吹雨打，终于没有活过

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结束。在当时那种动荡不定，危机起伏的局面下，赵紫阳也无法返乡奔丧，只能眺望东北老家的方向，遥致哀思。

毛泽东逝世之后，江青集团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这样，便与华国锋发生尖锐的矛盾。10月7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为反党集团，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从而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这个世界史上的怪现象。

10月20日，北京正式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21日，北京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集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23日，同北京及全国所有省份一样，四川省和成都部队八十万军民举行集会和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赵紫阳在这个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我省八千万军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大家都说：除了四人帮，挖了祸根，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19)

的确，一旦江青集团上了台，赵紫阳这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过的"走资派"，是决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对此赵紫阳心中有数。

11月20日，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召开"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赵紫阳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说：

"我们四川这些年来，深受'四人帮'之害。……'四人帮'是四川几经反复，蜀无宁日的总祸根，是破坏四川革命和生产的罪魁祸首。他们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我们要怀着深仇大恨，对'四人帮'的

罪行彻底地揭，狠狠地批，坚决地斗！(20)

赵紫阳在讲到对"四人帮"深批狠揭的同时，也谈到：

"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共同对敌。……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帐，不要一棍子打死。"(21)

赵紫阳一方面说"四人帮"是"蜀无宁日的总祸根"，要求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另一方面，他要求人们注意政策，防止过火斗争。看来，经过长期的磨练，赵紫阳的政策思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的确，凡事一过份，就会产生副作用，正所谓"过犹不及"。

1977年1月8日上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大会，隆重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赵紫阳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说："敬爱的周总理对四川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四川的革命和建设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怎能忘记，在万里长征的艰苦岁月中，敬爱的总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奔向抗日前方，茫茫的雪山草地，留下了总理的光辉足迹。我们怎能忘记，在那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敬爱的总理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肩负历史重任，来到山城重庆，整整七年零六个月，战斗在敌人的心脏，红岩村、曾家岩，到处铭刻着总理的不朽业绩。"(22)

赵紫阳还在讲话中怒斥了"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迫害。他讲道："十恶不赦的'四人帮'，把敬爱的总理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在总理生前，他们疯狂地反对、无耻地陷害我们敬爱的总理；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利用窃取的权力，下禁令，施高压，压制和破坏我们开展悼念活动。'四人帮'的丑恶表演，犹如狂犬吠日，蚍蜉撼树。总理这棵参天的劲松是砍不倒的。人们

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是割不断的。总理的光辉业绩，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永远磨灭不了的。‘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化作汹涌奔腾的怒涛，把这伙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彻底埋葬！”(23)

当一年前周恩来逝世时，囿于当时险恶的局势，赵紫阳无法公开地、庄严地悼念周恩来。而一年后，飞速发展的形势就使赵紫阳的愿望成为现实了。回想起1967年5月，当赵紫阳在广东身陷造反派围攻的最困难的时刻，是周恩来亲自下指示，才使他幸免于更残酷的打击，终于“熬”过了那场大劫难。后来，1971年，又是周恩来提议“解放”他，使他得以赴内蒙工作，随后又返回广东主持工作，并来四川主持工作。所有这些，赵紫阳都感念于心。周恩来虽然去世了，但邓小平还健在。赵紫阳当然希望邓小平能够尽快摆脱“继续批邓”的厄运，重新出山。

大约在此时，赵紫阳又兼任了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的第一政治委员，从而在四川成为党、政、军三个方面的第一把手。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首次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社论强调指出，要一切服从华国锋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际上，早在粉碎“四人帮”不久，华国锋就提出了“两个凡是”。1976年10月26日，他在听取宣传口汇报时就说过：目前主要是批“四人帮”，也要批邓，一定要注意，毛泽东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不能批。(24)华国锋的这个立场，严重地阻碍了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因为“文革”不仅是毛泽东“批准”的，而且是毛泽东特别重视的。在华看来，让他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所以，为了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就必须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

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指出：“我

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时，邓小平也表示了希望重新出来工作的愿望。(25)5 月 3 日，党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意见。

7 月 16 日至 21 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 4 项决议：1. 关于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2. 关于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的决议；3. 关于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4. 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定。(26)

7 月 23 日，成都市三十万军民举行大会，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赵紫阳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在报告中专门讲到恢复邓小平职务的问题。他说："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恢复邓小平同志的职务，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心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标志着我们党更加团结和巩固，更加兴旺发达。我们坚决拥护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27)

对于邓小平的再次复出，赵紫阳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喜悦和振奋。而此时的华国锋，正陶醉于人们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之中，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坐"江山"只剩下一、二年的日子了。

在这个时候，尽管政治局势日益好转，赵紫阳在四川所面临的经济局势却是非常严峻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由于"文革"前的几次折腾，加之人口激增，生态破坏等原因，使得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到 1976 年已饱受饥饿之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已走到尽

头，回春乏术了。

1976年，四川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为508亿斤，其中水稻仅253亿斤，小麦、玉米、红苕等杂粮占百分之四十。(28)全省粮食平均亩产仅325斤，其中水稻平均亩产为473斤，农民人均年收入人民币53.6元，明显低于全国63.4元的平均水平。四川农民全年人均口粮仅369斤，比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尚低40斤。(29)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川的许多农村已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一些地方，四川的一个农村姑娘，只值区区几十元钱或一两百斤粮票，谁肯付出这一代价，就嫁给谁。确实，将近一亿四川人的吃饭问题，是摆在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面前的首要问题。

为此，在1977年上半年，赵紫阳走遍川西平原、长江两岸及边远山区的三十多个县市，作实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摸索增产粮食的办法。(30)在当时，整个政治局势还不允许搞联产责任制或包产到户，而只能继续采用"大干社会主义"、"农业学大寨"等口号。但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四川加强了对农业的经营管理，改善了按劳分配办法。结果，四川1977年夏收作物全面丰收，开创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大丰收。(31)

接着，四川省1977年的秋季农作物又获得全面丰收。这两次丰收大大地改变了四川农业的被动局面。

8月12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面加以肯定，因面党的十一大未能从理论上和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虽然对十大的党章作了一些修改，但还保留了九大、十大党章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提法。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成员，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并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32)

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次按姓氏笔划排列在陈慕华之后，赛福鼎之前。(33)这样，从十一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这个“政治待遇”，是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上的人才享有的。

12月15日，赵紫阳在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题为“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十一大路线，为把我省建设成为祖国巩固的战略后方基地而奋斗”。

在报告中，赵紫阳满意地宣称，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抓纲治蜀”已经“初见成效”。(34)

赵紫阳在报告中指出：“一九七八年要进一步打好农业翻身仗，高速发展我省农业，首先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抓路线，抓阶级斗争，同时还必须解决好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农田基本建设，二是科学种田，三是支农工业，四是多种经营。这四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要因地制宜，全面抓好。”(35)

他还讲道：“现在农业上面临着一个带有全省性的突出问题，就是由于秋旱严重，蓄水普遍减少，干田面积扩大。这个问题处理得好不好，对明年农业生产有决定性的影响。今秋以来，各地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扩大了小春面积，明年大春怎么办？是等水栽田，还是改种旱粮？许多社、队的经验证明，在蓄水少、干田多，水利又没有过关的情况下，要早下决心，早作准备，走旱路走到底，这样就可以大幅度增产。这是关系到明年能不能夺取大丰收的带有战略性的措施，决不能犹豫徘徊，举棋不定。”(36)

在这里，赵紫阳讲到四川农业发展的一个“诀窍”，即“水路不通走旱路”。四川历史上水稻面积较大，但历来旱情严重，往往大量减产。为了提高产量，解决吃饭的问题，四川省委在赵紫阳的主持下，要求各地在不利于种水稻的地方一律改种玉米等旱粮作物。结果，这个措施成为四川粮食过关的一大保证。

1978年《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了赵紫阳题为“奋发努力加快

四川建设，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长篇文章。显然，中共中央此时为“蜀中大治”而感到高兴。

在文章中，赵紫阳写道：“四川建设速度必须加快，也是完全可能加快的。一九七七年春天，面对‘四人帮’破坏带来的严重困难，有些同志对四川能不能迅速搞上去，信心不足。经过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全省形势急转直上。接着，贯彻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党的十一大精神，形势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工农业生产恢复之快，增长幅度之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37)

此时，赵紫阳开始强调落实农业政策这一重要问题。这种对政策的落实，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他写道：“农业丰收了，在分配上要做到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一定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使社员得到实惠。……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目前生产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集体的积累、储备等一定不要提留太多，以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口粮水平低的社队，社员分粮一定要比上年增加一些。(38)

1978 年初，中共四川省委下达《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规定》提出：“生产队要搞好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生产计划管理。各地都把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当成一件大事认真抓起来，严格按照社员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评定工分。”(39)这个《规定》集中抓住了经济政策的落实和经营管理制度的建立，因而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增产不增收、多劳不多得、分配不兑现等问题。由于农村经济政策的逐步贯彻落实，群众精神振奋，干劲倍增。基层干部说：“人喊人，喊不成，政策喊入一大群。”社员说：“只要政策过了硬，一人要顶两人用。”(40)实际上，《规定》否定了所谓大寨式自报自记的记工分方法。

1977 年，四川全省大多数地区做到了队增产增收、增贡献、增积累、增储备，社员增分配、增口粮。同 1976 年比较，全省平均每个社员口粮增加了六十六斤，现金分配增加了九元六角。这是近十

年来未曾有过的鼓舞人心的新气象。(41)

1978年6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指示》。指示提出:"必须狠抓集体副业的发展,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要继续贯彻'积极发展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大力促进养猪业的发展。大队、生产队要充分利用果园、茶园、林场、猪场、牛场、水田、塘堰等有利条件,积极发展小家禽家畜和养鱼。要鼓励社员养牛、养兔、养鸡、养鸭、养鹅。对于那些任意规定'限、打、毒、罚'等限养、禁养的'土政策',要向群众公开宣布,一律作废。"(42)

的确,那些对农民养猪、羊、鸡、鸭进行"限、打、毒、罚"的"土政策",简直是荒唐透顶。据说,当时竟有五、六岁的农村小娃娃不认识鸡、鸭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因为"政策"严禁农民喂养。这种"纯洁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摧毁农村的生产力!

由于落实了政策,下达了规定,加之采取了正确的农业发展战略,四川省1978年的夏收又一次获得大丰收,多年吃不饱的肚子开始填饱了。这个变化,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却有着重大意义。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四川农村广泛流传着后来风靡华夏的那句名谚:"要吃粮,找紫阳"。

1978年夏季。北京正在进行着另一场关系到中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大争论。争论双方的领导者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正副主席——华国锋和邓小平。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全国性的大讨论。这是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重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43)

然而,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这篇文章,说文章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批评刊登这篇文章的报社

负责人没有党性，甚至提出“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的质问。他还针对当时全党要求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潮流，提出三句话，叫做：一不要砍旗子，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争论便展开了。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尖锐地批判了那种把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论点。但是，华国锋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仍然采取压制的态度。6 月 2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所提出的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支持。9 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再次明确批评“两个凡是”，认为它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从 6 月到 11 月，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这一讨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44)

1978 年秋，中共安徽省委决定，把集体无法播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种菜。这个办法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加快了秋种进度。在借地的基础上，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组，有的搞了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群众创造的这些办法，得到了省委的支持。3 个月内，全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就发展到 41,000 多个，约占生产队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与此同时，四川省委在农业方面，也实行了“放宽政策”、“休养生息”的方针，将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并且支持农民采取包产到组的形式经营土地。这是中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初的试验。(45)

1978 年 8 月，赵紫阳与华国锋、纪登奎一同出访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三国。这是赵紫阳第一次出国访问，踏上外国的国

士。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宣布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全会还要求：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问题；加快农业的发展。

三中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以及平反“61人案件”。全会着重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全会增选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46)

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华国锋体制(也可视为毛泽东晚年体制的继续)的失败和邓小平体制的胜利，从而使中国走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1979年1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会议根据三中全会精神，确认：“多年来，一股劲地反右，造成一种恐‘右’的社会心理。实际上，过去反的‘右’，很多并不是右，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实事求是。恐‘右’病实际上是多年来‘左’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阴影。这种精神状态，使得我们不少同志对当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办法，执行起来犹豫徘徊，怕又说‘右’了。不解决恐‘右’病，就不能改变这种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会被窒息，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47)

1月24日，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承认差别、鼓励冒尖》。文章论述了"冒尖"的必然性和优点，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48)

2月10日，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必须贯彻休养生息方针，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49)

他接着讲道："要坚决从各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进一步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严格的经济奖惩制，认真搞好定额管理、评工记分，使干部和社员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坚决克服平均主义"。(50)

看来，在这个时期，赵紫阳对发展农业的思路已趋于完善。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也讲到了工业问题。他说："改革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发挥中央、地方、部门和企业几方面的积极性，特别是要使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逐步把以产定销改为以需定产；运用价值规律，发挥价格、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的作用；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的原则，使企业和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经营的好坏，关心企业的利润和积累；精简行政机构，建立专业公司和联合公司，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各种经济组织的作用，等等。"(51)

在这里，赵紫阳对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改革问题，也有着比较深刻的见解。

赵紫阳还谈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胆进入国际市场等问题。(52)

早在广东主持工作期间，赵紫阳就对国际市场很感兴趣，曾表示对日本的外贸立国很欣赏。在"文革"中，他还为此受到批判。看来，争取进入国际市场这个思想，在赵紫阳头脑中早有酝酿。

在赵紫阳的大力推动下，四川的农业一年比一年强。1977年

粮食总产量比1976年增产60亿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产40亿斤。两年共增产100亿斤，等于农业人口每人增产124斤，农副业总收入1977年比1976年增加12亿元，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11.5亿元，农业人口人均收入达到71.9元，人均口粮1977年比1976年增加66斤，1978年又比1977年增加58斤，两年共增加124斤，达到493斤。(53)这就是说，每一个农民一年可以多吃124斤粮食，这意味着八千万人口免于饥饿。

5月22日，赵紫阳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届二次全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他说："我们坚持三中全会精神，一方面要坚持不懈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流毒；另一方面要同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斗争。但从党内尤其是高中级干部的思想状况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思想比较容易统一，而要继续解放思想，则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特别是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个现代化的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更不够了。这是要用很长时间，花很大力气才能解决的"。(5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赵紫阳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列的。他对党内高中级干部思想状况的分析，也是中肯的。

1979年春季和夏季，四川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开始全面推行。1978年四川一部分地区已经在省委倡导之下推行了"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55)对于这项工作，赵紫阳早在1962年的广东就干过了，本是驾轻就熟的。

5月30日，《四川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生产责任制一定要搞好》。文章指出："生产责任制，把社员个人的物质利益和增加集体生产、发展集体经济紧密联系起来，使社员既关心自己的工分，更关心集体的产量，从而更加注重农活质量，积极推广先进措施，提高劳动工效，节省生产费用，争取更大的增产效益，这无论在小春生产、春耕春播或夏收夏种中，都已经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由此

可见，这种生产责任制适合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员的觉悟程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在定额记工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根本不是什么'右倾倒退'"(56)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推行，进一步解放了四川省的农业生产力，四川终于彻底摆脱饥饿了。要知道，这个省有一万万张嘴！

由于治蜀有方，赵紫阳声望日隆。"要吃粮，找紫阳"这句民谚，也使他增光不少。于是，在9月25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选为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57)

1979年11月，赵紫阳在四川省地州县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右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维护安定团结"。(58)

在这次讲话中，赵紫阳还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是我们全党的中心任务。要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就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脚踏实地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从我省的情况看，在经济领域中，继续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到四化建设所需要的高度，仍然是个大的问题。"(59)

即使在1979年，讲"经济是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这样的话，也需要有较大的勇气和见识。而赵紫阳就这么讲了。

赵紫阳又讲道："我们搞经济建设，当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我们有很多糊涂观念，框框太多，附加了很多本来不是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东西，却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拜倒在那里，思想解放不了。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发展趋势的解剖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这样一些有严格科学依据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事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60)

赵紫阳的这席话，是讲得有道理的。

1980年伊始，《红旗》杂志便在第一期刊登赵紫阳的长文《研

究新情况，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

在这篇文章中，赵紫阳指出，四川农业的增产，主要是靠政策，靠科学。他写道："今后几年内，农业增产主要靠政策、靠科学。农业基本建设和机械化，只能根据整个国家财力、物力有步骤进行。政策问题，由于多年来'左'的流毒比较深，发挥政策的作用、潜力还很大。不要以为我们这几年经过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个潜力已经没有了。政策问题，主要是如何进一步调动生产队的积极性和农民的积极性。(61)

赵紫阳在讲到经济调整问题时说："过去经济工作中矛盾的焦点，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过多，挤了农业，挤了轻工业，挤了人民生活。调整的关键是要压积累，下基建，加强薄弱环节。在这个问题上，要下最大的决心，不能小调，要大调，要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压缩长线，加强短线。"(62)

赵紫阳的这篇文章虽然谈的是四川的问题，却具有全局的意义。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赵紫阳既能较好地治蜀，他也就能较好地管理全国的经济工作。可以肯定，赵紫阳主持四川经济工作的成就，对于他日后出任国务院总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四川的粮食总产量，1976 年是 508.4 亿斤，1979 年则为 672.3 亿斤，增加 164 亿斤。1976 年平均亩产 473 斤，1979 年为 637 斤，增加 164 斤。1976 年农村人均口粮 369.1 斤，1979 年为 522 斤，增加 152 斤。1976 年的水平比全国人均口粮低 40 斤，1979 年则高于全国人均口粮 34 斤。(63)

从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中，人们自然能看出四川的巨变。更应记住，这一切，发生在一个具有一亿人口的大省。以上数字也就是"要吃粮，找紫阳"这个民谚的具体内容。

据笔者前两年赴四川调查研究时所接触到的当地干部称，他们一直十分怀念七十年代末赵紫阳治蜀的时光，还说，当时真是天

时、地利加人和，一年一大步，一年一变样。对此，赵紫阳在十三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答美国记者问时谦虚地说："人们把我在四川的经历传奇化了。"总之，五年治蜀（实际为四年多）时期，是赵紫阳生平中的重要时期，它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治蜀的成功，尔后赵紫阳便不可能出任国务院总理，从而也就不会在今天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80年2月，赵紫阳奉召离开四川赴北京工作。这是赵紫阳头一次离开地方到中央工作。种种迹象表明，他将作为最年轻的一名成员进入中国的最高权力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党史通讯》1984年第9期第12页。

（2） 《新中国纪事1949——1984》第567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版。

（3）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76年1月1日。

（4） 同（2）第579——580页。

（5） 同（2）第580页。

（6） 《人民日报》1976年2月17日。

（7） 《人民日报》1976年3月10日。

（8） 同（2）第582——583页。

（9） 同（2）第583页。

（10） 同（2）第583——584页，又见《人民日报》1976年4月7日。

（11） 《四川日报》1976年4月8日。

（12） 《四川日报》1976年4月13日。

（13） 《四川日报》1976年5月11日。

（14） 同（2）第589页。

（15） 《四川日报》1976年8月17日。

（16） 《四川日报》1976年8月20日。

（17） 《四川日报》1976年9月14日。

（18） 《四川日报》1976年9月19日。

(19) 《四川日报》1976年10月24日。

(20) 《四川日报》1976年11月22日。

(21) 同上。

(22) 《四川日报》1977年1月9日。

(23) 同上。

(24)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77年2月7日。

(25) 同(2)第605页。

(26) 同(2)第608页。

(27) 《四川日报》1977年7月24日。

(28)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编《四川省情》第138——139页、14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成都版。

(29) 同上,第225、227页。

(30) 《四川日报》1977年6月12日。

(31) 同上。

(32) 同(2)610页。

(33)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653页,红旗出版社1983年北京版。

(34) 《四川日报》1977年12月12日。

(35) 同上。

(36) 同(34)。

(37)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78年第1期。

(38) 同上。

(39) 《四川日报》1978年6月14日。

(40) 《四川日报》1978年5月9日。

(41) 《四川日报》1978年6月14日。

(42) 《四川日报》1978年6月30日。

(43) 《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

(44) 同(2)第629页。

(45) 同(2)第639页。

(46) 同(2)第646——647页。

(47) 《四川日报》1979年1月22日。

(48) 《四川日报》1979年1月24日。

(49) 《四川日报》1979年2月15日。

(50) 同上。

(51) 同(49)。

(52) 同(49)。

(53) 《四川日报》1979年3月22日,4月26日。

(54) 《四川日报》1979年5月23日。

(55) 《四川日报》1979年5月30日。

(56) 《四川日报》1979年5月30日。

(57) 同(33)第654页。

(58) 《四川日报》1979年11月10日。

(59) 同上。

(60) 同上。

(61) 《红旗》杂志,1980年第1期。

(62) 同上。

(63) 同(28)第138页,第227页。

第十四章　国务院总理

1980年2月，赵紫阳告别了工作过五个年头并为自己赢得巨大声誉的四川省，起程赴京。首都等待着他的，是灿烂的前程。

2月23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出席了会议，并作了讲话。会议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恢复党的八大决定设立的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

实际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核心，已经决定由赵紫阳在不久的将来接替华国锋所兼任的总理职务。看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一致认为，赵紫阳治理广东、特别是治理四川的政绩，表明他能够胜任国务院总理的重任。当时，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中，起决定作用的人已是邓小平。邓小平对赵紫阳自然是了解和信任的。尤其令邓小平感动的，是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冲击之下，仍然能尽力维护党的原则，并在短短几年之中，一举将自己那多灾多难的家乡大省改变了面貌。其次，叶剑英当时在中央拥有相当重大的影响。此时的叶剑英，仍对赵紫阳当年在广东的作为深有好感。赵紫阳当时年方六十周岁，这个年龄，在当时中共中央最高层领导中，算是相当年轻的了。赵紫阳不仅有年龄优势，而且有资历优势，他有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日战争中担任地委书记，解放战争中担任区党委(即省委)副书记的资历和十五年前即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资格，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罕见的。据作者分析，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赵紫阳在1980年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国务院总理。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从任命为副总理的那一天起，赵紫阳便接替华国锋兼任的总理职务了。前此，华国锋已将总理的常务工作交由纪登奎负责。就在这次会议上，纪登奎由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被免去了副总理职务。想当年，赵紫阳曾与纪登奎一块在滑县搞农民民生斗争，现如今，却一个走马上任，一个悄然退下。政治上的升迁荣辱，就是如此。后来，纪登奎被安排在国务院下属的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任部长级研究员。

7月30日，中共中央就“少宣传个人”的问题，向全党发出指示，并作出五条规定。(2)这些规定，在当时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特别是针对继毛泽东之后又被冠以“英明领袖”称号的华国锋的。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会议决定向全国人大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总理职务。(3)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接受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任命赵紫阳为新的总理。至此，赵紫阳正式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任总理。在总理这个至关重要的岗位上，他的管理才能和领导艺术可以尽情地施展了。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座谈会充分肯定了各地干部和社员群众所建立的小段包工和包工包产等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但规定只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搞包产到户。这表明当时对承包责任制的性质、范围和优越性的认识，还存在局限性。(4)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主要错误。华国锋在会

上被迫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的请求。会议指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是有功劳的，应当肯定；但对此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会议认为，华国锋的错误是：提出“两个凡是”这个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在十一大前后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对解放党内大批老干部、平反历史上大批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反党内大多数人的愿望；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对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所造成的严重损失负有重要的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所必备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务是不适当的。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决议：向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在六中全会以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5)

至此，在特定历史时期显赫一时的华国锋，便最终失势了。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团结。陈云、赵紫阳、邓小平等人先后在会上讲话。赵紫阳在讲到调整国民经济问题时指出：在扭转国民经济被动状况的重大调整措施上，要高度集中统一，要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过去我们走的是一条重基建轻生产、高积累低效率的道路，表面上看生产的增长速度并不慢，但是真正创造的社会财富少，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上基本建设，而是主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果。(6)

赵紫阳着重强调：“大家知道，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比例的失调，爆发了危机，不得不进行大调整，费了五

年的时间。那时把困难渡过去了，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得到清理，经济情况一好转，老的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又继续贯彻执行起来，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前两年，以致又一次酿成了比例的严重失调，潜伏着新的危险。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把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端正过来，并且坚持下去。”(7)

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通过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样，赵紫阳便担任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

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在肯定调整国民经济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根据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制定我国经济建设方针的指导思想。会议经过讨论，批准了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8)

1982年2月20日至3月4日，全国工业交通会议在天津召开。3月4日，赵紫阳在闭幕会上发表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指出：把各项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道路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关键；国民经济必须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实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会议制定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具体措施。(9)

2月22日至3月8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3月2日赵紫阳在会上作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决定原则上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初步方案。(10)

5月4日，国务院提议，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成立国家经

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兼任主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改革的总体规划，加强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和协调工作。(11)

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9月12日至13日，“十二大”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大”一中全会是由胡耀邦和赵紫阳二人共同主持的。“十二大”确立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邓、胡、赵”领导体制。很明显，赵紫阳作为比较年轻的领导人，处于胡耀邦之后第二名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的“接班人”。七十八岁的邓小平是全党、全国无可争议的“掌舵人”和“政治设计师”。

“十二大”以后，赵紫阳又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科学技术方面。10月24日，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强调经济振兴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进步。(12)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的通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任组长，方毅、宋平任副组长。(13)

11月30日，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在第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作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在报告中，赵紫阳又一次专门强调防止冒进的问题。(14)

1983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社论指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的新形式，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它既不同于“大锅饭”的模式，又区别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使集体的优越性和个人的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15)这里所讲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就是指广大农民简称的“包产到户”。

应当指出，在这个“伟大创造”中，也有赵紫阳的一份不小的贡献。他从六十年代初就在广东农村试行推广过“联系产量责任制”，这一名称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巧合”，说明赵紫阳早在二十年前就抓住了农业问题的要害。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此大吃苦头，饱受批斗。如今，“包产到户”作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一项“创举”，终于获得了举世公认的赞扬。赵紫阳理所当然地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6月6日至21日，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会议决定：赵紫阳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并对他主持的国务院工作表示满意。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姚依林继续留任；任命李鹏和田纪云为副总理。(16)

1984年4月26日至5月1日，美国总统里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里根总统是中美两国自1979年建交以来访问中国的第一位在职美国总统。27日下午，赵紫阳总理同里根总统就双边关系举行会谈。赵紫阳指出，中美关系主要障碍仍然是台湾问题，美国应减少并停止售台武器。里根重申，美国政府将信守中美两国发表的三项公报，无意干涉中国内政。(17)

9月9日，赵紫阳致函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就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三个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在信中，赵紫阳在多年实践和反复考虑的基础上，建议把中国的计划体制概括为如下四层意思：

“(一)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二)自发地盲目地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生产和交换，只限于小商品、三类农副产品和服务修理行业，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辅助作用。

(三)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我国幅员辽阔，现代化手段不发

达，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编制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不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指导性计划主要用经济手段调节，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考虑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要运用价值规律为计划服务。'计划第一，价值规律第二'这一表述并不确切，今后不宜继续沿用。应该如实地把两者统一起来，而不要把它们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18)

赵紫阳的以上归纳，比较明确地澄清了长期以来人们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混乱思想。

赵紫阳在信中还指出："看来，明确以上四条，可以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既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相区别，又不与旧的模式相雷同。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但旧的模式清规戒律太盛，把企业捆得紧紧的，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企业失去了活力。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该是有活力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计划经济，应该是自觉依据并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19)

赵紫阳的上述看法，得到另外四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同意。邓小平很欣赏此信，专门作了指示，认为写得很好，并同意将此信在全党范围内转发传达。想当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春天，当邓小平第一次专门召见赵紫阳之后，就在自己领导的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范围内转发了赵紫阳撰写的关于滑县土地斗争典型经验的长文。如今，在将近四十年之后，邓小平又一次批准转发了赵紫阳致中央常委的信。这两件技术程序相同的事件，却具有不相同的作用。

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20)

赵紫阳是起草《决定》的实际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决定》起草的全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12 月 18 日至 20 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19 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由赵紫阳总理和撒切尔夫人在北京正式签字。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专程来京的一百零一位香港各界人士参加了签字仪式的观礼。《联合声明》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的问题，也为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基础。(21)

1985 年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美国《大西洋》杂志 1984 年 11 月号刊登的赵紫阳的文章《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篇文章中，赵紫阳介绍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过程、施行原因及其长期稳定性。(22)

1 月 31 日，赵紫阳发表文章阐述了放开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产品生产，给农民以实惠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强调了必须加速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23)

3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作了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24)

9 月 18 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开幕会上作《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设的说明》。(25)

会议同意叶剑英、邓颖超、黄克诚等老干部提出的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请求，并向这些老干部们发电致敬。

12 月 18 日，赵紫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认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并强调，“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是指导农业生产的根本方针。他要求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还指出，对于改革中发生的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绝不能倒退。(26)

赵紫阳对引进外国资金问题十分重视。1986年8月7日，赵紫阳在会见日本、美国、西德和英国工业、金融界人士时，就中国可以给予外商的投资以特别优惠的问题，提出了几种积极的设想。(27)

从1980年至1986年，在就任国务院总理期间，赵紫阳多次到全国各地视察，足迹遍中华。据很不完全的统计，他的视察包括：

1981年7月25日至26日，赵紫阳三次乘舰艇出海看望海军驻山东烟台的部队。(28)

8月14日至18日，赵紫阳视察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29)

9月19日，赵紫阳与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观看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的现代化演习，检阅参加演习的部队。(30)

10月1日至2日，国庆节期间，赵紫阳视察河北省引滦河入天津的重点工程——潘家口水库工地，看望担负工程建设的工程兵指战员。(31)

1982年1月8日至22日，赵紫阳赴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进行有关工农业生产、城市及农村改革的调查研究。(32)

3月3日至7月，赵紫阳赴天津市和河北省唐山市进行调查研究。(33)

7月18日至30日，赵紫阳赴甘肃、青海和宁夏等省、自治区对农牧业及民族问题作调查研究。(34)

8月22日至27日，赵紫阳赴辽宁省对工农业生产问题作调查研究。(35)

1983年3月下旬，赵紫阳视察陕西省。(36)

7月8日至11日，赵紫阳赴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增强团结，搞好建设”的讲话。(37)

7月27日，赵紫阳再一次视察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引滦河入津工程。(38)

8月8日至22日，赵紫阳远赴新疆自治区视察。赵紫阳乘直升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到达新疆的全部地区和自治州。(39)

10月27日，赵紫阳赴福建省调查研究经济建设问题。(40)

1984年1月27日，赵紫阳赴上海市视察。(41)

3月上旬至中旬，赵紫阳赴湖南、贵州两省的一些地区和四川省重庆市考察。(42)

4月8日至13日，赵紫阳先后赴辽宁省的鞍山、营口、锦州和辽河油田视察。(43)

1985年1月26日至30日，赵紫阳赴山西省雁北地区和大同市就乡镇煤矿的发展问题进行考察。(44)

2月20日，赵紫阳在隆冬赴黑龙江林区视察，并与当地军民一同欢度春节。(45)

11月26日，赵紫阳赴上海市宝山县视察，并为宝山钢铁公司第一期工程投产仪式剪彩。(46)

12月21日至26日，赵紫阳赴河南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等地作调查研究。(47)

12月30日，赵紫阳再次赴河北省唐山市进行调查研究。(48)

1986年2月5日至14日，赵紫阳视察海南岛，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和建设的设想，并在海南苗寨与当地军民一起欢度春节。(49)

除了在国内各地视察外，作为国务院总理的重要工作之一，赵紫阳还频繁地出访世界各国。几年间，他的足迹踏遍五大洲。据统计，赵紫阳出访了以下各国：

1981年1月26日至2月2日，赵紫阳访问缅甸、泰国，讨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发展双边关系问题。(50)

6月1日至8日，赵紫阳访问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孟加拉三国。6月2日，赵紫阳参观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阿富汗难民营，重申中国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抗击苏军侵略阿富汗的正义斗争。(51)

8月6日至13日，赵紫阳访问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回国途中还在曼谷机场与泰国总理举行会谈。(52)

10月24日至27日，赵紫阳出访墨西哥，与波蒂略总统会谈。(53)

12月20日至24日，赵紫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54)

1982年12月20日至1983年1月17日，赵紫阳访问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加蓬、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十一国。(55)这是继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出访非洲十国之后，中国政府首脑又一次对非洲众多国家进行访问。(56)

1983年4月12日至23日，赵紫阳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56)

1984年1月，赵紫阳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10日赵紫阳总理同里根总统举行会谈，就中美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赵紫阳说，中国政府准备以最宽厚的态度来实现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好商量。(57)

5月30日至6月16日，赵紫阳出访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和意大利等西欧六国。(58)

1985年6月2日至19日，赵紫阳出访英国、联邦德国和荷兰三国，与三国政府首脑会谈。(59)

1985年10月21日至28日，赵紫阳赴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24日，他在联合国特别大会上发表讲话。赵紫

阳还会见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60)

10月28日至11月12日,赵紫阳在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之后,访问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五国。并分别与五国政府首脑会谈。(61)

1986年7月3日至27日,赵紫阳连续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和突尼斯等六个欧洲、非洲国家,与六国政府首脑会谈。(62)

作为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于3月17日就"国际和平年"向世界各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大家知道,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关系到全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两大根本问题。各国人民深深懂得:没有和平,就不会有发展,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几年来,我访问了六大洲的许多国家,在国内也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朋友。在这些交往中,各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与反对军备竞赛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同时我也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与裁军的强烈愿望和诚意。去年中国政府宣布裁减百万兵员的决定,就是中国人民支持和平与裁军事业的一个实际行动。(63)

在这次广播讲话中,赵紫阳代表政府表明中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强烈愿望。人们知道,中国宣传机构在推行"左"倾政策时期,曾宣扬"战争不可避免"、"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等等,因此,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形象一直欠佳,被世界上一些人视为"好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中国政府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高举起维护和平的旗帜。

3月21日,赵紫阳在"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上讲话,阐明中国政府在和平和裁军等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他说:"中国需要和平,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和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只有进行和平建设才能繁荣昌盛。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经济上接近

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待于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我们不但需要本世纪的和平，也需要下一个世纪的和平。(64)

这样，中国的一个新的完整和和平形象便树立起来了。

在出任国务院总理将近六年的时间里，赵紫阳还多次会见和迎送来访的各国元首，与他们会谈、签约。在这些国务活动中，赵紫阳稳重的风度和机智的言谈，给各国客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赵紫阳在这类活动中的形象和话语，还通过电视、广播等大众传播工具，输入到全国和世界人民的视觉和听觉之中，为中国赢得了大批朋友。

赵紫阳在就任总理期间，还广泛地、放手地使用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这批中青年学者，主要分布在国务院下属的各研究机构之中，也分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之中。他们与以往那些在"左"倾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理论工作者大不相同，他们视野开阔，乐于吸收世界各国的科学成果，敢于提出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看法。赵紫阳熟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他们有所偏爱，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无疑，这批人更能适应现代化经济建设的要求。

赵紫阳在作出社会经济决策之前，总要不同程度地会见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他在赴外地调查研究时，也往往找几位年轻的学者同行，以便不时倾听年轻人的意见。可以说，赵紫阳是头一个真正重视中青年学者意见的中共最高领导者。这些中青年学者对赵紫阳已经产生了充分信赖的感情。赵紫阳已成为他们真正佩服的领导人之一。对于这些颇有点"狂"气的中青年学者说来，令他们心悦诚服的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还不很多呢。

这批聚集在赵紫阳周围的新一代的中青年学者，大多吃过苦、受过磨难，在农村插过队，到部队当过兵，下工厂做过工，其后于七十年代末考取大学，大多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高等院校，主修经济及社会科学各专业，其中有人还赴欧美留过学或作过研究工作。人们有理由期望，在他们当

中会产生出中国未来经济部门的领导者。

总之，赵紫阳在自己将近六年的国务院总理任期内，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政绩，在全国、全世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形象。

赵紫阳的勤奋和努力，产生了连他自己也未必估计到的结果。在1986年岁末华夏大地上发生的一场骤然而至的政治风波中，赵紫阳应运而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走上更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代理总书记"中记述。

(1) 《新中国纪事1949—1984年》第689—690页。吉林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长春版。

(2) 同上，第700—701页。

(3) 同(1)第704页。

(4) 同(1)第705—706页。

(5) 同(1)第709—710页。

(6)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第124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编。红旗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

(7)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11—61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同(1)第741—742页。

(9) 同(6)第208页。

(10) 《人民日报》1981年3月9日。

(11) 同(1)第760页。

(12)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 同(6)第259页。

(14) 同(16)第191页。

(15) 《人民日报》1983年1月22日。

(16) 同(1)第803—804页。

(17) 同(1)第841页。

(18)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9) 同上。

(20) 同(6)第393页。

(21) 《人民日报》1984年12月20日。

(22) 《人民日报》1985年1月22日。

(23) 《人民日报》1985年1月31日。

(24)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第312—313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5) 同(6)第462页。

(26)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大事记1985年》第78页,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综合组编。

(27) 《人民日报》1986年8月8日。

(28) 同(6)第167页。

(29) 同(6)第170页。

(30) 同(6)第176页。

(31) 同(6)第177页。

(32) 同(6)第197页。

(33) 同(6)第210页。

(34) 同(6)第229页。

(35) 同(6)第236页。

(36) 同(6)第282页。

(37) 同(6)第307页。

(38) 同(6)第311页。

(39) 同(6)第313页。

(40) 同(6)第326页。

(41) 同(6)第347页。

(42) 同(6)第357页。

(43) 同(6)第377页。

(44) 同(6)第411页。

(45) 同(6)第420页。

(46) 同(30)第76页。

(47) 同(30)第82页。

(48) 同(30)第84页。

(49) 《人民日报》1986 年 2 月 20 日。

(50) 同(1)第 716 页。

(51) 同(1)第 726 页。

(52) 同(1)第 733 页。

(53) 同(1)第 739 页。

(54) 同(1)第 744 页。

(55) 同(1)第 786 页。

(56) 同(1)第 798 页。

(57) 同(1)第 823 页。

(58) 同(1)第 846 页。

(59) 同(6)第 440 页。

(60) 同(30)第 68 页。

(61) 同(30)第 70 页。

(62) 《人民日报》1986 年 7 月 28 日。

(63) 《人民日报》1986 年 3 月 18 日。

(64) 《人民日报》1986 年 3 月 22 日。

第十五章　代理总书记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如下决定：

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

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

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1)

从1月16日到11月2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一中全会这段时期，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历时九个半月。同时，他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这个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在赵紫阳政治生涯中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所以，我们有必要列专章加以叙述。

导致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赵紫阳代理总书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导火线和催化剂，是1986年秋末再度爆发的、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大学生风潮事件。

早在1977年12月，当赵紫阳还在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时，胡耀邦即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致力于平反"文革"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随后，由于邓小平坚持不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因此，与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就任总理的同时，胡耀邦就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并一度称为党的主席(在华国锋担任党的主席时，胡耀邦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总书记，但那时总书记一职还不是党名义上的第一把手)。按一般的常规，胡耀邦将会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由于自然原因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胡耀邦丧失了这一机会。胡耀邦有许多优点，他坚决反对林彪、江青集团，坚决主张改革，工

作热情高、干劲大、思想开放，在文化教育和知识界尤孚众望。但是，胡耀邦是一位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的人物。他处理党内高层人际关系，不够经心，即席发言多，而且不大注意实际后果。胡耀邦的上述优缺点，与他的经历直接有关。胡耀邦是湖南浏阳人，十几岁即参加了红军。由于擅长从事宣传鼓动工作，他在苏区就成为专职青年团干部。1935年冬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他被上级指派为一支"扩红"(即动员农民参加红军)宣传队的队长。由于他领导的"扩红队"招到的新兵比其他队都多，因而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从此，毛泽东很赏识胡耀邦，调他到中央军委的干部部门任职。(2)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都在延安度过，直到解放战争初期，才被"外放"任华北野战军某纵队政委(即军政委)，后任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五十年代初被毛泽东调到中央，任共青团第一书记，直到1966年。

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五、六年间，胡耀邦作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工作，这里就不细讲了。1985年9月18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主的学生闹过一次规模不小的学潮。这在一定意义上削弱了胡的地位。

胡耀邦与赵紫阳，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总理，二人都主张改革，相互关系也不错。赵作为总理，主要精力抓经济，胡作为总书记，主要精力抓政治思想，所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任主要落到胡的肩上，而胡对此重视不力。

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话，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3)邓小平讲道:"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4)

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胡耀邦没有布置广泛传达。(5)

1986年秋，邓小平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他指出：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所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6)

邓小平还讲道：“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机构重叠是改革的最大障碍。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7)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是积极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的。

其后，报刊上出现了不少论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其中也有在当时被认为不太恰当的论调，这本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然而，当它与随之而来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潮纠缠在一起，事情就复杂化了。

导致 1986 年初冬的学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年经的大学生是社会中最活跃、最有闯劲、又最集中的一批人。不独中国如此，全世界亦然。许多国家都经常遇到大学生的学潮问题。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求知欲强烈，信息反馈快，有自以为是的一面，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他们的身体又已发育成熟，却往往不被社会承认为“大人”，加之，物质生活条件不佳，居住十分拥挤，经济窘迫，所有这些，都是大学生闹风潮的原因。在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尤其是北京的大学生，便不时发生一些风潮苗头，且不说北京大学的 1985 年“9.18”事件，就是中国女子排球队赢球、中国足球队输球等事件，都会在校园内引起一阵风波。

造成 1987 年全国学潮的主要原因，作者认为大致可概括如下：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而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当然会迅速地影响中国的国内思潮。第二，人们对党内不正之风的反感。党内不正之风由来已久，诸如，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特殊化，大量进口日本高级小轿车，等等，这些最容易激起青年学生们的义愤。第三，不少大学生嫌改革速度过慢。所有这些，当然也可以说与前一段报刊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有一定的关系。

一般认为，这场学潮，始于设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科技大学。11 月中下旬，科技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与民警发生冲突。随即，12 月中旬，学潮集中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把上海市长江泽民请到学校“辩论”，结果不欢而散。其后的几天，上海十多所大专院校的数万名学生冲出校园，上街游行，赴市政府请愿，秩序大乱，交通堵塞，市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强力驱逐不是办法，放任不管也不行。总之，闹出大事了。

12 月下旬，学潮波及到了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是重点。学生们想到天安门广场游行，这可是个极敏感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多少个震动全国的大事件都在这里发生。北京市政府公布了游行法，不允许未经批准的游行。

1986 年 12 月 30 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指出：“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包括法律的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8)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三人被开除党籍，胡耀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方面的软弱受到批评。

这时的胡耀邦，由于自己主管的领域出了大事，其地位岌岌可危了。相比之下，赵紫阳由于自己所主持的经济工作形势还不错，因而处境要好得多。

1987 年元旦，一批大学生（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侧面游行，其中十数人被民警拘留。从当日夜至次日晨，北京大学几千学生以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名义再次游行，冲出学校，其中千余人于凌晨到达天安门广场，后被校方租用的公共汽车送回，(9)被拘学生也放回学校。至此，这次学潮发展到顶峰，然后，便逐渐平息下去了。

学潮平息了，胡耀邦也不可能再担任总书记了。大约在 1 月 4 日，胡耀邦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并立即被接受。

1 月 7 日，在黄克诚大将的追悼会上，胡耀邦便没有出席，这说明他已失势。邓小平出席了黄克诚的追悼会，赵紫阳主持，杨尚昆致悼词。(10)

1 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了若干天的政治生活会，胡耀邦在会上受到批评。这样，便有了我们在本章开头引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报。赵紫阳被一致推举代理总书记职务。赵紫阳代理总书记，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这场政治风波的消极影响。此举，可以被视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的分工调整。赵紫阳是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由他接任，可以减少震动，并表明中国的巨轮将继续在改革、开放的航道上运行。前此，国外许多人士预测，中国将改变自己的方向。

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之初，面临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个问题，他是站不住脚的。于是，赵紫阳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提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这一理

论，较早见于赵紫阳于1987年1月18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豪沃希时的谈话。赵紫阳讲道："三中全会的路线基本点有两条：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二是改革、开放、搞活。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靠这两条。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搞活是统一的，缺一不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改、搞活的根本保证；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搞活，也就谈不上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针对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现在我们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就是为了正确、全面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决不会影响改革、开放、搞活。"(11)

赵紫阳还说："我们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要十分注意政策，不搞政治运动，更不会重复过去'左'的错误作法。"(12)

针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程中已经出现的一些"左"的作法，中共中央于1月28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是赵紫阳主持起草、邓小平批准发出的。《通知》指出："这场斗争(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不要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文学艺术风格技巧的探索，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具有特定的含义。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其他消极、腐败现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挂钩。"(13)

《通知》还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十分注意政策界限。这场斗争，要始终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大多数的方针。(14)

这样，中共中央就及时地制止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防止了"左"倾趁机回潮。本来，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潮引发的，现在学潮已经平息，胡耀邦也已经辞职，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鉴于党中央开除了方、刘、王三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党籍，赵紫阳感到有必要重申党的知识分子政策。3月5日，赵紫阳在中南海接见科技人员代表时指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和各种人才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还要努力，逐步为知识分子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还要努力创造民主、团结、融洽、活跃的气氛，使知识分子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5)

3月13日，赵紫阳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央《通知》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重要的文件，它阐明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规定了开展这一斗争的范围、重点和政策界限。这个文件体现了中央对开展这场斗争的决心，同时又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方向是坚定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一定要把思想统一到这个文件上来。这样既可以防止斗争扩大化，又可以防止斗争走过场，保证这场斗争健康地向前发展。”(16)

赵紫阳要求与会的宣传部长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和培养那些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于改革、开放的同志，并以他们为骨干，去团结广大理论工作者，使大家都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团结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同心协力，致力于中国的建设和改革，这样就可以有效地缩小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市场和影响。各级党委都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深远意义。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17)

在这里，赵紫阳提出，要重用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同志。

3月25日，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开

幕，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会上郑重宣布："在整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过程中，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体布局不变，进行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不变，农村和城市的各项现行政策不变，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不变，继续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政策不变。不但不变，而且还要长期地、更加正确有效地坚持下去。"(18)

这样，赵紫阳就给全国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赵紫阳还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严格限于共产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中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不联系经济改革的政策；农村不搞，工厂和机关只进行正面教育；不层层找代表人物，不搞上挂下联，不搞人人过关。"(19)

在这个时期，赵紫阳在同来访的新西兰副总统、喀麦隆总统等国宾会谈时指出：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很好，可以保证同外国合作顺利进行；(20)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决不是反对民主自由。(21)

3 月 27 日，邓小平在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是否能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22)

4 月 13 日，中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 1999 年 12 月 20 日对澳门恢复主权。赵紫阳和席瓦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邓小平、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23)

5 月 13 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进行了四五个月了。在全党努力下，政治思想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

滥的情况已经扭转。大气候变了，局面已经控制住了。"(24)

接着，赵紫阳强调，要加强对改革的舆论宣传。他说："前几天，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去年发生的风波，不应该影响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不仅要坚持，而且要加快。小平同志要我们开个会，组织写些文章，为改革做好宣传工作。"(25)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指示，赵紫阳进一步论述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他讲道："四个坚持是我们的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搞活就搞不下去。不改革、开放、搞活，四项基本原则也坚持不好。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然会滑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道理比较好懂。其实，不改革，也必然会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大大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充分显示出来，使社会主义真正具有吸引力。如果不改革，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搞得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吸引力，岂不是给资产阶级自由化帮了大忙？所以，两个基本点是统一的，既不应拿这个来排斥那个，也不应拿那个来排斥这个。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26)

赵紫阳的这种论述，可以赢得绝大多数人的赞同。

赵紫阳还批驳了把现行经济政策说成是"自由化"的观点。他说："试问，如果把现行政策说成是自由化，人心惶惶，生产不搞了，生意不做了，砍树的砍树，杀猪的杀猪，谁负这个责任？"(27)

的确，集土地改革以来数十年的经验，赵紫阳深深地懂得，社会生产力破坏容易恢复难。一旦"左"的那一套回来，全国的形势马上就会大乱，生产力就会遭到大破坏，其后果，比年轻学生上街游行喊几句"自由、民主"的口号要厉害得多。

赵紫阳还指出："现在，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

现象：已被实践证明是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些同志却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而把一些束缚生产力的说成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统一起来加以考虑。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否有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是判断进步还是倒退的主要标志；而实践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8)

在5月27日的全国整党总结会议上，赵紫阳指出：“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如果用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就会得出排斥改革，否定开放、搞活的结论。也不能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如果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势必得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丢掉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僵化的观点，就必然得出两个基本点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正确结论。”(29)

在稳定了国内形势之后，赵紫阳便按计划于6月4日出访东欧诸国，直到6月26日归国，共访问了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基斯坦六国，分别与六国首脑会谈，发展了中国与东欧诸国及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

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讲道：“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开始的时候，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赵紫阳同志主持的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万里同志主持的安徽省，他现在是我们的代总理。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公布以后，还有一些省徘徊、怀疑，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还有的看了两年才跟上。那个时候，中央的方针就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30)

邓小平还指出：“经过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虽然每一个领域还有不少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难

逐步解决的。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我们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我们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我们中央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了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31)

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高度评价了当年赵紫阳主持的四川和万里主持的安徽这两个省的工作，认为这是带头改革的两个省。邓小平还强调加快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总之，到了五、六月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告一段落，改革开放又成为主流。

在这期间，筹备"十三大"的工作一直在紧张地进行。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前，筹备"十三大"的工作由胡耀邦负责，在胡辞职后，这项工作便由赵紫阳接手负责了。

6 月 10 日，在民主德国访问的赵紫阳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说，党的十三大的中心是改革问题，即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32)

8 月 20 日，赵紫阳在会见泰国外长西提时透露，十三大的基调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大会将对改革作出理论上的阐述。(33)同日，赵紫阳在会见布隆迪客人时指出，改革的中心是发展生产力。赵紫阳还专门讲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讲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重社会公平，但注意效率不够。现在既要讲公平，又要注意讲效率。"(34)看来，赵紫阳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这个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热门论题，有着独到的见解。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着相互消长的关系，即有公平就无效率，有效率就无公平。赵紫阳却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必须同时给予关注。

9 月 25 日，赵紫阳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采访时讲道："我们将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路线前进，改革的步子肯定会比现在快，而决不会放慢。我们没有理由放慢，因为几年来的改革已

经取得很大成就，人民得到了利益，人民衷心拥护改革。所以，改革不应该、也不会放慢。中国的发展只有靠改革，别无他路。如果中国不进步，不能较快地发展，地球上就将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35)

在这段话里，赵紫阳呼吁中国人民奋起直追，努力改变中国的面貌，否则，中国就有被开除“地球的球籍”的危险。

赵紫阳还回答了对方问及的开除几名知识分子党籍的问题。他讲道：“党员和公民不同。既然是一个政党，就会有它的党章和党纲。既便不叫党章、党纲，也会有它的规矩。既然参加了这个党，就要遵守这个党的党章、党纲，遵守党的规矩。如果一个党员本身又是作家、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将象对待其他知识分子那样尊重他，注意发挥他的作用；同时，他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又要要求他遵守党章、党纲。”(36)

9月30日，赵紫阳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主持国庆三十八年招待会。在祝酒词中，赵紫阳深信，中共十三大必将全面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7)

这样，历史的时钟便指向了1987年10月，即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子。国内外人士普遍预测，赵紫阳将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人们的这个预测是有充分理由的。值此历史时刻，赵紫阳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特殊重要的角色了。

(1) 《人民日报》1987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

(2) 胡耀邦1983年间与金日成的谈话。

(3)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28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第364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同上，第365页。

(5) 同上，第371页。

(6) 邓小平会见日本公明党总书记竹入义胜时的谈话，1987年9月3日，《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第382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北京版。

(7) 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时的谈话，1987年9月13日，同上，第384页。

(8)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14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9) 《北京日报》1987年1月2日，1月3日，1月4日，1月5日。

(10) 《人民日报》1987年1月8日。

(11) 《人民日报》1987年1月19日。

(12) 同上。

(13) 同(6)第382——385页。

(14) 同(6)第385页。

(15) 《人民日报》1987年3月6日。

(16) 《人民日报》1987年3月15日。

(17) 同上。

(18) 《人民日报》1987年3月26日。

(19) 同上。

(20) 《人民日报》1987年3月22日。

(21) 《人民日报》1987年3月27日。

(22) 《人民日报》1987年3月28日。

(23) 《人民日报》1987年4月14日。

(24)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第416页。

(25) 同上，第421页。

(26) 同上，第422页。

(27) 同上，第424页。

(28) 同上，第425页。

(29) 《人民日报》1987年5月28日。

(30) 同(24)第428——429页。

(31) 同(24)第431页。

(32) 《人民日报》1987年6月11日。

(33) 《人民日报》1987年8月21日。

(34) 《人民日报》1987年8月21日。

(35) 《北京日报》1987年9月29日。

(36) 同上。

(37) 《人民日报》1987年10月1日。

第十六章　总书记

1987 年 10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邓小平主持大会，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个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历史性的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六、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七、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1)

这个中共"十三大"的主报告，是在赵紫阳的主持下酝酿和形成的。1987 年 2 月，由 19 人组成的大会报告起草小组开始工作。当时，胡耀邦辞职，赵紫阳刚刚就任代理总书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在势头上。

3 月 19 日，赵紫阳就起草十三大报告的总的设计思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内称："初步考虑，报告主要写七个部分。一、讲三中全会以来，包括十二大以来，我国出现了哪些历史性的变化。二、讲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从我国国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着重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所以必须采取现在这样的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别的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三、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四、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五、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六、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包括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党内民主和对党的领导人的监督、党的干部、党的风气。七、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着重阐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

搞活，指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

赵紫阳在信中还强调，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因为以此立论，有可能把避免左右两种倾向这个大问题说清楚，也有可能把我们改革的性质和根据说清楚。如能这样，对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好处，对国外理解我们政策的长期稳定性也很有好处。(2)

3 月 25 日，邓小平在阅毕此信后在信上批示：“这个设计好。”于是，就按照这个思路起草十三大《报告》。

这个《报告》5 月形成第一稿，6 月形成第二稿，7 月形成第三稿，而每一稿都是由赵紫阳主持修改完成的。

然后，《报告》稿又在政治局、书记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军兵种党委及社会科学界广泛征求意见，9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予以原则通过第五稿。10 月中旬形成第六稿，其后又修改过一次，到大会召开时，已是第七稿了。(3)

11 月 1 日，中共十三大闭幕。赵紫阳主持闭幕式。当天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闭幕后，赵紫阳在主席台上会见了几十位来宾。(4)

11 月 2 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赵紫阳主持了会议。经过选举，赵紫阳担任总书记和军委第一副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五人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5)

赵紫阳兼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他将在邓小平之后继任中央军委主席。

11 月 2 日下午，一中全会甫毕，赵紫阳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赵紫阳即席回答了记者的大量提问。

针对外国记者提出的十三大是否意味着中国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结束的问题。赵紫阳答道：“国外一些朋友总认为中国有一

个改革派，一个保守派，并以两派势力的消长来作为分析中国政治局势的依据。我要说，持这种观点来分析中国局势，将会不断犯错误。我已注意到，我们这次大会前，一些外国政治家、新闻界的朋友，已经犯过错误。这次参加大会的1900多人，全体举手通过了我的报告，没有不同意的，也没有弃权的，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这能说明我们有改革和保守两个派别吗？如果说1900多人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举手赞成了我的报告，岂不是又合二为一了吗？当然，中国有十亿人口，有4600多万党员，不可能没有反对改革的人、搞自由化的人，但在骨干分子中间没有保守派、极左派之分。一个领导集体，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一些步骤问题上，具体政策上，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党，谁也不能说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你们不是不赞成我们'舆论一致'吗？为什么又把我们意见有一点不一致当成是了不起的事情呢！我认为在领导集体中，甚至在我们五个人当中，如果有点不同意见，反而可能成为我们今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少犯错误、不出大错误的重要保证。"

针对香港记者关于赵本人任职问题，赵紫阳答道：

"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还是认为我做总理更合适。但是大家一定要我做总书记，我只有努力把总书记的工作做好。没有绝对的自由嘛！"

针对外国记者关于物价上涨的问题，赵紫阳答道：

"这个问题应当这么说，人民有满意的地方，有不满意的地方。满意是主要的。改革九年来，我国人民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物价也确实上涨了。人民希望有这样的总理，只提高工资，而不涨物价，甚至降低物价。看来，我这任总理是做不到了，希望下一任总理做得比我好一些。"

针对香港记者关于邓小平退出中央委员会之后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赵紫阳答道：

“我非常尊敬小平同志。我认为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中间，无论是在职的还是退下来的，政治经验和智慧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小平同志的。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决策人的地位和作用是经历了历史考验的，是党内外、国内外公认的。遇到重大问题向他请教，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何乐而不为呢？”

针对外国记者关于谁将继任总理的问题，赵紫阳答道：

“明年人大、政府都要换届。国务院的人事，将由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外国人不是批评我们把人大当成橡皮图章吗？我们今后要尊重人大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不能随便发言。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不准备等到明年七届人大，而在最近即将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我就要提出辞职。我将提出一个代总理的人选。我的提名现在也不能告诉你们，但我可以对你们说，他比我年轻。”

针对美国记者关于胡耀邦在新政治局中分管什么工作的问题，赵紫阳回答：“我们还没开会嘛！刚才我说了，我们将开会研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如何工作。你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

针对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现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赵紫阳讲道：“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共同富裕。这种情况在改革过程中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什么事情都有先有后，走路也是总是先迈一条腿么！”

一位香港记者发问：“有人比喻你们的冬天来得快，去得也快。”对此，赵紫阳当然明白记者是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他不动声色地答道：“不知道你指的是自然气候还是政治气候。如果指政治气候，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们这里没有冬天，一直是春天。”(6)

举世公认，赵紫阳的答记者问，颇为机智、幽默和风趣。他的态度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没有漏洞，更没有落入那些“狡猾”的中外记者的圈套之中，也没有对记者的“挑衅性”问题加以斥责，或答以

"无可奉告"。上述两种做法，表面显得很干脆，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下策"。

对于赵紫阳的这次答中外记者问，外国人佩服，中国人更感到满意。实际上，在一个现代社会里，领导人即席答记者问，尤其是答外国记者问，这已超出一般的新闻领域，而成为一种对该领导人的"智力测验"。记者出于职业需要，必然费尽心机提出难度大的问题。不仅如此，一个领袖的答外国记者问，还体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形象。赵紫阳的这次答中外记者问，在中国的老百姓的心目中，颇像诸葛亮的"舌战群儒"。

中国人民曾记得，当年的周恩来总理是一位言锋犀利、风度绝伦的人才。但后来，有的中国领导人在答外国记者问时的表现，就很不理想了。例如，华国锋由于口才差，脑子反映慢，人们在电视里观看华国锋吃力地答外国记者问时，都不由得为他捏一把汗。这倒不是因为人们为华国锋个人着想，而是因为看到自己国家的首脑人物在外国记者凌厉的发问下头也不抬地念预先准备好的稿子，使民族自尊心受到挫伤。

正因为有这种对比，当人们看到赵紫阳在中外记者面前的杰出表现，不能不由衷地感到宽慰。当然也有吃惊，不明白赵紫阳这样一个农家出身的"八路干部"，怎么会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对于这一点，笔者却一点也不感到惊奇。通过对赵紫阳个人经历的研究，笔者知道赵紫阳从黄河边上一个抗日少年成长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全过程。

赵紫阳的智力，在桑村小学，"欧阳书院"，开封初中和武昌高中得到开发；赵紫阳的工作能力在抗日烽火和国内战争的硝烟中得到增长；赵紫阳的反映能力，在建国后党内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文革"期间与红卫兵造反派的唇枪舌箭中得到锻炼；赵紫阳待人接物的风度，在长期的书记和总理生涯中逐渐成熟，一步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笔者相信，凡是认真阅读过这部传记的读者，是

会与笔者产生共鸣的。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感觉到：一颗星辰已经从十三大升起。

今后，这颗星辰将沿着什么轨迹运行，人们大体也可以作出判断。历史老人是铁面无情的，他会对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公正无私的评价。

(1) 《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6日。

(2)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5日，"实践的成果，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三大报告诞生记"，新华社记者 徐心华、邹爱国。

(3) 同上。

(4)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2日。

(5)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3日。

(6) 《人民日报》1987年11月3日。

赵紫阳年谱

赵紫阳于1919年(民国八年)10月17日诞生于河南省滑县桑村乡赵庄。父亲赵廷宾,母亲刘氏。赵被父亲取名为赵修业。家庭为赵庄首富,有田产几十亩,按照"阶级划分",可划为"地主"。赵系独生子,只有一位姐姐。

同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很快波及全国。

1921年(民国十年),赵两岁。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十三位代表代表着五十余位党员。

1927年(民国十六年),赵八岁。秋,进入设在桑村的滑县县立第十七小学读书。

毛泽东率领几百农军登上井冈山。

12月,国民党宁、汉两政府合并,奠都南京。

1931年(民国二十年),赵十二岁。夏秋之交,中共滑县党支部成立,聂真任书记。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

同月,聂真等人赴滑县桑村小学开展工作,恢复该校教员徐仲三党籍,吸收校长杨庆然、教员贾怀堂入共产党。徐、杨、贾三人成立桑村党支部。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赵十三岁。6月,赵在桑村小学加入共青团,并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9月,中共党组织准备于濮滑边界一带发动暴动。

10月,暴动流产。国民党政府河南省主席刘峙率兵赴滑县镇压。中共党组织星散。赵失去团组织关系,转赴县城县立第一小学学习。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赵十四岁,夏,滑县县城县立第一小

学(即欧阳书院)毕业。秋,考取河南省立开封初级中学。

1934年至1935年(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赵十五至十六岁,继续在开封初中求学,同时参与组织"启茅社"等救亡小团体,并参加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开封学生卧轨请愿斗争。

1934年10月,毛泽东等率领红军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秋,赵十七岁,赴武昌考取高中,在高中时将赵修业的原名自行改为赵紫阳。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赵十八岁。

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秋,赵由武昌辍学返回家乡,与部分抗日青年在濮、滑边界一带建立进步青年组织"通俗学社"。

11月4日,豫北重镇安阳陷入日军之手,27日,伪河南自治政府在安阳成立。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赵十九岁。1月,日军一部侵占滑县道口镇,中共武装配合国民党部队抵抗,中共组织在滑县公开活动。

2月,赵接上共产党组织关系,1932年加入共青团的身份被认可。

4月10日,中共直南特委派赵到山西省太行山区的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

5月,党校党组织确认,赵当年2月接上组织关系的时间,即为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时间。

9月,赵学成返回滑县,旋即担任中共滑县工作委员会书记。

年底,滑县党组织发展到147个支部,2000名党员。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赵二十岁。春,中共滑县工委改称县委,赵任县委书记。

3月,赵以老同学的身份,劝导国民党政府委任的滑县县长陈曙辉率人枪300余接受共产党改编。此举,大大改变了国共两党

在滑县的力量对比。赵的才干为上级党组织所器重。

6月，赵调任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长。

12月5日，赵出席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在山东大名小营镇召开的直南、豫北两地委干部工作会议，第一次见到邓小平。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赵二十一岁。4月18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成立，下辖四个地委，赵任第三地委书记。

6月，日军发动残酷的大扫荡。7月，三地委所属地区全部沦为敌占区，赵率小队伍突围，进入二地委辖区。经区党委决定，二、三地委合并，称二地委，赵担任二地委书记。

1941年（民国三十年），赵二十二岁。7月，鲁西区与冀鲁豫边区合并，赵改任第六地委书记。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赵二十三岁。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减政、渡过难关的指示，冀鲁豫边区缩编，原第五、第六地委合并，称第四地委，赵改任第四地委副书记，张玺任书记。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赵二十四岁。1月，赵率边区第四分区第二十一团执行主力地方化任务，赴滑县以南、延津之北开辟新区，于邵耳寨消灭伪军一个营。7月，赵以地委副书记的身份赴滑县指导雇佃贫运动试点。

年底，滑县雇佃贫运动结束。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赵二十五岁。

年初，赵赴太行山老区参观学习。

5月，赵改任新成立的中共平原分局第九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10月，赵在中共平原分局机关刊物《平原》第二期增刊上发表《滑县群众是如何发动起来的》一文。《平原》编委会专门为文章加了“按语”。在文章中，赵全面介绍了滑县运动的情况，总结了领导者如何克服“左”和右两种倾向的经验教训。文章的中心内容是，一方面，不能用“框子”限制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不能“乱”和“蛮干”。

同年与冀鲁豫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梁伯琪结婚。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赵二十六岁。4、5月间,赵赴滨河县新店主持土地工作干部会议并作报告,全面阐述土地工作中遇到的各种政策问题。

春,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在山东冠县召见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书记赵紫阳等人,座谈土改问题。邓小平肯定了赵所总结的滑县土地斗争经验,并决定将这一经验在全大区范围内推广。这是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头一次的重要交往。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八载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同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由延安返回太行山区。邓小平就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冀鲁豫边区属于晋冀鲁豫中央局管辖。

9月,八路军收复滑县城,赵率边区第四地委进驻县城

10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共平原分局,仍划分冀南和冀鲁豫两个区党委。各区党委机构调整,赵任冀鲁豫第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党委机关设在滑县,下辖九个县委。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赵二十七岁。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全国各解放区开展大规模土地改革的指示。

6月底,国共国内战争全面爆发。

9月,国民党军攻占滑县、卫南等地。

11月初,赵在内黄县聂古乡召开区、连级干部会议,传达上级党委战略意图,指示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斗争。

11月内,滑县等地在国共战争中形成拉锯战的战场,又一次被国民党军攻占。

冬,赵在本地区打游击,坚持斗争。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赵二十八岁。3月下旬,刘、邓大军发起豫北战役,收复滑县等地。赵率地委从“地下”回到“地上”。

6月上旬,赵出席第四地委在濮阳县湾子村召开的干部会议,

总结本地区的土改工作，并论及若干政策问题。

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强渡黄河，揭开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战略进攻的序幕。

8月，赵卸去中共冀鲁豫边区第四地委书记职务，赴区党委报到，待命南下。

9月，赵被委任为地方工作团团长，率领从边区集中的干部汇合到野战军第十纵队。

10月14日，赵与第十纵队一同南下大别山，成为刘邓大军的第二梯队。

10月29日，赵与第十纵队一道渡过黄河。

11月29日，在河南光山县境内与大别山区的主力会师。

12月2日，赵出席有刘邓首长亲临参加的第十纵队西进桐柏山区的干部动员大会。会上，刘、邓首长号召干部以义无反顾的决心，在桐柏山扎下根。

12月5日，赵与第十纵队一道在激战后突破平汉线西进，下令所属地方干部"打散了只能朝西边突"。

12月11日，赵与部队一道抵达湖北应山县浆溪店，正式进入桐柏山区。

12月13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批准成立桐柏区党委，代理书记刘志坚，副书记赵紫阳(兼军区副政委)。

12月19日，赵与部队一道进入刚攻占的河南唐河县城。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赵二十九岁。1月5日，赵在唐河城关桐柏区党委和军区召开的"解放桐柏庆功大会"上讲话，号召誓死打开新局面，完成党中央和中原局交给的任务。

3月底，赵出席在湖阳召开的桐柏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克服土改中的急性病。

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丧师四十余万。

11月4日，国民党军逃出南阳，桐柏区的战争基本结束。

11 月 6 日，规模更大的淮海战役揭开序幕。

1949 年(民国三十八年)，赵三十岁。

1 月 15 日，淮海战役结束。

1 月 31 日，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败局已定。

2 月 18 日至 24 日，赵在唐河县桐柏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一月会议精神，并作总结报告。

3 月 10 日，赵随桐柏区党委一道入南阳城。

同月，桐柏区党委取消，赵就任新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下辖的南阳地委书记。

4 月 22 日，南京被解放军占领。

夏，赵在南阳地委机关内部领导一次"反蜕化"小运动。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建都北京。

1950，赵三十一岁，仍任南阳地委书记。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

10 月 2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

1951 年，赵三十二岁。4 月，赵卸去南阳地委书记职务，奉命南下赴广东工作。

5 月，赵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俱乐部秘书长。分局俱乐部正副主席由叶剑英和方方兼任。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第二书记张云逸主持广西工作。俱乐部改为华南分局办公厅，赵紫阳任秘书长。

5 月 6 日，赵被增选为广东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方方。

7 月，赵赴广东乐昌县检查农民运动情况，调查归来后给分局书记写报告，对广东土地改革前一段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提出缩小打击面、给贫雇农更多实惠的建议。

1952 年，赵三十三岁。春，毛泽东召叶剑英赴北京，批评华南

分局在工作中右倾，土地改革不彻底，排斥南下干部。毛泽东要求，华南今后的工作主要应依靠南下干部和大军干部。

7月，赵在华南分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既拥护中央指示，又对叶剑英表示充分尊重。

同月，赵参加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作自我鉴定，并由分局办公厅党支部作组织鉴定。

1953，赵三十四岁。

5月29日，赵主持发出《当前稳定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的指示》，要求把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7月，赵升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叶剑英调中共中央中南局（设在武汉）任代理书记。陶铸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同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

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4年，赵三十五岁。6月，赵对广东省二十五个社的驻社干部发表讲话，指出，合作社能否巩固，取决于能否增产增收。

10月，赵主持中共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护社、并社中某些政策问题的初步意见》。

12月，赵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在肯定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的同时，指出运动中存在的过激倾向。

1955年，赵三十六岁。5月，赵作关于广东农村工作的报告，着重指出了建立合作社中的互利问题，要求不办大社，而办二、三十户左右的小社。

9月至12月，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作按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

1956年，赵三十七岁。9月，赵作为代表，赴北京出席中共八大。邓小平在八大当选中央总书记，陶铸当选中央委员。

1957年，赵三十八岁。4月29日，赵在广东省第一次水产会议上作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处理群众与领导的矛盾，关键在于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

夏，反右运动展开。赵由于主持农业，未参与划右派的工作。

1958年，赵三十九岁。年初，"大跃进"运动展开。

4月13日，赵在广东省合作会议上讲话，提出农业超日本的想法，决定在农业生产中采取十项增产措施，并要求爱惜民力、适当休整等。

7月31日，赵在广东省县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广东的粮食产量落后于中南其它各省，要求克服"差不多"、"很不错"的思想，认为，中国如果能在短时期内解决粮食问题，意义重大。

9月28日，赵在省委电话会议上说，建立人民公社是一场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同时认为，需要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不然会出现副作用。

1959年，赵四十岁。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因彭德怀提出正确的意见，毛泽东反而又一次大批右倾，将彭等人打成"反党集团"。赵列席"庐山会议"，因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表决权。

1960年，赵四十一岁。2月19日，赵在省委电话会议上就人民公社的过渡和干部作风问题讲话，要求警惕重犯1958年"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指出，不要勉强过渡，要按客观条件去办事，要允许农民搞副业、种自留地，要防止干部脱离群众。

年中，赵就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书记。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着手纠正"左"倾错误。

11月11日，赵在广东省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要求克服

"左"倾,纠正"共产风"和"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防止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61年,赵四十二岁。1月7日,赵在广东佛山地区农村整风整社试点总结会上讲话,大力纠正"共产风"等"五风"。

1962年,赵四十三岁。1月至2月,赵赴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2月3日,赵在大会广东组会议上发言,主动承担农业生产上出问题的责任,检查前一段工作,总结经验教训。

5月17日,针对广东部分农村地区人口大批外流香港问题发出电话指示,要和缓处理问题,防止动武,要求同情农民的遭遇,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让农民有饭吃。

夏,在赵的主持下,批准恢复广东毗连港澳地区的小额外贸,放宽边防线以外若干地方群众赴港探亲的规定,另开口岸帮助在港有亲友、有生活来源的群众出境。

7月,赵亲率工作组赴清远县洲心公社总结当地干部群众创造的"就地分粮"的典型经验,将其归纳为"联系产量责任制",加以提高、完善,在广东全省推广。

8月22日,赵主持批发《关于彻底建立和健全生产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意见》,内称,"可以采取固定地段,一次包工到人(或户),由社员个人(或户)连续操作,管理到底的办法,一次包到底"。

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冬,赵赴紫金县视察农村工作,针对集体不干活,个人不让干的情况,讲出"单干也是干,比不干好"的话。

同年初,赵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

1963年,赵四十四岁。5月20日,赵在省委作"五反"检查报告。

1964年，赵四十五岁。9月，赵赴顺德县伦教公社荔村大队"蹲点"搞"四清"，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10月16日，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1965年，赵四十六岁。1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爆发。

年初，赵升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专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仍驻广州）。

3月，赵提出在广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计划，其标准为水稻亩产超千斤，每人全年集体分配超百元，每个生产队的家当超两万元等。赵还批准进口并翻译介绍美、法等国农场管理的书籍。

11月16日，赵在广东省委第二届四次全体会议上讲到准备打仗的问题，认为准备打仗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好农业问题，即解决好人民战争的战场问题。

1966年，赵四十七岁。5月，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

6月1日，陶铸上调北京工作，离开广州。同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批准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乱开始。

6月9日，赵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要求坚持文斗，严禁动武，重点批判对象要经过批准。

6月26日，赵在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队队长会议上讲话，要求对运动加强领导，以防被坏人操纵，还要求工作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8月1日，毛泽东复信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

8月1日至12日，赵赴北京列席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不是中央委员，因而无表决权。

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

大字报》。

8 月 7 日，赵于北京通过电话口述一份“大字报”，由省委工作人员次日贴出，以示“引火烧身”。

8 月 17 日，赵在省委干部大会上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并表示要尽力领导运动。

9 月，红卫兵截获赵夏天的三次讲话内容，指责赵“镇压群众”，开始“炮打”赵。

10 月，红卫兵对赵和省委的冲击升级，广东全省日益混乱。

11 月 4 日，赵被迫代表中共广东省委作检讨，承认省委在运动中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坚持认为，省委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夏、秋，赵向在北京的陶铸电话请示三十余次，陶回电话二十余次。

11 月 23 日，广州中山大学造反派组织在政法干校斗争赵。

12 月，由于红卫兵冲击加剧，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转入“地下”，办公地点保密，书记们亦不能在家住宿，需到处“打游击”。

1967 年，赵四十八岁。1 月 4 日，陶铸在北京被中央文革“打倒”，被宣布为“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1 月 5 日，陶铸出事的消息传到广州，赵对省委书记们表示，自己准备被揪，望大家“独立作战，继续工作”。

1 月 21 日晚，“广东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响应北京的号召，向中共广东省委“夺权”。赵紫阳等省委书记、常委被绑架到中山大学。

1 月 22 日，赵对主持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的省委常委说，“不能承认省委领导是走资派”。

1 月 23 日，赵批发《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表明省委仍在工作。

1 月 23 日，军队根据中央指示“介入文化大革命”，广州军区

介入广东的“文化大革命”。

2月，北京发生几位老元帅、老副总理与中央文革抗争的事件，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

2月23日，赵在省委大院贴出名为《对于‘省革联’问题的声明》，内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没有具体讲清“夺权”怎么个夺法。

3月31日，赵与广东省委机关《东方红公社》负责人谈话，表示不同意对自己的批判。

春，赵数十次地被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最厉害的一次，被连续批斗五天五夜。

5月5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下达对赵等人实行“监护”的指示。

同日，赵被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送往监护地。

夏、秋，赵继续被各造反派批斗，但有警备司令部的监护人员在场，因而斗争不能象以前那样野蛮。

1968年，赵四十九岁。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黄永胜任主任。黄在会上号召“批判走资派陶铸、赵紫阳”。

2月3日，赵在省军区“专案组”要求下被迫写出《我的检查》，只承认自己执行了刘、邓、陶路线，不承认是走资派。承认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对毛主席“不忠”。结果，再次遭到“大批判”。

春，赵的“检查”在全省范围内受到大规模批判，多次受到大会“批斗”。

1969年，赵五十岁。赵继续被羁押在广州市警备司令部；

4月，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

4月20日，广东省军区“赵紫阳专案组”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报送《关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紫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0年，赵五十一岁。赵在军队人员的看管下，被下放到工厂

参加生产劳动。《审查报告》未被中共中央批准。

8月至9月，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挫败林彪集团抢班夺权阴谋。其后，老干部境况有所好转。

1971，赵五十二岁。4月，赵被解除监护审查，被分配到内蒙古工作。

5月1日，赵在内蒙首府呼和浩特市庆祝国际劳动节集会上露面。

5月13日至18日，赵参加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区党委书记，排名第五位，分工管农牧业生产。第一书记为尤太忠。

8月下旬，赵在自治区党委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电话会议讲话，要求进一步抓好生产。

9月13日，林彪在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乘飞机外逃，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

10月25日，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得到恢复。

11月18日，赵出席内蒙古自治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并讲了话。

1972年，赵五十三岁。3月，赵返回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赵南下经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接见。

3月24日，赵在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表示要搞好团结，努力做好分管的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1973年，赵五十四岁。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3月31日，赵在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讲话，批判了"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的观点，还指出，要防止在克服一种倾向的同时，掩盖着另一种倾向。

8月，赵赴北京出席中共"十大"，并当选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

12月，中共中央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1974年，赵五十五岁。4月，赵被任命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从而又一次成为广东的第一把手。

4月26日，赵在广东省、市机关揭批林彪、黄永胜罪行大会上讲话，号召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广东实际揭批林彪、黄永胜，把他们的罪行搞清楚。

5月17日，赵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号召继续深入揭批林彪、黄永胜，同时要求防止将矛头指向群众、扩大打击面。

7月15日，赵在广州军区部分原"支左"干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作报告，要求"揭盖子"，而不要"捂盖子"，指出，当年部队"支左"有成绩也有问题。

1975年，赵五十六岁。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

10月，由周恩来、邓小平提议，经毛泽东批准，赵奉调就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成都军区政委。

1976年，赵五十七岁。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极大悲痛中。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认华国锋兼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4月5日，发生震动全国的"天安门事件"。

4月6日，华国锋就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4月8日，赵出席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例行公事的"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大会。

6月6日至8日，赵接待来川访问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

8月19日，赵任四川省地震慰问团团长，赴川北松潘、平武地震灾区慰问，领导全省的抗震救灾工作。

9月18日，赵在成都举行的有五十万人参加的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10月7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人，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为反党集团，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为"一举粉碎'四人帮'"。

10月23日，赵在成都市有八十万人参加的"欢呼粉碎'四人帮'大会"上说："除了四害，挖了祸根，大快人心，大得人心，大振人心。"

11月20日，赵在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召开的"揭发批判'四人帮"大会"上作重要报告，提出：必须"对'四人帮'的罪行彻底地揭，狠狠地批，坚决地斗"，同时提出："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要注意政策"。

1977年，赵五十八岁。1月8日，赵在中共四川省委举行的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大会上讲话，缅怀周恩来，斥责'四人帮'对周恩来的迫害。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3日，赵在成都市三十万人参加的庆祝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会上指出："坚决拥护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四人帮'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篡党夺权罪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7年间，赵赴四川全省三十多个县市作调查研究，重点解决农业问题。是年，四川农业获得大丰收，增产粮食60亿斤。

8月16日，赵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从此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2月15日，赵在四川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报告，宣布“抓纲治蜀”已“初见成效”，同时提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四川农业发展战略。

1978年，赵五十九岁。1月，赵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奋发努力加快四川建设，为国家为人民多作贡献》的文章。

1978年初，赵主持制定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即《十二条》。《规定》要求在农业生产中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揭开一场思想解放的原则争论。

6月26日，在赵主持下，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指示》。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平反了一大批“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左”倾路线的失败和实事求是路线的胜利。

1978年四川全省的粮食产量，比1977年又增产40亿斤，两年共增产100亿斤。“蜀中大治”，农民们喊出“要吃粮，找紫阳”的谚语。

1979年，赵六十岁。2月10日，赵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阐述了从实际出发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针政策，同时强调积极开展对外经济交流问题。

5月22日，赵在中共四川省委三届二次会议上讲话，提出要把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

1979年春、夏，在赵主持下，四川全省普遍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

9月28日，赵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

11 月，赵在四川省委地州县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右干扰，进一步解放思想，维护安定团结"。

1980 年，赵六十一岁。1 月，赵在《红旗》杂志 1980 年第一期发表题为《研究新情况，全面贯彻调整的方针》的文章，总结了四川发展工农业生产的经验，并突出了对新情况采取实事求是对策的思想。

1979 年四川全省的粮食生产比 1978 年又增产 33 亿斤。1976 年四川粮食总产量为 508.4 亿斤，1979 年四川粮食总产量为 672.3 亿斤，1979 年粮食产量比 1976 年增加 163.9 亿斤。1976 年四川人均口粮 369 斤，1979 年为 522 斤。1976 年四川人均口粮低于全国人均水平 40 斤，1979 年高于全国人均水平 34 斤。

1980 年赵六十一岁。赵离开四川，赴北京工作。

2 月 23 日至 29 日，赵出席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4 月 8 日至 16 日，赵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实际上开始主持总理的常务工作。

8 月 18 日至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向全国人大常务会建议：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替总理职务。

8 月 30 日至 9 月 10 日，赵出席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会议接受华国锋辞去总理职务，正式任命赵紫阳为总理。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的错误，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至此，华国锋最终失势。

12 月 16 日至 25 日，赵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就国民经济

调整问题讲话，指出，今后要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新路子，不是靠多搞基本建设，而是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要对国情有清醒的认识，不可急于求成。避免再发生大的折腾。

1981年，赵六十二岁。1月26日至2月2日，赵出访缅甸、泰国，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作出贡献。

5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赵紫阳同志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讲话提出，要走出一条发展国民经济的新路，即投资较少，积累不那么高，效益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能较充分地发挥。

6月27日至29日，赵出席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正式评价。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选举胡耀邦为党中央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11月27日至28日，赵出席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1982年要进一步贯彻调整、整顿、改革、提高方针。

1982年，赵六十三岁。1月8日至22日，赵赴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作调查研究。

3月2日，赵在五届人大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

9月1日至11日，赵出席中共十二大。十二大建立起中国最高层领导的“邓、胡、赵”体系。

11月30日，赵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强调反冒进问题。

12月20日，赵出访埃及等亚非十一国归来。

1983年，赵六十四岁。

4月12日至23日，赵访问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

8月8日至22日，赵赴新疆，并乘直升飞机到达全疆各地区

视察。

1984年，赵六十五岁。1月7日至28日，赵前往美国和加拿大访问，与里根会谈，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办法。

4月27日，赵与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会谈。

5月30日至6月16日，赵出访法国、比利时、瑞典、丹麦、挪威、意大利等西欧六国。

9月9日，赵致函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提出应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此，邓小平加以肯定。

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2月19日，中国和英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字，赵紫阳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签字。

1985年，赵六十六岁。

3月27日至4月10日，赵出席六届人大三次会议，作题为《当前的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工作报告。

6月2日至19日，赵出访英国、联邦德国和荷兰三国。

9月18日至23日，赵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开幕式上作"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的说明"。

10月21日到28日，赵赴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1986年，赵六十七岁。2月5日至14日，赵视察海南岛，提出加快海南开发和建设的设想，并与当地军民共度春节。

3月21日，赵在"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大会"上讲话，阐明中国需要和平、致力于和平事业的立场，在世界上树立中国热爱和平的形象。

7月3日至27日，赵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西班牙、土耳其和突尼斯等欧、非六国。

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针对学潮事件，批评胡耀邦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赵六十八岁。1月1日至2日，学潮又有所发展，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游行。

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若干天的高级干部生活会，集中批评胡耀邦。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

1月18日，赵在会见匈牙利外宾时谈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要十分注意政策，不搞政治运动，更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做法。

1月28日，中共中央在赵主持下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要防止以‘左’批右，决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

4月13日，赵代表中国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署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主权。

5月13日，赵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论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点之间的关系，指出，它们之间是统一的关系，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5月27日，赵在全国整党工作总结会议上指出，不能用僵化的观点来理解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对待改革、开放、搞活。

6月4日至26日，赵出访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巴基斯坦六国。

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赞扬了赵紫阳主持四川省时的工作。

9月25日，赵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采访时讲到，中共十三大的主题是改革，还说，如果中国不能较快地发展，在地球上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

10月24日，中共十三大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会议。赵主持了预备会议，并在主席团会议上讲话。

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邓小平主持大会，赵作了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起草，是在赵的主持下进行的。3月21日，赵就报告总的思路，致信邓小平。3月2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设计好"。

11月1日，中共十三大闭幕，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退出中央委员会。

11月2日，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赵当选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当日下午，赵等新当选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采访十三大的中外记者，回答了记者们提的大量问题。